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人口问题

商 务 印 书 馆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人 口 問 題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

商 務 印 書 館

1960年·北京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論人口問題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黃城根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 4017·25

1960年4月初版 開本850×1189 1/32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188千字

印數5—4/10 印數 精 1—3,000 每頁4
平 1—1,000

精裝本 定價(8) 1.20元
平裝本 定價(8) 0.70元

出版說明

为了便于目前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人口理論，我們选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有关人口問題的部分言論，汇编成此書。

本書是按問題編輯的，其中每一个問題的材料基本上是以著作的先后次序排列的。

由于理論水平所限，加以時間仓促，編选上定有許多不当之处，希讀者指正。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80年4月

目 录

一、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1
1.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	1
2.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	6
3. 人是生产者,人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8
4. 人口、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5
二、资本主义前各生产方式的人口问题	17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问题	20
1. 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20
2. 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	43
3.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形态	47
4. 资本主义社会人口构成的变化	50
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	64
1. 彻底消灭失业现象	64
2. 充分发挥人的革命主观能动性	69
3. 人得到全面发展	87
五、资产阶级反动人口理论批判	92
1.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92
2. 驳斥“土壤肥力递减规律”	131
3. 劳动基金学说批判	133
4. 批判机器所排斥的工人会有赔偿的学说	149

一、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 發展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1. 人民群众是历史發展的决定性的力量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使群众队伍的扩大。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104頁)

由生产資料集中及其大規模使用引起的这全部經濟，是以劳动者的聚合及共同工作，从而以劳动的社会結合，作为本質条件的。象个别考察下的剩余价值，是由个别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引起一样，这全部經濟是由劳动的社会性質引起。甚至那些在这里有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不断改良，也唯一地是由社会的經驗和观察引起，而这种社会的經驗和观察，又是大規模結合着的总劳动者的生产所提供，所允許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74頁)

.....

(乙)人們自己創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們至今創造这个历史，甚至在某个一定有限社会范圍內，也沒有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意

志，沒有按照一个共同的計劃来動作过。他們的意向是錯綜交叉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着統治地位。

（恩格斯：《致亨·施塔爾肯堡》，1894年1月25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505頁）

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更確切地說，徹底發揮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運用於社會現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一切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發現社會關係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歷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是搜集了片斷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徑，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並把這些趨向歸結為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除了人們選擇某一“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抱的主觀態度和武斷態度，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列寧：《卡爾·馬克思》，1914年，《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頁）

世界所以有這種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億成億

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列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1页)

……把領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現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是由領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設工厂、矿井、鉄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創造一切生活資料，供給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页)

(1) 既然如此,那末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質,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这样的力量,据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会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产方式。

为要生活,就需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为要有这些物質資料,就必须生产它們,而为要生产它們,就需要有人們所利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种种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就需要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生产物質資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經驗

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質資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社会底生产力。

但生产力还只是生产底一方面，生产方式底一方面，其所表示的是人們对于他們所利用来生产物質資料的那些自然物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底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們彼此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即人們底生产关系。人們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質資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单独进行，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們在实现物質資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統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由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着怎樣的性質，而它們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制度下，都如社会底生产力一样是生产底必要原素。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产中不仅影响着自然界，而且彼此互相影响着。他們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結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換其活动，便不能生产。为了实现生产，人們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經過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才会有人們对于自然界的关系存在，才会有生产”（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87頁）。

所以，生产，生产方式是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們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內，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質資料生产过程中的統一。

（2）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終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

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人們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着各个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粗淺一点說，过着各种不同样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种生产方式，余此类推。同时，人們底社会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观点，他們的政治制度，也与此适应而各不相同。

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观念和理論，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或者粗淺一点說：人們底生活样式怎样，人們底思想样式也就会怎样。

这就是說，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見，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質資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会历史規律的关键，并不是要到人們底头脑中，到社会底观点和观念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底經濟中去探求。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規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底規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就应精通生产发展底規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

党綱以及进行实际活动时，首先应以生产发展底規律，应以社会經济发展底規律为出发点。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30頁）

2.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規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的物質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社会的經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質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頁）

……如果我拋开了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譬如階級，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認識階級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資本之类，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这些因素又以交換、分工、价格等为前提。譬如說資本，如果沒有雇佣劳动，沒有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要是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渾沌表象，……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頁）

……事实上，每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它的特殊的历史上适用的人口法则。抽象的人口法则，只存在于历史上不曾受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6页）

马克思把人和动植物加以对比是根据前者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地更替的、由社会生产制度因而由分配制度决定的社会机体中。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

（列宁：《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1894—1895年，《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0页）

人口底增长当然能影响到社会底发展，促进或延緩社会底发展，但它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底增长并不能給我們說明为什么某个社会制度恰巧要由一定的新的制度来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个制度来替代；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隶制度所替代，奴隶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资产阶级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底增长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当于它的較高形式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人口密度比美国高至四倍，但美国

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比利時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十九倍，比蘇聯高至二十六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比利時，而蘇聯比之比利時，更是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為比利時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占統治，而蘇聯却已消滅了資本主義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人口底增長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6頁）

3. 人是生產者，人是生產力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但是，如果事實是每一個成年人生產出來的東西比他自己所能消費的要多，事實是小孩象樹木一樣能夠綽綽有餘地償還花在他身上的費用（難道這不是事實？），那就應該承認，每一個工人必然能夠生產出遠比他自己的需要還要多的東西，因此，社會一定會樂意供給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時也應該承認，大家庭應當是極受社會歡迎的禮物。……

（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9—620頁）

我們已經看到，在生產發展底較早的階段上，人底勞動力怎樣可以提供比維持生產者生活所需要的更多的生產品，這個發展階

段基本上是跟产生劳动分工及个人間交換的阶段相一致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第168頁)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197頁)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負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質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 要发展以世上一切人們互相依賴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这些交往所需的工具; 另一方面, 要发展人的生产力并使物質生产变为在科学帮助下的对自然力的統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在創造着新世界的这些物質条件, 正如地質变革創造了地球的表层一样。只有在偉大的社会革命已掌握资产阶级时代的成就, 掌握着世界市場和現代生产力, 并使其服从于那些最先进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时候, 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那个只顧用被杀死者的头顱来喝取酒浆的可憎的异教神象。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 1853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 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 第335頁)

只有一个按計划生产和按計划分配的自覺性的社会生产組織, 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們提升到其余动物之上, 也如生产一般已在單純生物学方面提升了他們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組織日益成为必要, 也日益成为可能。从这个組織起将开辟一个新历史时

代的紀元，那時人們自身及其活動的一切部門，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將獲得如此巨大的進步，以致使得至今所作出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書導言》，1875—1876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75頁）

一旦社會領有了生產資料，那麼商品生產以及與之一起的生產產品對於生產者的統治就將被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就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了。個人的生存鬥爭停止了。這時候，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後地——才脫離了動物界並且從畜牲似的生存條件轉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一切環繞着人們並且直到現在支配了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了。人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真正的主人和自覺的主人翁，因為他們成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的主人翁。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它直到現在還作為異己的、支配着人們的自然規律而與人們相對立——將被人們十分內行地運用了，因之也將服從於人們的支配了。人們的社會存在，直到現在，作為自然和歷史所強加於他們頭上的事物，而和人們相對立，現在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直到現在統治於歷史之上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才受到人們自己的控制。只有從這時起，人們才開始充分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在這時候，他們所推動着的那些社會原因，才將以極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給予他們以其所希望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的王國進於自由的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8—299頁）

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于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旧的生产方式，应该彻底地被改变，特别是旧的分工应该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它使得一方面谁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发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生产劳动。——译者）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负，变成成为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社会的力量，正如自然的力量一样，在未被我们认识到和算计到以前，发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坏的作用。可是一经我们认识了它，研究了它的作用、方向及影响，那时就完全听凭我们来使它更多地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并且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点特别适用于现代的强大的生产力。当我们执拗地拒绝理解它的本性与特質之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拥护者，是拒绝这种理解的，——生产力总是象我们在上面所详细指明了的，违背我们，反对我们而行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可是，一旦理解了它的本性，它就可能在集体生产者手中，从恶魔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僕。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页）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并且

运用这个权力把脱出资产階級掌握的社会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所有。这样，它就使生产資料摆脱它們先前作为资本所具有的全部屬性，而使它們的社会本性能够完全自由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依照預先規定的計劃来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階級的繼續存在成为顛倒时代的現象。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将消亡下去。人既已終于成了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
1955年中文版，第154頁）

生产是在极狹隘的範圍内进行着，但产品完全受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期生产的巨大的优越性，它随着文明的出現便丧失了。下代人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优越性夺回来，但已必須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强大統治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結合作为基础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
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264頁）

在一个經濟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們能活下去，我們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列寧：《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年，《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327頁）

……把領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現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領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設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創造一切生活資料，供給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頁)

生产工具底发展和改善当然是由参加生产的人們所实现，而不是与人們无关，所以，由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人們，即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原素，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他們的生產經驗，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領，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頁)

这就是說，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謝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見，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結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結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質資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

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頁)

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法則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自發的、無可抑制的、不受人們影響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當然，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發展法則，也確實無力去影響它們。如果把这些過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許多場合下，就可能影響自然過程這點來說，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下，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法則，估計到它們，依靠着它們，善于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的破壞力轉而為社會造福。

我們且從許許多多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來看。在上古時代，江河泛濫，洪水橫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莊稼的毀滅，曾認為是人們無法避免的災害。可是，後來隨着人類知識的發展，當人們學會了修築堤壩和水电站的時候，就能使社會防止在從前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不但如此，人們還學會了制止自然的破壞力，可以說是學會了駕馭它們，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

(斯大林：《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4. 人口、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与社会 发展的关系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页)

……各种非天生的物质财富要素所以存在，总须有某种特殊的合目的的生产活动作为媒介。这种活动，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所以，劳动，当作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当作有用劳动，是和一切社会形态相独立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个永久的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必须有它来引起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引起人类的生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16页)

手工制造业内部的分工，以同时使用一定数劳动者的事实，作为物质的前提。同样，社会内部的分工，也以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作为物质的前提。在这里，人口在社会内密集，是有如工人在工场内密集。但人口密度，是相对的。人口比较稀薄但交通工具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比人口比较多但交通工具比较更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大的人口密度。就这意义说，北美合众国北部诸州，是比印度有更稠密的人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3—1867

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4—425頁)

……現存人口的熟練程度，却总归是总生产的前提，是財富之主要的蓄积，以前的劳动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結果。这是存在活劳动里面的。

(馬克思：《剩餘价值學說史》第3卷，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343頁)

其次，人口底增长，居民密度底高低，当然也包含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質生活条件中的必要成分，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会物質生活。……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頁)

二、資本主义前各生产方式 的人口問題

人們最初如何脫出动物界(按这詞的狭义說),人們也就如何进入于历史:他們仍然是半畜牲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之前无能为力、对于他們自己的力量还是沒有意識到的,所以他們象动物一样的貧乏,他們也难得比动物有較高的生产性。在这里,普遍存在生活水平的一定的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某种社会地位的平等,至少那时沒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最晚开化的人民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可以看到。……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4頁)

首先,我們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帶有鉄尖的用家畜拉的本犁;自有本犁以后,大規模的土地耕耘,田野耕作,从而生活品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毫无限制的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其次,我們也看到了,森林底清除及其变为耕地和草地,如果沒有鉄斧与鉄鋤,这也是不可能大規模进行的。同时,人口也急速增殖起来,稠密地住在不大的地域內。而在田野耕作以前,应有非常特殊的环境才能把半百万人联合在一个統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大概从来没有过。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頁)

……奴隶并不能使每个人得到好处,为着要从奴隶身上得到

好处，必须具备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及对象；第二，維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所以在奴隶制成为可能以前，先应在生产的发展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生产方式，那么还需要更大得多的生产、商业和财富积蓄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兴发起来的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中，奴隶制或是完全没有，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等到后来，羅馬变成“世界的城市”，意大利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那时农民的人口才被奴隶的人口所代替。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5頁）

在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到了一定的物质生活的水平，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庭中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已经崩溃或是只少早先的土地共同耕种已经讓位給各个家庭的小块土地耕种的那种国度里，上述情形，尤其众多。生产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使人的劳动力已能生产比简简单单維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更多的东西；維持大量劳动力所需的資料，已经具备了，运用这些劳动力的資料，也已经具备了。这样，劳动力于是获得了价值。可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归属的联合，还不能从自己内部，分出自由的多余的劳动力。但战争却使他們得到了这种劳动力，战争和几个公社集团相邻而存在的那种现象一样，都是由来久矣。以前人們不知道怎样处理軍事的俘虏，因此就简单地把他們杀了，更早还把他們吃了。但是这时在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俘虏获得了一定的价值；所以俘虏开始被活着保留下来，而其劳动

則开始被利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經濟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經濟情况服务；奴隶制于是被发现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5—180頁）

三、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問題

1. 相对人口过剩是資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規律

……一部分資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却无事可干，无工可做，活活餓死。这种对立情况也可能不同时出現：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資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轉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滞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蕪了，資本在运动得最緊張的时候突然停頓下来，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都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恩格斯：《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7頁）

在資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連科学也被用来反对劳动了。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倫普頓和阿克萊发明棉紡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現，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

（恩格斯：《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4頁）

由此可見，英國工業在任何時候，除短促的最繁榮的時期外，都一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後備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幾個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這種後備軍的擴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還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雖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時候，農業區、愛爾蘭以及受普遍繁榮的影響較少的工業部門暫時也能供給工廠一定數量的工人，但是這些工人的數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樣屬於後備軍之列，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榮才暴露了他們是屬於這個後備軍的。在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裏面去的時候，他們原來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為了稍微補一下空子，就延長工作時間，雇用婦女和少年，而當危機到來，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據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餘的人”。這個後備軍就構成英國的“過剩人口”，它在危機時期人數激增，而在繁榮和危機之間的時期人數也相當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369頁）

機器之資本主義的使用，一方面，引起新的有力的把勞動日無限制延長的動機，變革勞動方法自身與社會勞動體的性質，從而，把這個傾向所遇到的抵抗完全打破；別方面，又部分地由資本一向不能染指的各個勞動者階層的加入，部分地由機器所驅逐的勞動者的游離，創造了過剩勞動人口，使其听命於資本的規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
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4頁）

勞動手段一經採取機器的形態，便成為勞動者自己的競爭者

了。資本由機器而起的價值增殖，與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勞動者人數，成正比例。我們講過，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體系，是立足在勞動者把勞動力當作商品來出賣這一個事實上。但分工只使勞動力片面化為操縱部分工具的完全特殊化的熟練。自操縱工具的事務也歸于機器以來，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和它的使用價值一同失效了。勞動者變成了不能出賣，象不通用的紙幣不能出賣一樣。勞動者階級中因機器而被轉化為過剩人口（即在資本價值增殖上不復被直接需要的人口）的部分，一方面，是在舊式手工業經營和手工製造業經營對機器經營的不平衡的鬥爭中消滅掉了，一方面，是泛濫入各種比較容易接近的產業部門，擁擠在勞動市場內，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低於它的價值。對於待救恤貧困化的勞動者，有這樣一種大的安慰：一方面是說，他們的痛苦只是暫時的（一時候的不便）；一方面是說，機器只徐徐侵入一個生產領域全部，它的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因此可以緩和下來。但前一種安慰，適足以攻破後一種。在機器徐徐侵入一生產領域的地方，機器會使那些與機器競爭的勞動者，陷於無救的貧乏。而在急速推進的地方，其影響又是大規模的，急切的。世界史上再沒有什麼還比英國棉織手工工人漸次的消滅（那曾拖延數十年之久，至 1838 年，才算最後完成），是更可怕的悲劇了。其中，有許多是餓死的，有許多是長期間每日以兩個半便士養活一家的。反之，英國的棉機器，却在東印度，引起了急切的影响。1834—35 年，印度總督曾說：“這樣的勞乏，在商業史上，實難有其匹。棉織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當然，在這些織工與世永辭的限度內，機器所給予他們的，只是“一時候的不便”。但就其餘各點說，因機器會不斷侵入新的生產範圍，所以，它的“暫時的”作用也是永久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反對着勞動者而給予勞動條件與勞動生產物的獨立和分離的形態，就是和機器一起，發展成為完全的对立性。所以，勞動者對勞

动手段之粗暴的反抗，是初次和機器一同發生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3—525頁)

工廠制度之異常的跳躍的伸張力，和它對於世界市場的依賴性，必然會引起熱病樣的生产，以致市場過充，并由市場的收縮，引起生产的殘廢。工業的生命，不絕地在中平的活躍，繁榮，生产過剩，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中變動。而機器經營在工人職業和工人生活狀況上引起的不確實性和不安定性，也與工業循環的周期變化，一同成為常態的。除了在繁榮時期，資本家間總是要爆發激烈的鬥爭，以便在市場上，獲得個人的勢力範圍。各個人的勢力範圍，是與生产物的便宜程度成正比例的。為了這個目的，資本家搶着要採用改良的代替勞動力的機器，並搶着要採用新的生产方法。除此不說，每一次又總有這樣一個時候會到來，為求商品便宜起見，要強力壓下工資，使它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

工廠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是由工廠投資總額比例地增加得更迅速得多這個事實，引起的。但這個過程是在工業循環的漲潮退潮期中實行的。技術的進步——那或是在可能性上代替勞動者，或是在現實性上驅逐勞動者——也常常使這種增加發生中斷。所以，工廠的單純的量的擴大，雖然不僅會把被逐的工人，並且會把新的補充人員收進，機器經營的這種質的變化，卻會不絕把勞動者從工廠逐出，或把工廠的門關着，使新涌進來的補充人員不得進來。工人就是這樣不斷被排斥又被吸引，不斷地趕來趕去，同時在應募者的性別，年齡，和熟練上，也不斷發生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2—553頁)

……機器使用對工廠勞動者在生理方面發生的影響，大部分，是可以在農業上面避免的。但它使勞動者發生過剩現象的作用，却在農業上面更強烈，更無抵抗。這一點，我們也將在以後詳細看到。為說明起見，我們就以劍橋及薩福克二州的情形為例罷。最近二十年以來，這二州的耕地面積大大增加了，在同時期，農村人口卻不僅相對地減少了，並且已經絕對地減少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17頁）

……由資本積累引起的勞動價格的提高，不外假定下述二事之一：

或是勞動價格繼續騰貴，因為它的騰貴不致妨礙積累的進行。這件事，沒有何等值得驚異的地方。亞當·斯密講過：“利潤縱然下降，資本不僅會繼續增加，而且會較以前更為急速地增加。……利潤小的大資本，一般都較利潤小的資本，增加得更快。”（《國富論》第二篇，第189頁）在這種場合，很顯然，無給勞動的減少，不致侵害資本統治的擴大。——或是情形相反，勞動價格騰貴，使利潤的刺激鈍減，以致積累弛緩下來。在這種場合，積累會減退。但跟着積累的減退，積累減退的原因，即資本與可以剝削的勞動力間的不平衡，也歸于消滅。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就把它暫時造出來的障礙除去了。由是，勞動的價格，會再低落到與資本價值增殖欲相符合的水准，不管這個水准，是在工資騰貴以前的標準水准以上，還是在它以下，或是和它一致。我們知道：在第一場合，並不是勞動力或勞動者人口絕對的或比例的增加之減退，引起資本的過剩，反之，其實是資本的增大，使可以剝削的勞動力成為不足。在第二場合，也不是勞動力或勞動者人數絕對的或比例的增加之增進，引起資本的不足；反之，其實是資本的

減少；使可以剝削的勞動力（或寧可說它的價格）成為過剩的。資本積累上這種絕對運動，反映為可以剝削的勞動力的量的相對運動，並且好象要歸因於後者自體的運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8—779頁）

資本的積累原來雖只表現為資本之量的擴大，但如我們講過的，它會實現為資本構成上的進行不止的質的變化，不斷犧牲它的可變資本部分來擴大它的不變資本部分。

特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適應於這個生產方式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上的變化等等，不僅與積累的進步，或與社會財富的增大，採取一致的步驟。那是更迅速得多地向前進展的，因為簡單的積累，或社會總資本的絕對擴大，同時會伴有它的個別要素的集中；追加資本技術上的變革，同時會伴有原資本技術上的變革。在積累進行中，不變資本部分對可變資本部分的比率會一同發生變化。那種比率，如假定原先是1:1，現在就次第成為2:1，3:1，4:1，5:1，7:1等等；隨著資本擴大，它的總價值中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將逐漸由 $\frac{1}{2}$ 遞減成 $\frac{1}{3}$ ， $\frac{1}{4}$ ， $\frac{1}{5}$ ， $\frac{1}{6}$ ， $\frac{1}{8}$ 等等，同時轉化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逐漸由 $\frac{1}{2}$ 遞加成 $\frac{2}{3}$ ， $\frac{3}{4}$ ， $\frac{4}{5}$ ， $\frac{5}{6}$ ， $\frac{7}{8}$ 等等。因為勞動的需要，不是取決於總資本量的大小，而是取決於它的可變部分的大小，所以，不象我們以前假定那樣，是與總資本為比例的增進，却是隨總資本增大而累進地減少。它和總資本的量相比會相對地減少，而在總資本的量增大時，依加速的程度減少。不錯，隨著總資本增大，它的可變部分，或合併在總資本中的勞動力，也會增大，但其增大的比例，是不斷

遞減的。積累只當作一定技術基礎上的生產的擴大來發生作用的中頓時間，是縮短了。為要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勞動者，甚至為要在舊資本的不斷的形態變化中雇用既經在機能中的勞動者，不僅總資本有以累進比例來加速積累的必要。這種增大的積累與集中，又會成為一個源泉，以致引起資本構成上的新變化，促使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相比，更加速地趨於減少。資本可變部分這種加速的——隨總資本增加而加速，且較其增加更迅速地加速——相對的減少，會在另一方面，相反地表現為，勞動人口的絕對增加，不斷比可變資本或勞動者的雇用手段的增加更為迅速。資本主義的積累會不斷產生出，並且正好是比例於它的力量和它的範圍，不斷產生出一個相對的，超過資本平均價值增殖需要的，從而過剩的或過多的勞動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它的積累的运动，有時引起周期的變化，有時是把運動的各種要素，同時分布在不同諸生產部門。在若干部門，資本構成的變化，無須有資本絕對量增加，而由單純的積聚引起；在其他部門，資本的絕對增加，和它的可變部分或其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一起；更在其他部門，資本時而在它的一定技術基礎上繼續增大，並比例於這種增大，吸引追加的勞動力，又時而變更它的有機構成，縮小它的可變部分。但在一切部門，可變資本部分的增加，從而，被雇用的勞動者人數的增加，總是和過剩人口的激烈變動，和它的暫時生產結合在一起，不管那是採取較顯著的形態，將已雇勞動者排斥出去，還是採取較不顯著但非較不確實的形態，使追加的勞動人口越發難於吸入通常的水道。已在機能中的社會資本的量及其增加程度增進了，生產規模與其所推動的勞動者人數增進了，他們的勞動的生產力發展了，財富一切源泉之流更廣泛更充實了，資本對勞動者的較大的吸引力與資本對勞動者的較大的排斥力，就會跟着依較大的規模結合在一起，資

本有机构成及其技術形態的變動的迅速性就會跟着增加，同時或交替發生這種變動的生產部門就會跟着增加。因此，勞動人口造成資本的積累時，就以不絕增大的範圍，造出各種手段來使自己變為相對多餘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法則。事實上，每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它的特殊的歷史上適用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只存在於歷史上不會受人類干涉的動植物界。

.....

以上我們假定，被雇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或減少，是恰好與可變資本的增加或減少符合的。

但資本所支配的勞動者人數保持原狀或減少時，可變資本還是可以增加，如果個別勞動者供給了較多的勞動。所以，他的工資會增加，雖然勞動價格不變，乃至下落，不過下落得慢於勞動量的增加。在這場合，可變資本的增加，是勞動增加的指數，但不是被雇勞動者人數增加的指數。每個資本家都有這種絕對的利益，要使一定量的勞動，由較少數的勞動者，而不由較多數一樣低廉甚至更為低廉的勞動者榨取出來。因為在後一個場合，不變資本的支出，須比例於所推動的勞動量而增大，在前一個場合，不變資本的增大，會較緩慢得多。生產規模愈大，這個動機也愈加有力。它的力量是隨資本積累一同增大的。

我們講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與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同時是積累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使資本家對於個別勞動力可以實行更延長的或更厲害的剝削，並由此，由同一可變資本的支出，推動較多的勞動。我們還講過，因為資本家是漸次用不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代替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兒童代替成年，所以他還可以用同一的資本價值，購買較多的勞動力。

因此，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較大的可变資本，不用雇用較多數的劳动者，已經可以推动較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量可变資本，会由同量的劳动力，推动較多的劳动；最后，更由較高級劳动力的驅逐，推动更多的較低級的劳动力。

所以，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劳动者的游离，比之生产过程在积累进步中加速的技术革命，和相应的可变資本（与不变資本相比）的比例减少，是进行的迅速得多。如果生产資料在它的范围与作用加大时，只依照更小的程度，成为劳动者的雇用手段，这种关系又不免要由以次的事实来修正：比例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資本会使劳动的供給，比它自身对劳动者的需要，增加得更迅速。工人階級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增大了产业后备軍的队伍；而在反方面，产业后备軍由竞争所加于就业部分的加大的压力，又強迫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于資本的支配。工人階級一部分因为別一部分过度劳动而被迫得无事可做的情形，以及反过来情形，成了个别資本家的致富手段，同时又适应于社会积累的进步，依相应的規模，来加速产业后备軍的生产。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这种要素是如何重要，可以拿英国为例来証明。英国“節約”劳动的技术手段是頂高明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一般限制于合理的程度，把工人階級的各个阶层就年龄和性別再行适当配置，那末，要以現存的劳动人口，来繼續現有規模的国民生产，是会絕對不足罢。现在“不生产的”劳动者，大多数会不得不轉化为“生产的”劳动者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2—802頁）

■

社會的財富，機能中的資本，它的增加的范围與能力，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和他們的勞動的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以利用的勞動力會和資本的膨脹力，由相同的原因來發展。所以，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會和財富的潛力一同增加。但和現役的勞動軍比較起來，產業後備軍越大，常備過剩人口也就越大。他們的貧困與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是成反比例的。最後，勞動者階級中的求乞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正式認為待救恤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积累的絕對的普遍的法則。如同其他一切法則一樣，這種法則，會由多種多样的情形，在現實運用上有所修正，但此等情形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范围。

我們可以理解，教勞動者們把他們的人數適合於資本價值增殖需要的經濟學大師們，是怎樣愚笨了。使勞動者人數不斷適合於這個價值增殖需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產與积累的機構。這種適合的開頭一字，是一個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創造；結尾一字，是現役勞動軍中一個不斷增大的階層陷於貧困，和待救恤的貧困成為一個重負。

由於社會勞動的生產率的進步，用愈益減少的人力支出，已經可以運轉數量不斷增大的生產資料這樣一個法則，在資本主義（在那裡，不是勞動者使用勞動手段，而是勞動手段使用勞動者）的基礎上，是象下面這樣表現的：勞動生產力越高，勞動者加在他們的雇用手段上的壓迫就越大，從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本人力量的出賣，這種力量是被用來增加別人的富，來促進資本的價值增殖的——就越是不安定。所以，生產資料與勞動生產率比生產的人口增加得更為急速這件事，是資本主義地，相反地，表現為這樣一件事：勞動者人口比資本的價值增殖需要，不斷增加得更為急速。

本書第四篇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時候，我們知道，在資本

主义体系内部，增进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切方法，是以个别劳动者为牺牲来实行的；生产发展的一切手段，都轉化为对于生产者的支配手段和剝削手段，把劳动者殘廢为一个部分的人，把他貶为机器的附屬物，破坏劳动的内容，使其成为苦工，并比例于科学当作独立力量被合并于劳动过程的程度，从他那里，夺去劳动过程的灵牲力；变更了他的工作条件，使他在劳动过程中，不得不服从卑鄙而可憎的专制；把他的全生涯轉化为劳动时间，把他的妻儿拖到資本的轆杀車輪下面。但是，所有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同时都是积累的方法，积累的扩大又都要反过来成为那各种方法的发展手段。所以这里就可以得出結論說，資本越是积累，劳动者不管所得的工資是高是低，他的地位总归要以同一比例趋于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軍常常与积累的范围和能力保持均衡的法則，又把劳动者牢牢鎖在資本上面，比火神黑伏士多斯把巨神普洛麦雪斯鎖在枷鎖上，还要鎖得堅牢。这就引起一个与資本的积累相适合的貧困的积累。在一极有財富的积累，同时对极，那个把自己的生产物当作資本来生产的阶级，就有貧困，劳动折磨，奴隶制，无知，粗暴及精神頹廢等等的积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

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1—813

頁）

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場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毀小屋而不断被驅逐：这种种現象是同时并进的。一个地方的人口愈是空虛，它的“相对过剩人口”就愈是大，他們对于雇佣手段的压迫就愈是大，农村人口在房屋以上的絕對过剩也就愈是大。由是，在村落方面，地方性的过剩人口与最易引起惡疫的人口拥挤現象，也愈是显著。人群密集

在分散的小村落和市鎮內，和農村地方強迫地使人口空虛的現象，是互相符合的。農村勞動者不斷過剩化的事實，會不管他們的人數在減少，不管他們的生產物的量在增大，成為他們陷入待救恤貧困的搖籃。這種最後必然要發生的待救恤貧困，又成為驅逐他們的一個動機，成為他們的住宅狀態變得非常可憐的主要原因，使他們失去最後的反抗力，使他們變成地主和租地農業家的完完全全的奴隸，以致工資的最低限，就當作自然律釘在他們身上了。另一方面，農村雖然有不斷的“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又有人口不足。這種現象，不僅局部地，可以在人口過於激急流向城市，礦山，鐵道建築等等方面的地點看到。並且，這種現象，在春夏之交，在收穫季節，在英國極周到而集約的農業需要額外工人的許多時期，也隨在可以見到。這就是說，農業勞動者對於耕作上平均的需要，總是過多的，而對於耕作上例外的或暫時的需要，總是過少的。由是，我們在官方文件中，就發現在同一個地方，同時訴說勞動不足又訴說勞動過多的矛盾。暫時的或地方性的勞動不足，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不過把婦女和兒童趕到耕作上去。把勞動者的年齡壓下。婦女和兒童的榨取一經發生作用，就要反過來，成為一個新手段，使耕作上的成年男勞動者過剩，從而，把他們的工資壓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4—876頁）

……在生產可以急速增加的各個產業部門（即真正的製造業，開礦業等等），價格的提高又會促成突然的擴大，並立即有崩潰跟着起來。在勞動市場上，這種影響也會發生。大量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甚至有職業的勞動者，將會被吸收到新的營業去。一般說，象鐵路建築那樣大規模的企業，將會從勞動市場，吸去一定量

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只有从那些需要大力气的营业部門（如农业）夺取过来。这种现象，甚至在新企业已經成为根基穩固的营业部門，它所需要的流浪劳动者阶级已經形成之后，还会发生。铁路建筑工程暂时超出平均規模来进行的时候的情形，就是这样。用压力把工资压下的工人后备队一部分，是被吸收了。工资到处上涨起来，甚至对于劳动市場上一向待遇就好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情形会維持下去，以至不可避免的恐慌，把工人后备队再游离出来，使工资再降到最低程度，甚至降到这个程度以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379頁）

資本主义的生產过程，本質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我們曾經說明，在資本主义生產的进步中，不过必須要再生产和保存的价值量，甚至会在所使用的劳动力保持不变时，随劳动生产率增进而增进并且增加。但随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量（生产資料形成其中的一部分），还会更增大起来。这种追加的富，就是靠占有追加的劳动，所以能够再轉化为資本；但这种追加的劳动，并不是依存于这种生产資料（生活資料包括在內）的价值，而是依存于它的量；因为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不是与生产資料的价值有关，而是与生产資料的使用价值有关。但积累本身及由此引起的資本积聚，却是生产力增进的一个物質手段。在生产資料的这种增加中，又包含劳动人口的增加，包含一个与剩余資本（surplus-kapital）相适合，甚至大体上总是超过这种資本需要的劳动人口即过剩劳动人口的創造。剩余資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劳动人口的现象，会依两重的方法发生作用。一方面，这种暂时的超过，将提高工资，緩和那种种使劳动者子女死亡破坏的影响，使人們更容易結婚，从而使劳动人口漸次增加。但另一方面，它又会由各种創

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的采用,更迅速地多地创造出一种人为的相对的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会反过来,再成为人口现实迅速增加的暖房,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内,贫困会生出人口。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那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的性质,就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决定要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加了,这个增大的量,总是随手可以找到一个相应增加或过度增加的可以剥削的劳动人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256—257页)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劳动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会依同比例发展,并不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减小了,而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增加了;那就是,不是由于劳动与生活资料(或生产这种生活资料的资料)间的绝对的不平衡,而是由于这样一种不平衡,那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引起的,那就是资本累进增加,它对于增加着的人口的需要却相对减少的不平衡。

利润率下降百分之五十,就是下降一半。如果利润量要保持不变,资本就必须倍加。因要使利润量在利润率减少时保持不变,指示总资本增加的乘数,必须与指示利润率下降的除数相等。利润率由四十减到二十,总资本就要反过来依照二十比四十的比例增加,方才能使结果不变。如果利润率由四十减到八,资本就要依照八比四十的比例增加,那就是五倍。资本一百万,利润率百分之四十,会生产四十万;资本五百万,利润率百分之八,同样会生产四十万。必须如此,结果才保持不变。若要使结果增加,资本就要比利润率下降,依照更大的比例来增加。换言之:因要使总资本的可变部分,不仅绝对地保持不变,并且绝对地增加(虽然当作总资本的部分,它的百分比是下降了),总资本就要比可变资本的百分

比下降，依照更大的比例來增加。總資本必須如此增加，以致它在它的新構成上，不僅需有舊的可變資本，並且需有更多的可變資本，來購買勞動力。如果一個資本一百的可變部分由四十減到二十，總資本就須增加到二百以上，方才能使用一個比四十更大的可變資本。

即使被剝削的勞動人口數保持不变，只有勞動日的長度和強度增加了，所使用的資本量也還是必須增加，因為要在變化了的資本構成和舊的剝削關係下使用同量勞動，資本量是必須增加的。

所以，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步中，一方面，表現在利潤率愈益下降的趨勢中，另一方面，是表現在所佔剩餘價值或利潤的絕對量的不斷增加中；所以，大體說來，可變資本和利潤的相對減少，是與二者的絕對增加相適應的。象我們講過的那樣，這種二重的作用，只能表現在總資本的比利潤率下降更為迅速的增加上。為了要在較高的構成上，或在不變資本增加得相對更多的情形下，使用一個絕對增加的可變資本，總資本不僅須比例於較高的構成而增加起來，並且要比它增加得更迅速。由此，就得到結論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越是發展，為了要使用同量勞動力，一個愈益更大的資本量是必要的；如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加如此。因此，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必然會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生出一個永久的顯而易見的勞動人口過剩。……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261—263頁）

勞動人口因社會總生產物中當作資本發生作用的部分增加而發生現實增加的刺激時，與此同時，有些要素會發生作用，形成一個僅僅相對的過剩人口。

.....

各種生產力發展時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相比的相對減少，會在繼續造出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時，為勞動人口的增加給予一個刺激。……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296—297頁）

投在工資上面的可變資本儘管相對地減少了，但絕對的勞動者人數仍然會增加這一件事，不會在一切生產部門發生，也不會在一切生產部門以相等的程度發生。在農業上面，活勞動要素的減少，便可以是在絕對的。

並且，工資勞動者人數儘管相對減少了，但會絕對增加這一件事，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對於這個生產方式，只要勞動力無需每日使用十二小時至十五小時，那就會使它成為過剩。生產力的發展，只要會減少勞動者的絕對人數，那就是，只要會使全國能在較小時間內完成他們的全部生產，就會引起革命，因為它會把多數人口趕到活路之外。在這裡，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限制，再表示出來了。它由此表示了它決不是生產力發展和財富生產的絕對形態，卻寧可說會在一定點上與它們陷於衝突。這種衝突，部分地，表現為週期的危機，這是由於勞動人口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在他們的舊使用方式上成為多餘所致的。它的限制便是勞動者的剩餘時間。……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315—316頁）

……租地農業家叫嚷著要求減低地租。在個別情形下，要求是被容納了。但平均地說，他們的這種要求是失敗了。因此，他們就大量採用蒸汽發動機與新機器，要由生產成本的減低等等，來找

到出路。此等机器的采用，部分地代替了馬，把耕馬从經營上驅逐出来，但部分地，也把农业日佣劳动者游离出来，由此造出一个人為的过剩人口，并由此引起工资的新的下降。并且，在这十年間，尽管农业人口比之总人口的增加，是一般地相对地减少了，甚至在少数純农业区域，还是絕對地减少了，上述的情形还是依然发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820—821頁）

与总人口相比，一国的生产人口越是小，该国就越是富，这好比对于个个資本家，生产同量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劳动者是越少越好。生产物的量相等，則与不生产的人口比較，生产的人口越是小，该国就越是富裕。因为，生产人口之相对的少数，不过是劳动有比較高度的生产力这件事的別一个表示。

从一方面說，資本的趋势，是把商品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時間，从而使生产人口的数目，与生产物的量相比較，减到一个递减的最小限度。但从另一方面說，資本又有一种趋势，要蓄积，要把利潤轉化为資本，要尽可能占有別人的劳动。資本总想压下必要劳动的比率，但在必要劳动的比率为已定时，則要尽可能使用大量的生产劳动。

在这个問題上面，生产物对人口的比例，是无关輕重的。谷物和棉花，可以和葡萄酒，金剛石等等交换；或者，劳动者能够被使用在不直接新加在可消費品內的生产劳动上，例如鉄道建筑等等的工程上面。假設，有一个发明之后，資本家以前要使用二万鎊的事业，現在只須使用一万鎊（因为有一万鎊已經很多），并且以前它会提供百分之十，現在会提供百分之二十，当作利潤，从而，現在一万鎊所提供的利潤和以前二万鎊所提供的利潤一样多。但他仍旧

不会因此便把以前当作资本用的一万镑，当作所得来使用。（直接把资本化为所得的事情，只在国债的场合，会成为问题。）他尽可以把它投到别处；并且，还会把它的利润的一部分化为资本。

在经济学者（就一方面说，李嘉图也包括在内）的著作里，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发现了这样一个二律背反。机械会驱逐劳动，增加纯所得——尤其是常常会增加李嘉图这里所说的纯所得，即增加所得所从以消费的生产物量。它会减少劳动者数，增加这种一部分由不生产劳动者消费，一部分会在国外被用来交换的生产物等等。所以这好象正是我们所愿欲的状态。但不是的。在这场合，我们要证明，机械会不会把劳动者排除出来。怎样证明这点呢？由这一点：机械，在一个激动之后，——对于这种激动，那些恰当其鋒的人口阶层，也许不能有任何的抵抗——所使用的人数将会比机械采用以前更众，所以，“生产劳动者”的人数再会增加起来，旧关系再会确立起来。

情形实际也是如此。所以，劳动的生产力尽管增加，劳动者人口还会不断增加。比例于生产物（和劳动人口一同增加，并且更迅速增加的生产物）来说，虽然不会如此，但比例〔于人口〕来说，却确乎会如此——比方说，如果同时资本会累积起来，从而生产阶级中原来〔自立的〕部分，会沦为无产阶级。在生产阶级的这一部分里面，一小部分将升进为中等阶级。但不生产阶级会忧虑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消费。利润不断再转化为资本的事情，会不断依更广阔的基础，再形成同一的循环。在李嘉图，对蓄积所怀的关心，比对纯利润所怀的关心还要迫切，以致纯利润是当作蓄积的手段，热心地被称赞了。

因此，劳动者一方面受警告，一方面又受慰安，两方面恰好相反。劳动者似乎通例会关心资本的蓄积，因为对劳动者的需要就是依存于此。如果这种需要增进了，劳动的价格也会增进。所以，

好象他們會願望工資被壓下來；要這樣，那種從他們那里取得的剩餘價值，才会在被資本濾過之后，再被用來購買新的勞動，並提高他們的工資。不過，工資提高是不行的，因為它會阻礙蓄積。在這場合，他們又必須停止生育兒女。由此，勞動的供給會減少，勞動的價格會增加起來。但這種增加會減小蓄積率，減少對勞動的需要，從而又使勞動下落。在勞動的供給減落時，資本會更迅速地跟着減少。但他們會生育兒女。由此，增加他們自己的供給，減低勞動的價格；由此，利潤率會增加起來，資本的蓄積也會增加起來。但勞動者的人口，應與資本的蓄積，以同一步調進行，那就是，勞動人口應精確地在數量上，與資本家需用的勞動人口相等。勞動者人口原來也就是這樣的。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321—323頁）

……在農業上面，資本家依照傳統的习惯，（當旧的租地農業家變成資本家時，資本家也變成租地農業家了），自始就要在他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來給予土地所有者，而為要補償這個起見，他就把工資壓到工資的水准以下了。勞動者離開農村時，勞動工資是必須騰貴的，並且會騰貴起來。但這種壓迫一經感到，機械等等之類的東西，就被導入了。於是，在農村，再發生了（相對的）過剩人口（例如英格蘭）。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163—164頁）

“資本的蓄積，必然會在勞動諸使用者間，引起更激烈的競爭，從而使勞動價格提高”。（李嘉圖：《論原生產物稅》）

這要看，在資本蓄積時，資本的諸不同成分是以什麼比例增

加。在資本蓄積時，勞動的需要是可以絕對或相對減少的。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656—657頁）

……機械的發明和自然力的應用，把資本和人（勞動者）游離出來。游離的手（斯杜亞稱之為 free hands）會和游離的資本一同被創造出來——在這裡究竟是有新的生產部門創造出來，還是舊的生產部門行將擴大，並依照較大的規模去經營，是可以不管的。

機械和自然力的採用，使那種能在工資上面支出的生活資料量得以減少。比方說，在用馬代替人，或用畜牧代替谷物耕作的場合，這個情形就會有一部分在農業上出現。〔如果情形不是這樣，則依照李嘉圖的前提〕，那由機械或自然力游離出來的基金，必須當作可變資本來支出了，好象生活資料的輸出是不可能的，生活資料不能由不生產勞動者消費，一定部門的工資也不能夠提高一樣。那就是，〔依照李嘉圖的前提〕，這個基金好象必須支出在游離的勞動者身上。實則，機械常常會造成相對的過剩人口，造成勞動者的預備軍。資本的權力就由此大大增加了。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675頁）

資產階級對於機械的辯護見解全部，並沒有否認：

（1）機械會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裡但不斷使人口一部分成為過剩的，把勞動人口一部分擲上街頭。它會引起一個過剩人口，從而時而在这个部門時而在那個部門把工資壓下，不是因為人口比生活資料增加得更迅速，卻是因為，因有機械之故，生活資料的迅速增加，使人們可以採用更多的機械，從而減少對勞動的直接需

要。不是因为社会基金已經减少，却是因为这个社会基金增加的结果，其中一部分，即支用在工資上面的部分，会相对减少下来。

(2) 辯护学者們还更不否認机械劳动者的隶屬性，更不否認被他們驅逐而归于沒落的手劳动者或手工业劳动者的困苦。

他們假定——这种假定，就一部分而言是不确的——〔1〕因有机械之故，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純所得，利潤和地租，会这样增加起来，以至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侍役，会比以前更多；他以前必須在他的生产物中用更大的部分在生产的劳动上，現在他已經能够用更大的部分在不生产的劳动上，所以僕役及其他依賴不生产階級生活的劳动者将会增加。劳动者一部分漸进轉化为僕役，这是一个美好的期待。純生产物增加的结果，会有更多的部門，为不生产的劳动开放出来，这些不生产劳动者的利害关系，也多少和那些直接榨取他們的階級的利害关系相符合。

(2)〔除了僕役的增加，資產階級的辯护学者还假定〕，因蓄积将受到刺激，那些被排斥而待救恤的劳动者，至少，那代替他們的人口增加部分，将会在一个新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和过去的劳动比較而言，将只有更少的活劳动是必要的——由营业的扩大，而在机械建造业止被吸收，或在那些間接的因有机机械建造业方才必要并且开放的生产部門被吸收，或在那些由新資本开放并滿足新欲望的新营业部門被吸收。这里有了第二个美好的期待：劳动階級必須忍受暫时的不利——失业，劳动和資本由一个部門移到別一个部門——但工資劳动决不会因此終止，却多分依照益益加大的規模再生产出来，絕對增加起来，虽然和使用它的正在增加中的資本相比較，它是相对减少了。

(3) 因有机械之故，消費将会精良化。直接生活資料的低廉化，使奢侈品生产的范围，可以扩大起来。因此，劳动者們又有了第三个美好的期待：同量生活資料，同数劳动者，使上层諸階級，

可以擴大他們的享受的範圍，可以把他們的享受精良化，多樣化，從而，使他們和勞動者階級間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鴻溝深化。對於勞動者們，這確實是由勞動生產力發展引起的美好的期待和值得羨慕的結果。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694—696頁）

有兩種趨勢，不斷交錯着：〔第一是〕，為生產同量或較大量商品，為生產同量或較大量純生產物，純收入，剩餘價值，而使用尽可能最少的勞動，第二是使用尽可能最大的勞動者數（雖然和他們所生產的商品量比較而言，是尽可能最小），因為在一定的生產力階段上，剩餘價值和剩餘生產物的量，是和所使用的勞動量，一同增加的。

一個趨勢，是把勞動者擲到街頭，並引起過剩人口。別一個趨勢，是再把他們吸收，並絕對擴大工資奴隸，以至勞動者不斷徘徊在他的命運之前，決不能從此逃出。從而，勞動者會把他自己的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看做是和他自己對敵的。他這樣看，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另一方面，資本家又把他看作是一個不斷和生產分離的要素。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698頁）

一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因有競爭而變成為每一個廠主所必須遵守的法則，同時也就是使工人群眾不斷加緊從工廠里被排擠出去——產業後備軍的產生。另一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點也成了每一廠主所必須遵守的競爭法則。從兩方面都是引起生產力空前發展，提供超過需求，生產過剩，市場充斥，每十

年重复一次的危机，連环套：这里是生产資料和生产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存資料的工人过剩。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
1955年中文版，第163頁)

……城市人口(一般地說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增加，不仅是目前的現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資本主义規律的普遍現象。这个規律的理論基础，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經指出的，第一、在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門脱离了原始农业，第二、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的可变資本一般地說是减少了。……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和个别时期，可以看到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要的可变資本在增长，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普遍規律的正确性。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轉化为絕對减少，絕對减少的程度也取决于資本主义殖民地的扩大，……。工业从农业中抽走最有力、最强壯、最有知識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現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和俄国也是如此。資本主义所造成的文明的城市和野蛮的乡村的矛盾，必然会产生这种結果。……在人口总数增加(城市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如果不輸入粮食，农村人口的减少也完全可以想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使比較少的工人生产象从前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在农业人口减少和农产品减少(或不按比例地增加)的情况下，人口总数增加也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是因为資本主义使人民更加食不果腹。

(列寧：《农业中的資本主义》，1899年，《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3頁)

2. 產業後備軍是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

但是，一個剩餘的勞動人口，固然是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積累或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這種人口過剩也會反過來，變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槓桿，甚至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條件之一。過剩的人口，形成一個可以處分的產業後備軍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它象是由資本出錢養成的一樣，絕對隸屬於資本。不管人口的現實增加有何等限制，它總歸可以為資本價值增殖上的變動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以剝削的人身物質 (*Menschenmaterial*)。資本的突然伸展力，會隨積累，隨那種和它陪伴在一起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增大起來，不僅因為機能中的資本的伸縮性加大了，不僅因為資本僅在其中形成一個可伸縮部分的絕對財富增大了，也不僅因為信用每次受到特殊刺激，就馬上會把那種財富的異常大的部分，當作追加資本，交給生產去支配。生產過程自身的技术條件，機器，運輸手段等等，還允許把剩餘生產物極迅速地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積累進步而充溢起來，得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流進那些突然把市場擴大了的舊生產部門，或流進鐵道（其需要，是由舊市場的發展而產生）一類新形成的生產部門。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突然有巨數的人，在不損害其他生產部門的規模的限度內，在決定點上供給出來。這是由過剩人口供給的。近代產業的特征的生產過程，相當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的十年循環（其間有各種小的變動把它中斷）形態，就是以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多少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一種現象作為基礎。但產業循環的各種轉變，也生出新的過剩人口，並成為它的最有力的再生產因素。

近代產業這種特殊的生產過程，在人類任何以前的時期，都

是我們看不見的。就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期，也還是不能的。那時，資本構成只極其緩慢地變化，所以，大體說來，勞動需要的增大，是與資本的積累相符合。與近代相比較，那時資本積累的進步是遲緩的。它碰着了可以剝削的勞動人口的自然限制。這種限制，只是凭借於我們後面將要述及的強力手段，才被排除掉。生產規模之突然的突擊性的展開，是它的突然收縮的前提；後者又喚起前者，但前者沒有可供利用的人身物質，沒有與人口絕對增加相獨立的勞動者數的增加，是決不可能的。這種增加，是由勞動者一部分不絕被“游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造成的，是由那些使被雇勞動者數比於增大的生產而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近代產業的全部運動形態，是由一部分勞動人口不斷轉化為失業者或半就業者這件事生出來。信用的伸縮，不過是產業循環周期變化的征候。政治經濟學會把它看為是它的原因，那就顯示了它是如何淺薄。象天體一經投入一定運動中，會不斷反復同一的運動一樣，社會的生產一經投入那種交替着伸展和收縮的運動，也就是這樣。結果會反過來變為原因。會不斷把它自身的條件再生產出來的這全部過程的轉變，是採取周期性的形態。這件事一旦固定下來，政治經濟學就把相對過剩的即超過資本平均價值增殖需要的人口的生產，當作近代產業的生存條件來理解了。

先任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後充英國殖民地部官吏的亨利·麥利維爾(H. Morivale)說：“假設在一個危機當中，國家掙扎着要把幾十萬過剩軍隊移往國外，那將會引起怎樣的結果呢？結果就是，勞動需要第一次恢復時，勞動就將感到不足。人類的繁殖無論怎樣迅速，要把成年勞動者補充起來，也非有一代的期間不可。我們製造業者的利潤，大體依賴這樣一種力量，那就是利用暢銷時期來补偿停滯時期的損失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由於機器與筋肉勞動的支配權來保證。他必須在手邊准备好可以利用的勞動者；他

必須能够依照市況，在必要時，伸張或收縮他的營業活動。不然的話，要想在競爭哄逐中，維持那種當作我國財富基礎的優勝地位，就會是不可能的。”連馬爾薩斯（他依照他的可鄙的看法，把它理解作勞動者人口的絕對過剩，不是把它理解作勞動者人口的相對過剩）也認人口過剩，是近代產業的一個必然。他說：“結婚的慎重習慣，如果在一个主要依賴于工商業的國家相當通行于勞動者階級間，那將于國家有害。……從人口的性質說，要在有特殊需要時，對市場供給追加的勞動者，勢非經過十六年乃至十八年不行。但由節約，以所得化為資本的過程，可以進行得遠較為速。勞動基金比人口增加得更速，是一個國家經常有得發生的事情。”政治經濟學在這樣把相對過剩勞動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一個必然以後，又合乎其分地，以老處女的姿態，擺出資本家的臭架子，把以下的字眼，放在口里，告訴那些只因為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方才致于被驅逐的“過剩者”（Ueberzähligen）說：“我等製造業者，為諸君曲盡所能，來增大諸君必須靠來生活的資本；其餘的事情就要由諸君自己去做，因為諸君必須使諸君的人數，適合于生活資料。”

資本主義的生產，決不滿足于人口自然增殖所供給的可以利用的勞動力之量。它為了要有它的自由活動，需要一個和這種自然限制相獨立的產業後備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6—799頁）

資本同時在雙方作用着。一方面，它的積累，增大了勞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由勞動者的“游離”，增大了他們的供給；同時，失業者的壓力，又使就業者不得不發動較多的勞動，以致在某限度

內，使勞動的供給與勞動者的供給相獨立。在這個基礎上，勞動供求律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勞動者工作愈是多，為他人生產的富愈是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愈是增加，他們當作資本價值增殖手段所盡的機能，就愈是增加他們的不安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6頁）

……現在說到製造業：在手織工人漸次餓死的那許多年中，英國棉織物的生產和輸出，是驚人增加了。同時（1838—1841），食料品的價格增高了。這些織布工人沒有可以披體的破舊衣服，也沒有可以維持肉體和靈魂的充分食物。只能在熱病似的繁榮時期被吸收的過剩人口之不斷的人為的生出，正是近代工業的必要生產條件之一。而同時，貨幣資本仍不妨有一部分在荒廢而不被人使用的狀態中，以至生活資料的價格因相對的過剩生產而下落，同時因機械而被游離出來的勞動者，則在飢餓中。

當然，在結局上，那些被游離出來的勞動，和那個被游離出來的所得部分或資本部分，將會在一個新的生產部門或在舊生產部門的擴大中，尋到出口，（但這個話，對於被解雇者們的補充兵，比對於他們自己，是更適用的）。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682—683頁）

……大機器工業的發展只能以飛躍方式、以繁榮時期與危機時期的周期性的更替方式進行。小生產者的破產由於工廠的這種飛躍式的增長而更厲害了。工人時而在興旺時期大批地被工廠吸收進去，時而又被拋擲出來。甘願從事任何工作的失業者廣大後備軍的形成，成為大機器工業存在與發展的條件。……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8頁)

3. 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种形态

相對的過剩人口，在一切可能的色層上存在着。每一個勞動者，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狀態中的，都屬於過剩人口。產業循環諸階段的轉變，對於它，會形成各種周期反復的大形态，以致時而在危機中激烈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疲滯時慢性地表示出來。如果我們不要說到這些，它就不斷具有三種形态：流動的，潛伏的，停滯的。

在近代產業中心——工廠，製造廠，熔礦所，矿山等等——勞動者時而被排斥，時而再依較大的範圍被吸收，大體說來，被雇者人數是在增加的，雖然與生產規模比較，增加率是在不斷低落。在這裡，過剩人口就是存在於流動形态。

在嚴格的工廠和一切有機器當作因素加入或只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人們使用着大群還在少年時期的男性工人。一達到成年期，他們能在同一產業部門繼續被使用的，只有極少數，多數依照通例是要被解雇出來。此等被解雇者，是流動過剩人口的一個要素。這個要素是和產業的範圍一同增大的。他們一部分會流出去，事實上，只是跟在流往外國的資本後面。結果之一，是女性人口較男性人口增加得格外迅速。例如在英格蘭。勞動者人數的自然增殖不夠滿足資本的積累需要同時又超過那種需要，是資本運動本身的一個矛盾。資本需要較多的還在少年期的勞動者，較少的成年男性勞動者。但是還有別一個矛盾，是一樣露骨的：因

有分工把他們拘束在特定產業部門之故，在有數十萬勞動者失業的地方，同時却有人訴說勞動者缺乏。勞動力是異常迅速地由資本消費掉，以致大多數勞動者一到中年，就多少成為衰老的。他們落到失業者隊伍中，或由更高的地位，降到更低的位置。我們正好在大工業的勞動者那里看到最短促的生命。曼徹斯德的保健醫官李醫師(Dr. Lee)說過：“在曼徹斯德，中等階級的平均死亡年齡，為三十八歲，工人階級的平均死亡年齡為十七歲。前者在利物浦為三十五歲，後者為十五歲。所以，特權階級比下層市民，是有兩倍以上的生存權。”在這種情形下，無產階級這個部分的絕對增大，必須採取這樣一個形態：它的人數增加，雖然它的要素急速地歸于磨滅。勞動者的世代是急速地更替着（這法則，對於全人口中其他各階級，是不適用的）。這種社會需要，是由早婚（那是大工業勞動者的生活狀況的必然結果），和工人兒女的剝削對於生育兒女所給予的獎金，來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一侵入農業，或者說，比例於它在農業方面支配的程度，農村勞動人口的需要，就會跟隨在農業上面發生機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減少下來，但這種人口排斥，不象在非農業的產業上一樣，會由較大的吸引力得到彌補。農村人口不斷有一部分，準備要轉化為城市的或製造業的無產階級，並窺伺着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情況（這裡所謂製造業，是指非農業的產業）。相對過剩人口的这个源泉，是不斷地流着。但他們不斷向着城市的流，是以農村自身不斷有潛伏的過剩人口，作為前提；這種過剩人口的範圍，在排出的水道例外地大開放時，才顯而易見。就因此故，農村勞動者的工資，才被壓到最小限度，他們經常是一隻腳站在待救恤貧困的泥坑中。

相對過剩人口的第三個範疇，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只有極不規則的職業。它對資本提供了一個取之

不竭的貯水池，蓄藏着可以利用的勞動力。他們的生活狀態，沉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標準水準以下。恰好就是這件事，使他們成為資本所特有的剝削範圍的廣大基礎。對於他們，特征是最高限度的勞動時間和最低限度的工資。它的主要形態，我們已在家內勞動項下知道了。他們不絕由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勞動者，得到補充；但也特別由那些沒落的產業部門——被手工製造業經營征服的手工業經營，被機器經營征服的手工製造業經營——得到補充。既然這種“過剩者”會隨積累的範圍和能量一同增大，所以這種過剩人口的範圍是會擴充的。同時，這種過剩人口，還是工人階級中一個會自己再生產並且永久化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總增加中，也較其他各種要素，占有着比較大的部分。實際上，與工資水準從而與各部類勞動者所得而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例的，不僅有出生與死亡的總數，且還有家族的絕對人數。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法則，在未開化人間，甚至在文明化的殖民地人間，會是毫無意義的。它叫我們想起了若干種動物的大量生殖。它們的個體是脆弱的，不絕遭受迫害的。

最後，相對過剩人口最深的底層，是屬於待救恤貧民的范围。把浪人，犯人，賣淫的人，簡言之，把嚴格的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除開來說，這個社會階層，包含三個部類。第一是有勞動能力的。我們只要把英國待救恤貧民的統計，皮毛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待救恤貧民的總數，隨危機而增大，隨營業復興而減少。第二是孤兒與待救恤兒童。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譬如在1860年那樣的大振興時期，他們會被急激地大量地編入現役勞動軍中。第三是墮落的，流蕩的，無勞動能力的，特別包含着那些因分工而被淘汰的人，是超過工人標準年齡的人；最後，是產業上的犧牲者，他們的人數隨危險機器，開礦事業，化學工廠等一同增加，例如殘廢人，病人，寡婦等等。待救恤的貧困，形成現役勞動軍

的殘廢院，產業後備軍的重負。它的生產，是包括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內；它的必然性，是包括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在一起，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財富發展上一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虛費(falsche Koste)，但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虛費的大部分，從自己肩上海，轉嫁到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肩上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7—811頁)

4. 資本主義社會人口構成的變化

假設由於產業生產力的增加，以前須有人口的三分之二，現在只須有人口的三分之一，直接從事物質的生產了。以前為供給全体的生活資料，須使用全人口的三分之二，現今只須使用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前三分之一是純所得，(與勞動者的所得相區別)，現在三分之二是純所得。丟開階級的对立性不說，國民以前把他們的時間的三分之一，用在非物質的生產上，現今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用在這上面了。平均分配下來，一切人現在已有更多的時間，從事不生產的勞動和休息了。但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內，一切都象是对立的，也实际是对立的。前提里面並沒有包含人口停滯的意思。全体人數增大時，那三分之一也可以增大。就量而言，会有不斷增加的人數，被使用在生產勞動上。但與全人口相對而言，比例而言，他們總比以前更少百分之五十。這三分之二，現今一部分是由利潤和地租的所有者構成，一部分是由不生產勞動者構成，但因競爭之故，這種不生產勞動者的給付也將會變劣。這種不生產勞

動者幫助着吃掉他們的所得，但要給或不得不給他們一種勞務做等價，象政治上的不生產勞動者一樣。除了僕役，兵士，水手，警察，下級官吏等等，妾婦，馬夫，滑稽表演家，我們可以假設，這些不生產勞動者，大體說來，會比以前的不生產勞動者，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並且，待遇微薄的技術師，音樂師，律師，醫生，學者，教師，發明家等等，也已經增加。

在生產階級之內，商業上的媒介人也會已經增加；而機械建造上，鐵路建造上，開礦事業上被使用的人，尤其是增加了。再者，在農業上經營畜牧業，並供給魚類及礦物性材料做肥料等等的勞動者，也增加了。而為工業種植原料的農民，和那種生產生活資料的農民比較，為家畜生產生活資料的農民，和那種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農民比較，也是這樣的。如果不變資本增加了，總勞動中從事於資本再生產的比例量，也會增加。並且，直接生產生活資料的那部分人的人數雖然減少了，可是他們所生產的生產物，會比以前更多。他們的勞動是更生產了。在個別資本的場合，可變資本部分與不變資本部分相對而起的減少，會直接表現為投在工資上面的資本部分的減少；同樣，就資本的總量說——在資本的再生產上——這種減少也會表現成為這樣：所使用的勞動總量，會有一個比例更大的部分，從事生產手段的再生產，只有一個比例更小的部分，從事生產物自身的再生產；那就是，有一個比例更大的部分，從事機械（包括交通機關，運輸機關，和建築物），補助材料（煤炭，瓦斯，油脂，皮帶等等），和當作工業原料的植物的再生產。與工業勞動者相比，農業勞動者將會減少。最後，奢侈品的勞動者將會增加，因為已經增大的所得，會消費更多的奢侈品。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1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310—311頁）

……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城市很小、工業少而不發達、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農業人口。現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一樣的國家了：有居民達二百五十萬的首都，有許多巨大的工業城市，有供給全世界產品而且幾乎一切東西都是用極複雜的機器生產的工業，有勤勞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從事於工業，完全是由另外的階級組成的，而且和過去比起來實際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習慣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個民族。……

我們已經看到，機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無產階級的誕生。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難以相信的速度增長起來，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階級。此外，愛爾蘭只是在十八世紀初才進入了平靜狀態，這裡的居民過去在發生騷動的時候被英國人殘酷地屠殺，減少了十分之一以上，現在也開始迅速地增長起來，特別是從工業繁榮開始吸引了許多愛爾蘭人到英格蘭去的那個時候起。大不列顛的巨大的工商業城市就是這樣產生的，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屬於工人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數很少很少的手工業者。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296頁）

……小工業創造了資產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并把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少數選民擁上寶座，可是，這只是为了後來在某個時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目前，無可爭辯的和容易解釋的事實，是“美好的舊時代”的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已經被工業所消滅，從他們當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貧窮

的工人。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頁)

……工業日益集中的趨勢並不就止于此。人口也象資本一樣地集中起來;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在工業中,人——工人,僅僅被看做一種資本,他把自己交給廠主去使用,廠主以工資的名義付給他利息。大工業企業需要許多工人在一個建築物里面共同勞動;這些工人必須住在近處,甚至在不大的工廠近旁,他們也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村鎮。他們都有一定的需要,為了滿足這些需要,還須有其他的人,於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面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裡來了。這種村鎮里的居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逐漸習慣於工廠工作,逐漸熟悉這種工作;當第一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廠主搬到這個地方來。於是村鎮就變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變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裡面來就愈有利,因為這裡有鐵路,有運河,有公路;可以挑選的熟練工人愈來愈多;由於建築業中和機器製造業中的競爭,在這種一切都方便的地方開辦新的企業,比起不僅建築材料和機器要預先從其他地方運來、而且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也要預先從其他地方運來的比較遙遠的地方,花費比較少的錢就行了;這裡有顧客雲集的市場和交易所,這裡跟原料市場和成品銷售市場有直接的聯繫。這就決定了大工廠城市驚人迅速地成長。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301頁)

……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階級和一个貧穷的階級，因为小資产階級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資产階級，这个过去曾經是最穩定的階級，現在变成了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險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許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錢，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狀況》，1844—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1—302頁）

……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階級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階級；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时虽然是軟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們和資产階級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們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的形成，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們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

（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狀況》，1844—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408頁）

当我们談到工厂工业在城市中心与乡村中心的发展速度的比較这个問題时，我們看到乡村中心在这方面无疑是站在前面的。……这样，工厂工业大概具有下列的趨勢：在城市以外特別迅速地发展；——建立新的工厂中心并比城市中心更快地把它們向前推进；——深入似乎与資本主义大企业世界隔絕的穷乡僻壤。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第一，大机器工业是以怎样的速

度改造着社會經濟關係，過去要幾百年才能建立起來的，現在只要十年就實現了。……社會分工得到了巨大的推動。居民的遷徙代替了昔日的定居與閉關自守而成為經濟生活的必要條件。第二，工廠向鄉村的遷移表明資本主義已經戰勝了農民村社的等級閉關自守為它設置的障礙，甚至從這種閉關自守里面取得了利益。在鄉村中設立工廠有不少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保證有廉價的工人。不讓農夫進工廠，——工廠卻來接近農夫。農夫不能完全自由地（由於連環保以及不許退出村社）去尋找最有利的僱主，而僱主卻非常善於尋找最廉價的工人。第三，相當數量的鄉村工廠中心及其迅速的發展表明，認為俄國工廠與農民群眾隔離以及俄國工廠對農民的影響十分微弱的意見是完全站不住的。相反地，我國工廠工業配置的特點表明，它的影響是很廣泛的，決不僅限於工廠牆壁之內。但是，另一方面，我國工廠工業配置的这个特點却不能不使大機器工業對其中作工的人所進行的改造受到暫時的阻礙。把偏僻地方的農民一下子變為工人，工廠就在若干時期內保證自己有最廉價、最不開化與要求最少的“人手”。但是，很明顯，這種阻礙只能是暫時的，而它的代價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影響範圍更加擴大。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7—479頁）

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勞動社會化，表現在下列過程中：……第二，資本主義在農業中和工業中都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生產集中以代替過去的生產分散。這是我們所考察的資本主義特點的最明顯和最突出的但決非唯一的表現。第三，資本主義排擠了人身依附的形式，這些人身依附的形式是以前經濟制度的不可缺少的附屬

物。俄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尖銳，因為生產者的人身依附，在我國不僅曾經存在（一部分現在還繼續存在）於農業中，並且還存在於加工工業（使用農奴勞動的“工廠”）、采礦工業及漁業中等等。與依附的或被奴役的農民的勞動比起來，自由僱傭工人的勞動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是進步的現象。第四，資本主義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動，這種人口流動是以前各種社會經濟制度所不需要的，在以前各種經濟制度下是不可能大規模發生的。第五，資本主義經常在減少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在農業中最落後的社會經濟關係形式始終佔着統治地位），增加大工業中心數目。第六，……資本主義破壞中世紀社會的狹隘的、地方的、等級的聯合，造成劇烈的競爭，同時把整個社會分成在生產中佔着不同地位的人們的幾個巨大的集團，給予每個這樣的集團內部的聯合以巨大的推動。第七，上述一切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舊經濟制度的改變，必然也會引起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經濟發展的飛躍性，生產方式的急劇改革及生產的巨大集中，人身依附與宗法式關係的一切形式的崩潰，人口的流動，大工業中心的影响等等，——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生產者的性格的深刻改變，而俄國研究者與此相當的觀察，我們已經指出過了。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8—549頁）

這樣，俄國工廠工人的統計材料完全証實了《資本論》的理論：正是大機器工業在工業人口的生活條件中進行了完全的和徹底的革命，使他們同農業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幾百年宗法式的生活傳統徹底分離。但是大機器工業在破壞宗法關係與小資產階級的關係時，另一方面卻創造了使農業中的僱傭工人與工業中的僱傭工人

相接近的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一般地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制度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佣农业工人与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8—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4页）

但是，把工厂村鎮和工商业村鎮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不能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迁徙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性，完全说明了俄国的这种显著的特征，即是：工业人口之内应当加入不小的一部分农业人口，这一部分人口是靠在工业中心工作而赚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谈一谈所谓外出作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种“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耕作农，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在叙述过上面的一切以后，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的脱离农业而转向工商业。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8—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9—520页）

这样，居民的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所掩盖了）、城市近郊、工厂村鎮与工商业村鎮的发展，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期中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并且现在还在发展的过

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同舊的生活形式比起來，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2頁）

愛爾蘭的人口，在1841年為八百二十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1851年減為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九百八十五人，1861年減為五百八十五萬零三百零九人，至1866年，更減為五百五十萬人，約與1801年的人口相當。這種減少，開始於凶荒的1846年。此後不到二十年間，愛爾蘭竟失去它的總人口十六分之五以上。自1851年5月至1865年7月，由愛爾蘭移往其他地方的總人數，為一百五十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其中，在1861年至1865年最後五年間移出的，有五十萬人以上。由1851年至1861年，住宅減少五萬二千九百九十棟。由1851年至1861年，十五英畝至三十英畝的租地，增加六萬一千；三十英畝以上的租地也增加一萬零九百，但各種租地的總數，卻減少十二萬。所以，這種減少，完全是由於十五英畝以下的租地的消滅，或者說由於它們的集中。

人口的減少，大體上說，自然會有生產物量的減少陪伴而生。對於我們的目的，只要考察由1861年至1865年五年也就夠了。在這五年間，有五十萬以上的人口移往國外，絕對的人口數減少了一百萬的三分之一以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82—883頁）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是农村人口；統治的，不是社会的劳动，而是个别分离的劳动；……大土地所有制，却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减小的最低限度，并在相反的方面，引起一个不断增长的工业人口汇集在大城市內。……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1061頁）

因为在商品經濟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結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經濟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門同农业分离。商品經濟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說，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經濟的发展 eo ipso（从而。——原編者注）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說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中，不变資本因可变資本减少而增加，但可变資本是绝对增加的，尽管它相对减少。相反地，在农业中，用来耕种一定数量土地的可变資本則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土地的时候，可变資本才能增加，而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多的增加为前提。”（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参看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2頁。）总之，沒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資本主义是不能設想的，并且誰都知道，这种現象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中表現得极为明显。……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們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結構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資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896—

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19—20頁)

……一切日益发展的商品經濟,特别是資本主义經濟的一个規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些,人口日益脱离农业而轉到加工工业中来。

(列寧:《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896—
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46頁)

但是,农民雇用工人这一事实是上述地区农民資产階級經營进步的最突出的标志。当地的土地占有者感到,他們的竞争者在不断增多,……但是,少数富裕农民的这一切进步給大批貧苦农民造成沉重的負担。……大多数农民在当地农业的进步中分摊到的全是不利的方面。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最后把他們从农民的行列中推出去。

(列寧:《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896—
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244—245頁)

……資本主义破坏了地方的閉塞性和狹隘性,打破了农民中世紀的狭小划分,而代之以全国性的大规模划分,即把农民划分为在整个資本主义經濟体系中占据不同地位的階級。如果說,过去的生产条件本身决定了农民群众固定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那末商业性的和資本主义性的农业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地区的形成,就不能不造成大量居民在全国各地的流动;而沒有居民的流动(正象上面已經指出的),居民的自覚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9頁)

關於俄國大機器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關係問題，上述的統計材料得出了如下的結論。俄國工廠工業的迅速發展，創立了巨大的並且日益擴展的生產資料（建築材料、燃料、金屬等等）市場，特別迅速地增加了從事製造生產消費品而非個人消費品的人口比例。但是個人消費品的市場由於大機器工業的發展也迅速擴大了，大機器工業把愈來愈多的人口從農業吸引到工商業方面來。……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3頁)

與居民離開農業而轉向城市一樣，外出做非農業的零工是進步的現象。它把居民從偏僻的、落後的、被歷史遺忘的窮鄉僻壤拉出來，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漩渦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覺悟，使他們養成文明的習慣和需要。“最高秩序的動因”，即彼得堡人的風度與浮華，吸引農民外出；他們尋找“更好的地方”。……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農民的公民人格，使他們從宗法的與人身依附關係及等級關係的深淵中解放出來，而這些關係在鄉村是十分厲害的……“人民中間個人的自我意識的增長，是助長外出的首要因素。從農奴制的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農村人口早已與城市生活的接觸，老早就在雅羅斯拉夫里省的農民中間喚起了一種願望：保衛‘自我’，從鄉村生活條件所注定的貧困與依附關係中解脫出來，而過富足的、獨立的與光榮的生活……以外出做零工來維持生活的農民感到自己更自由些，同其他等級的人

更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里省概述》第2編，第189—190頁）

（列寧：《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7—528頁）

……一般說来，我們看到各个資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中V（可变資本——編者）在减少，C（不变資本——編者）在增加。农村人口和农村工人無論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日漸减少，可是农业中所使用的机器却增加了。……

（列寧：《农业中的資本主义》第一篇論文，1899年，《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頁）

……資本主义使农村日益荒凉，使人口集中于城市，絕大多数农业人口丧失了大量的自然肥料，但是与此同时，微不足道的市郊农民却依靠他們位置的优越而获得特殊的利益，依靠多数人的貧困而发财致富。……

（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1901年，《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9—140頁）

工业发展的前两阶段的特征是人口的定居。小工业者仍是农民，被土地經營束縛在自己的乡村。手工工場中的工匠，通常仍是束縛在工場手工业所造成的不大的閉塞的工业区域。在工业发展第一和第二阶段上，工业制度本身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破坏生产者的这种定居生活与閉塞性。各个工业区域間的交往是极其稀少

的。工业向其他区域的迁移，只是以个别小生产者的迁移（在国内各边区建立新的小手工业）来进行的。相反地，大机器工业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性；各个区域间的商业交往大大地扩展了；铁路使人们的往来更方便了。对工人的需要总的说来是增加的，在兴旺时期增高，在危机时期下降，于是工人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从国家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就成为必然的了。大机器工业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有时候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产生的，如果没有工人的大批迁徙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501页）

……工业工人的迁徙与我们在上面所讲的农业工人的迁徙，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就是说，工业工人不仅从工人过剩的地区迁出，而且还从工人不足的地区迁出。例如：勃朗尼采县从莫斯科省其他各县及其他各省招来了一千一百二十五名工人，同时却有一千二百四十六名工人去到工业比较发达的莫斯科县与波果罗茨克县。因此，工人的所以外移，不仅是因为“本地找不到职业”，而且是因为他们想去更好的地方。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浅近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妨再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提醒一下，因为他们把本地职业理想化并责难人们外出做零工，抹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性的进步意义。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页）

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的人口問題

1. 徹底消灭失业現象

上面我講到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講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高涨的情形。从改善工农物質生活状况方面看来，这些成就产生了什么結果呢？从根本改善劳动者物質生活状况方面看来，我們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的主要結果是什么呢？

第一个主要結果是消灭了失业現象，消除了工人中不相信明天的心理。

第二个主要結果是几乎全体貧农都参加了集体农庄建設，在这个基础上打破了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貧农的过程，因而消灭了农村中的貧困現象。

同志們，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績，这种成績是任何一个资产階級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所梦想不到的。

我們苏联的工人早已忘記失业現象了。大約三年前我們还有将近一百五十万失业者。我們消灭失业現象已經有两年了。在这段時間內工人已經忘記了失业現象，忘記了失业的痛苦，忘記了失业的慘状。請看一看資本主义国家由于失业而造成的慘状吧。在这些国家里現在至少有三四千万失业者。这是些什么人呢？通常都說这些是些“走投无路的人”。

他們每天都在設法获得工作，寻找工作，几乎任何工作条件都願意接受，可是誰也不收容他們，因為他們是“多余的”人。与此同

时，却有大批商品和产品被那些命运的寵儿，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弟任意消耗。

不給失业者飯吃，因为他們无飯錢可付；不給他們屋子住，因为他們无房錢可付。他們靠什么生活，在哪里居住呢？他們的生活靠老爷餐桌上抛下来的一点点施舍，靠在垃圾箱里寻找腐烂的残余食品。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而且大多数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树皮匆忙搭成的小屋里。不仅如此，不仅失业者遭受失业的痛苦，而且在业工人也遭受失业的痛苦。他們所以遭受失业的痛苦，是因为大批失业者的存在使他們在生产中的地位不稳固，使他們产生了不相信明天的心理。今天他們还在企业里工作，可是他們不知道明天醒来时是否已被解雇。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主要成績之一，就是我們消灭了失业現象，使苏联工人摆脱了失业的慘状。

关于农民也必须这样說。他們也已經忘記了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貧农的情形，忘記了富农剝削貧农的情形，忘記了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貧农破产而沦为乞丐的情形。三四年前我国貧农至少占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即将近二千万人。而在更早的时候，在十月革命以前，貧农至少占农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什么是貧农呢？这就是通常在經營农业时或者缺乏种子，或者缺乏耕馬，或者缺乏农具，或者缺乏所有这一切东西的人。貧农就是过着半饥半飽的生活，通常受富农盘剝，而在旧俄时代既受富农盘剝又受地主盘剝的人。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二百多万貧农每年跑到南部，跑到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去謀生，受富农雇用，而在更早的时候，受富农和地主雇用。每年跑到工厂門口来补充失业者队伍的貧农更多。当时不仅貧农处于这种恶劣的境况，而且中农也大半和貧农一样遭受貧穷和困苦。所有这一切情况农民已經忘記了。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結果，給了貧农和下中农什么呢？它打

敗和击潰了富农階級，使貧农和一大半中农擺脫了富农的盘剝。它把貧农和一大半中农吸引到集体农庄里来，并為他們造成了穩固的地位，从而消灭了农民分化为剝削者（富农）和被剝削者（貧农）的可能，消灭了农村中的貧困。它把加入集体农庄的貧农和下中农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从而消灭了农民破产和貧困的过程。現在我国已經沒有几百万农民每年离乡背井跑到远方去謀生的現象了。現在要吸引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庄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必須和集体农庄訂立合同，而且还要送給庄員免費的火車票。現在我国已經沒有几十万几百万农民陷于破产，站在工厂門口哀求工作的現象了。这种事情过去是有的，但它早已成为过去了。現在农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是拥有拖拉机、农业机器、种子儲备和存粮等等的集体农庄的庄員。

这就是五年計劃給予貧农和下中农的东西。

这就是五年計劃在改善工农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的主要成績的实質。

由于在改善工农物質生活狀況方面获得了这些主要成績，我們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就有了如下的事实：

（甲）大工业的工人和職員人数比 1928 年增加一倍，即超额完成五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七；

（乙）国民收入，也就是說工农收入，在 1932 年增加到四百五十一亿卢布，即比 1928 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

（丙）大工业的工人和職員每年的平均工資比 1928 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即超额完成五年計劃百分之十八；

（丁）社会保險基金比 1928 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二（1932 年为四十一亿二千万卢布，而 1928 年为十亿五千万卢布），即超额完成五年計劃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戊）公共飲食业迅速发展，它供应各个最主要的工业部門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五倍。

当然，我們还没有做到完全满足工农的物质需要。我們在最近几年内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們毫无疑问已经做到使我国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逐年改善。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也許还有资产阶级报刊的某些代表，包括资产阶级报刊驻莫斯科的一部分通訊員，才会怀疑这一点，而他們对于国民經济和劳动者状况的了解未必胜过阿比西尼亚国王对于高等数学的了解。

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請看官方統計吧。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了。在美国，据官方統計，单是加工工业中的在业工人人数就由 1928 年的八百五十万人减少到 1932 年的五百五十万人；而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統計，美国全部工业中的失业人数在 1932 年末已经达到一千一百万人。在英国，据官方統計，失业人数由 1928 年的一百二十九万人增加到 1932 年的二百八十万人。在德国，据官方統計，失业人数由 1928 年的一百三十七万六千人增加到 1932 年的五百五十万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而且官方統計照例都要縮小失业工人的数字，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是在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之間。

工人的工資不断下降。据官方統計，美国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比 1928 年水平降低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在同一时期內降低百分之十五，德国甚至降低百分之五十。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統計，美国工人由于 1930—1931 年度工資降低而受到的損失在三百五十亿美元以上。

英国和德国本来就很少的工人保險基金大大縮减了。美国 and 法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失业保險形式，因此，无家可归的工人和无人照料的儿童人数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美国。

資本主義各國農民群眾的狀況也不見得好些，那里的农业危机根本破坏了农民經濟，使数千百万破产的农民淪为乞丐。

五年計劃在改善苏联劳动者物質生活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總結》，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182頁）

2. 充分發揮人的革命主觀能动性

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馬克思这样說過。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創造者的身分出現。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儈的漸進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須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們的口号始終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們的灯塔，向他們表明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全部宏偉的内容和灿烂的光輝，向他們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頁）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規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們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領，發揮自

己的天才。天才在人民中間是取之不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种天才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殘、压制和窒息了

現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組織竞赛。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8年，《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8頁)

只有現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現进取心，进行竞赛和發揮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剝削者并且剝夺了他們土地的农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場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現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揚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們千百年来都是为別人劳动，为剝削者做苦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8年，《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1頁)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滿腔的革命热情自觉自願和誠誠懇懇地实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駝子、懶汉和流氓实行统计和监督，才能清除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万惡的殘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藥的、腐爛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遺留給社会主义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8年，《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4頁)

……天才的組織家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間是很多的，他們現在才剛剛開始認識自己，覺醒過來，投入生動的、創造性的、偉大的工作，獨立地從事着社會主義社會建設。

現在最主要的任務之一，也許是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盡量廣泛地發揚工人以及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現的這種獨創精神。無論如何要打破這樣一種荒謬的、怪誕的、卑鄙的、醜陋的陳腐偏見，似乎只有所謂“上層階級”，只有富人或者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國家，才能管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有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受到了陳腐慣例、守舊心理、奴才習氣，尤其是資本家卑鄙的自私自利觀點的支持。資本家所關心的是怎樣為掠奪而管理，怎樣借管理來掠奪。不，工人們一分鐘也不會忘記自己需要知識的力量。工人們在追求知識方面表現出非常大的熱情，而且正是在現在表現出來，這證明無產階級在這方面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誤。凡是識字和有識別人的本領、有實際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夠勝任組織家的工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傲慢蔑視態度談論的“老百姓”中，有很多這樣的人。這樣的天才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間是無窮無盡的。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對於自己現在是統治階級這一點還不習慣，他們還不夠堅決。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迫於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萬人中間培養出這些品質。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戰勝性，正是在於它激發這些品質，打破一切舊的障礙，摧毀腐朽的桎梏，把勞動者引上獨立創造新生活的道路。

（列寧：《怎樣組織競賽》，1918年，《列寧文選》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2—383頁）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們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們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缺少有学識的人、知識分子、专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个头脑多少清醒一点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們的知識分子决不能抱怨工农對他們不够重視，對他們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实际的統計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識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实行这些意見和指示，要实际地监督怎样把言論变成行动时，他們就显得“笨手笨脚”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簡直达到了可笑、荒謬和可耻的地步。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組織工作者的帮助，沒有这些人的領導作用，那是絕對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記住。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8年，《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6頁）

当然，劳动人民沒有管理的經驗，但是这个用不着害怕。現在展现在胜利了的无产階級面前的，是已經变成全民财产的国土，无产階級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則組織新的生产和消費。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創造，只是讓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迫切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剝夺了。然而現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剝削手段。这些我們都知道，为了实现这一最偉大的历史任务难道还不值得努力工作，还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嗎？劳动人民一定能完成这一宏偉的历史任务，因为在他們身上蘊藏着尚未苏醒的偉大的革命、复兴和革新的力量。

(列寧:《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閉幕詞》, 1918年1月,《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1—452頁)

在每個公社內,勞動者的自我紀律的加強,他們同做領導工作的專家們(雖然他們出身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合作的本領,以及他們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節省人力方面、在防止產品被盜竊(現在我們正遭受駭人聽聞的盜竊)方面所取得的實際成績,——所有這些都應當成為我們蘇維埃報刊的主要內容。採取這個辦法,我們就能够做到而且應當做到,使模範首先成為道義上的榜樣,然後成為在新的蘇維埃俄國強制推行的勞動組織的榜樣。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初稿》, 1918年,《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頁)

當然,新的社會階級,以前一直受壓迫、被貧困和懸昧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階級,要能够掌握新的形勢,認清環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鍛煉出自己的組織者,這不是幾個星期的事情,而是長年累月的事情。當然,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過去要造成一套從事大規模的、預計要包括千百萬公民的組織事業的經驗和技能是不可能的;而要把舊的、差不多完全是鼓動家的技能改造過來,這是一件很長期的事情。可是這並不是什麼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們明白知道必須轉變,並且有實現這種轉變的堅定的決心,有達到這個偉大而困難的目的的毅力,——那我們就一定能够實現這個轉變。“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剝削別人勞動的農民群眾中,有極多的天才組織家;資本家把這樣的天才組織家成千地摧殘、毀滅和拋棄,而我們呢,也還不善于去發現他們,鼓舞他們,扶持他們,提

拔他們。可是，如果我們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沒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学习这种工作，那我們就一定能够学会这种工作。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9—240頁）

紅軍已經建立了空前巩固的紀律，它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觉悟、忠誠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来的。

所以，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要使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永远不能复辟，就必须建立一支偉大的劳动紅軍。这支劳动紅軍只要有了劳动紀律，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工人和农民应当証明，而且他們一定会証明：他們在不要地主并反对地主、不要资本家并反对资本家的情况下，自己会正确分配劳动，树立起为共同利益而劳动的严密的紀律和忠誠老实的态度。

劳动紀律，高漲的劳动热情，自我牺牲的决心，紧密的工农联盟，这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

（列宁：《留声机片录音演說》，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0頁）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創造出来的較資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們現時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如我們党綱中完全正确地所說的那样）。

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設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鉄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

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千百萬人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開始。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389頁）

“工作的用勁和齊心是空前未有的。當工人、事務員、管理局人員毫不吵鬧地把着四十普特重的客運機車輪箍，象酷愛勞動的螞蟻似的，把它滾往目的地的時候，心中油然而產生了一種出自集體勞動的強烈的愉快感覺，並堅定了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扼殺不了勝利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一種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個身子疲乏但眼睛里放射出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事業的成功，仿佛勝利的歌聲的浪潮越過船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仿佛石頭激起的水波蕩向工人的俄羅斯，搖晃着疲乏無力的人們。”^①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6頁）

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也值得同樣注意。在這方面，工人自己發起和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只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這是戰勝萬惡的資本

① 列寧轉引1919年5月17日《真理報》發載的阿·日·同志《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文章。——編者

主义遺留給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紀律、社会主义紀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資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偉大的創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8頁）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組織靠棍棒紀律来維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資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組織靠飢餓紀律来維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內，尽管资产階級文化和资产階級民主有很大的进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雇佣奴隶或貧苦农民，备遭一小撮資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組織則靠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来維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紀律来維持。

（列宁：《偉大的創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1頁）

資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躪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天才。这些天才在穷困和屈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現在我們的職責就是要善于找出这些天才，讓他們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間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沒有經驗，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們是被資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沒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誠、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比別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單純，更堅強，更真誠。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總結和我們

的任务》，1919年，《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頁）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則，在整整两年的过程中（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給劳动群众树立了榜样：他們对劳动者的利益这样忠誠，他們同劳动者的敌人（剝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作斗争时这样坚决，他們在艰苦的时刻这样坚定，他們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的时候这样奋不顧身，单是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鋒队的同情的力量就能够創造奇迹了。

这是奇迹，因为被飢餓、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維埃政权的无限忠誠、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怕沒有素养和沒有經驗，承担了国家舵手的重担；并且这是在暴風雨最猛烈的时刻……

（列寧：《莫斯科征收党員周的总结和我們的任务》，1919年，《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頁）

同志們：我們力量的主要泉源，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終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我們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們党和苏維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公开告訴劳动群众，善于向群众說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住苏維埃工作的某一方面，善于發揮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非凡的革命精力集中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上面。

（列寧：《与燃料恐慌作斗争》，1919年，《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頁）

……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列宁：《在农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175页）

……我們說：觉悟的人们决不能用资本主义旧方法来解决燃料問題，讓投机者得到奖金，靠某些訂貨发财。不，不能这样。我們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用自我牺牲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問題，要用我們拯救紅色彼得格勒、解放西伯利亚的方法，要用过去在一切困难关头解决一切艰巨的革命任务时使我們取得胜利、并将使我們永远取得胜利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問題。在10月份最后一个星期，装运量已由一万二千車皮增加到二万車皮。我們正在摆脱这次灾难，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必須讓全体工人都了解、都記住，人沒有粮食，工业沒有粮食——燃料，国家就要遭难。不仅我国如此。今天报上說，法国这个战胜国的鉄路交通停頓了。何况是俄国呢？法国将依靠资本主义方式，即资本家发财而群众繼續受苦的方法来摆脱危机。而苏維埃俄国则是依靠工人的紀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依靠坚决向农民求援的方法（农民最后总会理解这一点）摆脱危机。农民会体验到，过渡时期多么困难，工人政权的手多么坚强，但这究竟是劳动者的手，劳动者正为了劳动群众的联盟，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剝削进行斗争。

（列宁：《全俄苏維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197页）

在我們經濟制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只是現在在星期六義務勞動出現的時候才開始產生的，在這種時候，沒有任何政權、任何國家來規定定額，而每個人都來為社會進行規模巨大的無報酬的勞動。這不是農村中常見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

（列寧：《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1919年，
《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版，第254頁）

……我們所謂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制機關，不拿報酬地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的現象。

（列寧：《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1919年，
《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版，第252—253頁）

我們所以戰勝了地主資本家，是因為紅軍戰士和工農都知道，他們是為自己的切身事業奮鬥。

我們所以勝利了，是因為整個工人階級中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在這次反剝削者的戰爭中表現了空前的英勇精神，創立了奮勇殺敵的奇蹟，忍受了空前的困苦，作了自我犧牲，無情地驅逐了一切自私自利和貪生怕死的分子。

現在，我們所以相信我們一定能戰勝經濟破壞，是因為整個工人階級中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本着同樣的自覺，都用同樣堅定的意志，同樣英勇的精神，起來奮鬥。

只要千百萬勞動者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跟隨本階級的優秀人物前進，勝利也就有了保證。

在軍隊里面，自私自利之輩已經被驅逐了。我們大家現在都要高呼：

“打倒自私自利分子，打倒那些光想占便宜、光想投机、光想逃避工作的分子，打倒那些怕为胜利忍受必要牺牲的分子！”

（列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音演说》，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402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較狹窄和比較严格的意义上說，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願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沒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須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页）

我們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試驗、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質是无产階級在十月革命前十年、十五年以至二十年的磨炼中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階級又在两年空前未有的穷困、飢餓、破坏和苦难当中使这些品質受到了磨炼。无产階級的这些品質就是无产階級一定胜利的保証。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必須使覺悟的工人能够进入国家政权的一切部門，善于接近農民，把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為這個擺脫了地主的枷鎖并建設着沒有資本家的國家的階級服務。必須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和铁的紀律。必須使整個無產階級万众一心，在勞動戰綫上，也象在流血戰綫上一樣，創造出空前的奇跡。

（列寧：《在紡織工業工人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20年，《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1頁）

应当使農民看見另外的東西。讓工人階級來組織生產，就象它組織過紅軍那樣。每一個工人都應該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在管理國家。我們的人越少，對我們的要求就越高。应当使俄國變成一支勞動大軍，富有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精神，能够為解放勞動者的共同事業貢獻一切。

（列寧：《在紡織工業工人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20年，《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1—482頁）

我決不認為眼前的工作是容易的，但是一切困難必須克服而且可以克服。應當使每個工人都來幫助組織勞動，使農民認為工人是組織者，使大家都把勞動看成是保持工农政權的唯一手段。

（列寧：《在紡織工業工人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20年，《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2頁）

工人階級面臨着最大的考驗，每一個男工、每一個女工都必須比前綫的紅軍創造出更大的奇跡。在勞動戰綫上取得勝利，在平凡的、骯髒的環境中工作，表現出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一切要

困难得多，但比牺牲生命要可贵十倍百倍。

打倒陈腐的故步自封！工人只有表现出自己是劳动红军的战士，才配做工会会员。即使我们会犯几百次错误，会遭受几千次失败，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应当认识到，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式的百折不挠的冲击，才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捍卫工农政权已经两年了。全世界正酝酿着社会革命。为了证明我们大家能够胜任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我们必须精力充沛，满怀信心，不管情况怎样困难，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热忱，象在流血战线上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的红军一样，也在和平劳动的战线上创造奇迹。

（列宁：《在纺织工业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2—483页）

……伊林同志和我谈到了西伯利亚煤矿上的紧张工作，以及劳动者（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自觉纪律的逐步提高的情况，使我感到极大的快感。

同志们，你们的问候信中特别宝贵的就是对于苏维埃政权必将完全而彻底地战胜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的极深刻的信念，以及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我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正是从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中汲取对于工人和工人事业必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信心。

（列宁：《给切烈姆霍沃煤矿工人》，1920年9月15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4页）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

积极主动的突击队。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 1920年,《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4頁)

我們必須記住,我們要高度緊張地從事每天的勞動,否則我們就必然會滅亡。

(列寧:《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務》, 1921年,《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頁)

4月9日深夜,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好幾處地方放火,企圖燒毀巴庫的蘇拉漢內采油場。采油場的工人和工程師冒着極大的生命危險,阻止了火災的蔓延,表現出罕有的英勇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知道這些事實之後,我認為我應該代表蘇維埃俄國向蘇拉漢內采油場的工人和工程師表示感謝。這些英勇事跡最好不過地證明:儘管有種種困難,儘管工人共和國的敵人社會革命黨人白衛分子不斷地進行陰謀活動,然而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定會勝利地克服一切困難的。

(列寧:《給阿捷爾拜疆石油托拉斯工人和工程師的電報》, 1922年,《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0頁)

……正是現在,農民正以充沛的精力和偉大的忘我精神重整自己的耕地,修復自己的農具、房舍和各種設備等等。另一方面,也正是現在,產業工人正以同樣充沛的精力改進勞動工具,用新的勞動工具來代替破舊的勞動工具,修復破舊不堪的或受到破壞的房屋等等。

(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記者阿·兰索姆提出的問題》, 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7頁)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那末,在俄国居民中占絕大多數的是小农,他們現在已經非常熱心地投身于生产,并且获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帮助),如果注意到他們经历了內战、飢荒等等駭人听闻的破坏,那些成就就特別巨大了。这时小农获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他們能够輕易地、几乎毫不勉强地繳納了为数达几亿普特粮食的國稅。

(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記者阿·兰索姆提出的問題》, 1922年,《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8頁)

但是,如果沒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揮人員的力量是不能建設新社会的。新的指揮人員所具有的知識还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此还必须要有劳动群众对这些指揮人員的信任和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建設的旧的指揮人員的特点,就是他們脫离工人和农民,他們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既不重視劳动群众的信任,也不重視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这种方法对我们国家是完全不合適的。建設新經濟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揮人員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因為他們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絕关系。不脫离群众,而最緊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爭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揮人員管理业务的新方法。不采取这些方法,任何社会主义建設都是不能想象的。

(斯大林:《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

全國代表會議》，1925年，《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2—73頁）。

第六個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發展生產的基本動機是希望取得利潤。當然，相對地說，這種動機在蘇聯是不存在的。什麼東西代替了它呢？照你的意見，這種代替的效果如何，它能不能成為經常的？

答：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推動力是取得利潤，那是對的。說取得利潤既不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目的，也不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推動力，那也是對的。既然如此，究竟什麼是我國工業的推動力呢？

首先是這個情況：我們這裡一切工廠都是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屬於資本家的，管理工廠的不是資本家的僕從而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覺悟到他們現在不是為資本家工作，而是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階級工作。這種覺悟就是發展和改進我國工業的巨大的推動力量。

應當指出，我們這裡絕大多數的廠長是工人，他們是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取得工會的同意而任命的。並且任何一個廠長如果違反工人或有關的工會的意志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其次，應當指出，每一個工廠都有自己的工廠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是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並監督着企業行政方面的活動。

最後，應當指出，每一個工業企業都有本企業全體工人參加的工人生產會議，工人在會議上檢查廠長的全部工作，討論工廠行政的工作計劃，指出錯誤和缺點，並且有可能通過工會、黨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來糾正這些缺點。

不難了解，所有這些情況根本地改變了工人的地位和企業中

的各种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業，他們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

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正是因为这个情况，从工人当中涌现出来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組織者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6—107頁）

不能把社会主义竞赛看做办公室里的事情。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評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評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評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应该作为我們偉大事業的障碍而被丢在道旁。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漲》，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8頁）

……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設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轉国家全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漲》，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8頁）

几乎用不着怀疑，最近一年来我国建設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我們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达到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現于千百万工人階級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設战綫上发挥了創造主动性，掀起了强大的劳动高潮。这是我們过去一年的第一个主要成就。

群众的創造主动性的发挥和劳动高潮的掀起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促成的：

(甲)通过自我批評反对束縛着群众劳动主动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官僚主义；

(乙)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反对旷工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紀律的分子；

(丙)通过实行不断生产制反对生产中的守旧思想和因循习惯。

結果，我們在劳动战綫上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我們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呈现出千百万工人階級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在劳动中的互相呼应。而这个成就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証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页)

保証我們不顧一切地取得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呢？

首先是千百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員的积极性和忘我精神、热情和創造性，他們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来开展

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就不能前进一步。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页）

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科学上和技术上开辟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士，而是在科学界完全不著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际工作者，工作革新者。这里在座的有斯达哈诺夫同志和巴巴宁同志。他们在科学界不是著名的人物，是没有学位的人物，是本行事业的实际工作者。但是谁不知道斯达哈诺夫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在工业部门从事实际工作时，打破了科学界技术界著名人士所规定的已经陈旧了的原有定额，并实行了适应于真正科学和技术要求的新定额呢？谁不知道巴巴宁和巴巴宁探险家在流动冰上从事实际工作时，不费大力就推翻了关于北极地方的已经陈腐了的旧观念，并确立了适应于真正科学要求的新观念呢？谁能否认斯达哈诺夫和巴巴宁是科学的革新者，是我国先进科学的工作者呢？

你们看，在科学中竟还有这样的“奇迹”。

（斯大林：《在克列姆里宫高等学校工作者招待会上的演说》，1938年，《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234—235页）

3. 人得到全面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人不是只有一个专属的活动领域，

而是隨便在哪一行业里都可鍛煉自己，……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
1845—1846年，轉摘自《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論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33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時現在這種分工也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述的那種水平，單靠機械的和化學的輔助工具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運用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當十八世紀的農民和手工工場工人被吸引到大工業中以後，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完全成為另一種人，同樣，用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一種全新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新人來。生產的社會管理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听它剝削，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中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漸漸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動搖了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外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這種分工，將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夠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據社會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就會使他們擺脫現代這種分工為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地發揮他們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時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因

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組織起来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給消灭階級差別提供了条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371頁)

……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将消亡下去。人既已終于成了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154頁)

資本主义必然給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是工人在职业上和手艺上的差异，一方面是各种工会；前者是长期形成、由来已久的，后者只有十分緩慢地、年复一年地才能发展成为比較广泛的、行会气味比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門，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业和同一手艺)，然后經過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間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訓練的人，即胜任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必須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經過許多岁月。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頁)

……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餬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 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117—118頁)

附录

在将来的社会, 这种生活方式一定能够实现, 一切种类的学者和艺术家一定能大量的产生, 他们一定能够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 其余的时间由各人所好去研究艺术, 或者从事社交。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403頁)

当然, 人类在数量上的这种增长的抽象可能性是存在着的, 并且会引起限制这种增长的必要性。但是, 如果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有个时候不得不调节人口的生产, 就象它在这以前调节物质的生产一样, 那么, 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实现这一点。要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这种结果, 就象现在法国和奥地利南部自发地无计划的发展起来的情形一样, 我认为,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不管怎样, 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自己会决定: 为此应该不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什么时候采取, 怎样采取, 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不认为自己负有使命一定要向他们提出什么建议或者在这方面给予他们什么忠告。这些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比您我之辈愚蠢的。

(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载《学习译丛》1957年第3期, 第1—2頁)

附录

在人开始得到真正自由而在其自然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一定能够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发展。从来一切时代的人类，他们关于生产和分配及人口增加，是不知道这些法则的，而是依据无意识地盲目的行动。在新的社会，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发展的法则，而有意识地并且能够有计划的去行动。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三联书店
1955年版，第499页）

五、資產階級反动人口理論批判

1. 馬爾薩斯“人口論”是資產階級反对 无产階級的思想武器

**馬爾薩斯是一个剝窃者，是地主和
資產階級的辯護士**

……但是，偉大变革的征兆也許从來沒有象目前英国所表現的这样明显，这样突出。在德国，运动的发起人不仅是有教养的人，甚至还是有學問的人；在英国，有教养、尤其是有學問的人，近三百年来对时代的旗帜是不聞不問的。全世界都知道，因循守旧的思想統治着英国的大学，和它們比起来，我們德国的高等学校还算是不錯的。但是，大陆上的人们甚至不能想象，英国的优秀神学家，以至一部分优秀的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質量究竟怎么样，很难想象反动的著作（这些書名大量刊登在每周出版的《新書目录》上）有多么拙劣。英国是政治經濟学的故乡，但教授和实践政治家却是怎样对待这门科学的呢？亚当·斯密的“自由貿易”竟蜕变为結論荒謬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自由貿易”只是为旧的壟断制度制造了一个更文明的新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就是現代的托利党；它有成效地同馬爾薩斯的胡說进行了斗争，但最終仍然得出了馬爾薩斯的結論。到处是不彻底和虛伪，而社会主义者和部分宪章派的有說服力的經濟論文，却被輕蔑地扔掉，这些論文只有在下层等級中才能为自己找到政者。施特劳斯的《耶穌傳》譯成了英文，但沒有一個“体面的”出版商願意出版它，最后，这本書分册出版了，每册

三个便士，出版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流的但干劲十足的旧書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及其他等人的著作的英譯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讀拜倫和雪萊的作品几乎全是下层等級的人；沒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萊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不想声誉扫地的話。

（恩格斯：《倫敦來信》，1843年5—6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561—562頁）

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的宣戰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濟貧法。關於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現在我們再來簡略地重述一下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着窮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恒的命運，因此，人們就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過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做出來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並鼓勵他們繁殖，而其餘的人的工資也因他們的競爭而降低了。濟貧所給窮人工作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一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找到銷路，一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換句話說，濟貧所這種事業是在損害私人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問題決不在於去養活“過剩人口”，而在於採用某種辦法尽可能地縮減過剩人口的人數。馬爾薩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個生在世界上的都有權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一個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我找不到空著的餐具，馬爾薩斯自己又添上了一

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沒有事先問一下社会是否願意接受他”。这一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論，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論對他們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現存关系下它在許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問題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簡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餓死，并同时阻止他們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須使“过剩人口”承認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階級已經費尽心机，使工人們相信自己沒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堅決相信，他們有勤勞的双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余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1841—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2—573頁）

“一个人的商品沒有人需要时，馬尔薩斯先生会劝他先付錢給別人，叫別人用这个錢，来买他的商品么？”这是一位憤怒的李嘉图学徒，向馬尔薩斯提出的質問。馬尔薩斯和他的学徒查尔麦斯牧师，在經濟学上，是贊美那些只購買或只消費的階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0頁，注29）

……馬尔薩斯的贊美者，一直不知道，馬尔薩斯《人口論》的第一版，除了純粹修辭的部分，除抄襲沃拉斯、湯生德这两位牧师以外，几乎純然是抄写斯壯亚的見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4頁，注51）

如果讀者記起1798年刊行《人口論》的馬爾薩斯，我就要以下面的事實，提醒讀者。就那部書最初的形式來說，它不過是對於德福、斯杜亞、湯生德、富蘭克林、瓦拉斯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學生樣淺薄的，牧師樣改頭換面的剽竊。里面沒有包含一個創造性的命題。那部小書會名噪一時，全是由於黨派利害的關係。法蘭西的革命，已經在不列顛王國找到了熱心的擁護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紀慢慢演成的；嗣後便在一個大社會危機中，大搖大鼓地，當作是康多塞等人的學說的萬應消毒劑；英國的寡頭政治，以為它可以徹底鏟除掉一切求人類進步的熱望，而報之以歡呼。馬爾薩斯對於他的成功，也大為驚愕，於是着手把各種皮毛地編制的材料，塞進舊的構造中去，並加進一些非由他發現，不過由他拼湊在一起的新材料。……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4—775頁，注75）

人類幸福的一個希望者（牧師約瑟夫·湯生德）著：《論救貧法》，1796年倫敦。……湯生德這部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旅行記》屢屢被馬爾薩斯一連幾頁地抄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5頁，注90）

……譬如拿馬爾薩斯所著《人口論》一書來作例子。在初版

时，这不过是“聳人听聞的諷刺文章”，并且彻头彻尾都是剽窃。虽然如此，这篇詆毀人类的文章終究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

（馬克思：《論蒲魯東（給施維澤尔的信）》，
1835年1月24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
368頁）

馬尔薩斯决无意要暴露^①资产階級生产的矛盾：反之，他要特別強調它們；不过一方面为要証明劳动階級的贫困是必要的，（对于这个生产方法是必要的），一方面为要向资本家証明，如要有充分的需要，一定額的牧师和官吏是不可少的。他又指示了，为要使“財富不断进步”，人口的增加，资本的蓄积（《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319、320頁），土地的丰度（前書第399頁），“节省劳动的发明”，“外国市場”的推广，（前書第352、359頁），都是不够的。

（馬克思：《剩餘价值学說史》第3卷，
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57頁）

再者，馬尔薩斯为要使他的人口法則初次有一个经济学基础和現实的自然史基础，才利用安特生的地租学說。他由前人著作〔借用的〕几何級数和算术級数等等妄言，只是一個純粹空虛的假設而已。馬尔薩斯先生是善利用机会的。李嘉图却如他自己在序言里面說的，是把这个地租学說，当作全经济学体系最重要的环节，并給予它一个全新的理論上的重要性。且不說它的精密了。

李嘉图分明不知道安特生，因为他在他的经济学序言中，把卫斯特和馬尔薩斯当作发现者。卫斯特，从他叙述这个法則的特別方法看也作兴是同样不知道安特生，好象杜克(Tooke)不知道斯杜

① 此处“暴露”一词应譯为“掩飾”。——編者

亞(Steuart)一樣。馬爾薩斯君却不是這樣。試精密地比較他的著作一下，我們就知道，他知道安特生，並會利用安特生。他是一個剝奪專家。我們只要拿他的《人口論》的第一版，和湯生德(Rev. Townsend)的著作比較一下，我們就相信，他並不是以自由撰作者的資格，來把它加工，却是以奴隸剝奪者的資格，來抄襲。他沒有在任何處舉出他的名字。他把他的存在隱秘了。馬爾薩斯利用安特生的方法，是特征的。安特生辯護谷物輸出的出口獎勵金，和谷物輸入的谷物稅，決不是為地主的利益的，却是因為他相信，這種立法會減低谷物的生產價格，確保農業生產力的均衡發展。馬爾薩斯採納安特生的這種應用，因為他——英格蘭國教會的會員——是地主貴族的職業的阿諛者：他所要辯護的，正是地主貴族的地租，月薪，浪費，殘忍心等等。馬爾薩斯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土地所有權貴族階級的利益相同時，那就是，與民眾即無產階級的利益相反時，才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在這兩種利益分裂而互相敵對時，他總是站在貴族方面，與資產階級相對立。就是這樣，所以他會辯護“不生產勞動者”，過度的消費等等。

反之，安特生對於支付地租的土地和不支付地租的土地的差異，或支付不等量地租的土地的差異，是由這樣去說明：不支付地租或只支付少額地租的土地和那種支付地租或支付更多地租的土地比較，是比較更不肥沃的。但他曾明白的說，不同諸種土地的相對丰度，從而，與較優土地比較顯示出來的較劣土地的相對不丰饒性，是絕對和農業的絕對丰度沒有關係的。反之，他曾特別強調，不僅各種土地的絕對丰度能夠不斷增加，並在人口的增進中一同增大。他還曾進一步主張，不同諸種土地丰度上的不均等，會累進地歸於平均。他說，英國農業現在的發展程度，不能預示英國農業可能有怎樣的發展。他〔又〕曾說過，在一國谷物價格高而地租低，在別一國，可以是谷物價格低而地租高。這是由他的原理出發的，因

为决定地租的高度和存在的，在二国，都是丰地和不丰地间的差异。在任何一国，都不是绝对丰度。在每一国，都只是现有各种土地的丰度上的差别。在任一国，都不是这諸种土地的平均丰度。由此，他結論說，农业的绝对丰度，和地租绝对没有关系。象我們以后会看到的，他后来曾宣告他是馬尔薩斯人口理論的断然的反对者，沒有想到他自己的地租理論，会成为这只怪物的基础。在英格兰，自 1750 年至 1810 年，比較自 1700 年至 1750 年，谷物价格是上漲了。依据安特生的說明，这不是因为耕作益益进向更不丰沃的土地，却是因为在这两个期間，立法曾經在农业上面发生影响。

馬尔薩斯做了什么呢？

他是用安特生的学說，代替几何級数算术級数等等妄言（那也是抄襲的，他是把这种妄言，当作辞章来保持）当作他的人口理論的証明。在安特生的学說合于地主利益的限度內，他是保持安特生的学說的——这一个事实，表示他和安特生一样不了解这个学說和經济学体系的关联：他不曾听一听这个理論的发现者的反証，就用这个理論来反对无产階級。他讓李嘉图由这个理論去引伸理論的实际的进步：那就是，在理論方面，考察商品价值等等的决定，并洞察土地所有权的性質；在实际方面，是在資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反对土地私有权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反对扩大这种土地所有权的一切国家統制，如保护关税等等。馬尔薩斯所引出的唯一的应用，是辯护地主們在 1815 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这是阿諛的侍奉貴族，而对于财富生产者的穷困，提供一种新的辯解，并为劳动的榨取者，提供一种新的辯护。〔从这方面看，他的应用，也是一种〕对于产业資本家的阿諛的奉承。

意見的彻头彻尾的庸俗性，标示了馬尔薩斯的为人。这种庸俗，只有一个俗侶能够忍耐的。他在人类的贫穷中，看見了人类墮落所受的刑罰，并承認“一个世間的泪谷”是必要的，但同时想到他

所得的僧俸，借助于恩寵的選擇的教義，又發覺在支配階級之前，以滯留涸谷為快樂，也全然是有利的。

這種意見的庸俗，還在科學方面指示了。第一，是表示在他的無恥的職業的剽竊手腕上面。第二，是表示在他由科學前提引伸出來的有所顧慮但不是無所顧慮的結論上面。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293—296頁）

但馬爾薩斯這個可憐漢，由那由科學給與但不斷由他剽竊的前提，只推出了那種結論，那不過對於與資產階級相對的貴族，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貴族與資產階級二者，是快適的，有用的。他不欲有為生產的生產，除非這種生產可以保持或完成即適於支配階級的利益。他的第一部著作，已經是文獻上一個值得注意的例，說明它是一個犧牲原著，剽竊成功的一種東西，其实际目的，是為當時英國統治者和地主貴族的利益，“從經濟方面”，把法國革命和英國附和者的完成人類社會的傾向，斥為空想。那就是，這個本子，根本只是一個歌功頌德的小冊子，它要維持現狀，而反對歷史的發展，其目的，在辯護反法國革命的戰爭。他在1815年關於保護關稅和地租所發表的諸種著作，一部分，要確認他以前為生產者的貧乏提出辯護的見解，尤其是在“啟蒙的”，“自由的”和“進步的”資本之前，為反動的土地所有權辯護，並對於英國立法界為貴族利益而反對工業資產階級所策劃的退步工作，予以辯護。最後，他的《經濟學原理》，反對李嘉圖的，在本質上，就有這種目的：即，為土地貴族，國教會，（馬爾薩斯所屬的教會），政府官吏，和賦稅消費者的利益，而把產業資本的絕對要求，和資本生產力依以發展的法律，壓回到這個限界，使其有利於他們的利益，並且“適合”於他們的利益。一個人，如果他不要使科學適合於一個由它自身引出的立場，

(虽然这个立場也常常可以是錯誤的)，却要使它适合于一个由外部的与它无关的外在的利益引出的立場，我就把他称做庸俗的。李嘉图把无产者和机械或代劳家畜或商品并列时，他决不是庸俗的，因为从他的立場來說，“生产”是只把他們当作机械或代劳家畜，或者說，因为在資本主义生产內，他們实际只是商品。这是斯多亚式的，客觀的，科学的。只要不对科学犯罪，李嘉图常常是博爱家，在实际上，他也是博爱家。反之，馬尔薩斯牧师，〔当然也〕为生产的原故，使劳动者成为代劳家畜，要他們陷在餓死和独身的生活中。〔但〕在生产的要求，要求把地主的“地租”减低，或危及国家教会的“什一稅”或賦稅消費者的利益，或为那一部分代表生产进步的资产階級，而牺牲这一部分以阻碍进步为利益的产业资产階級时，从而在土地貴族与资产階級对立保守的停滞的资产階級与进步的资产階級对立时，馬尔薩斯“牧师”总不会为生产而牺牲特殊的利益，总是想尽可能牺牲生产的要求，来为那当时支配的階級或党派謀利益。为这个目的，他把他的科学結論弄入邪路上了。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庸俗性，他对科学所犯的罪过，且不說他的无耻的职业的剝窃手腕了。馬尔薩斯在科学上的結論，对于支配階級一般，特別对于支配階級中那些反动的份子是不姑息的；那就是，他为他們的利益而把科学歪曲了。但反过来，对于服从的階級，他的結論却是不姑息的。还不但是不姑息的。他張大了这种不姑息性，昔尼克式的，恣縱于其中。他的結論，在針对着那些在貧乏中生活的人們說話时，无疑是过分夸大了，就從他自己的立場說，也已經逾越科学上正当的程度。

英国劳动階級对于馬尔薩斯——歌伯特 (Cobbet) 曾粗魯的，罵他是“卖假膏藥的牧师”——会如此憎惡，是全然正当的；在这場合，民众是凭正确的本能，覺得他并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被人收买的辯護士，是他們的敌人的辯護者，是支配階級一个无耻的阿

諛者。

一个思想的发现者，会诚恳的把这个思想夸大，把这种思想夸大的剽窃者，却常常以这种夸大当作职业。

馬尔薩斯的《人口論》第一版，因其中沒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用語，所以要当作一个特出的甲布金派僧徒的說教，当作是湯生德，斯杜亚，沃拉斯，赫尔伯特諸人学說的阿布拉汉式的抄录来看，因为这个著作实际只有它的通俗的形式令人叹服，它会遭一般人厌恶，乃是当然的。

（馬克思：《剩价值学說史》第2卷，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298—301頁）

附录

在題名《人工的产儿限制》的書中，法台(Hans Ferdy)說：“社会主义者激烈地反对馬尔薩斯主义，这是玩弄奸策。人口的急速增加是助长大众的无产化，促进不滿。假使制止人口过剩能够成功，社会主义的传播便会告終，社会主义国家和它的一切光彩将会永远的湮沒。”在此，我們知道了馬尔薩斯主义是对抗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武器。^①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三联書店1955年版，第498頁）

① 社会主义討伐者法台关于社会主义的无知，看他所著书中40頁上所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者提出比新馬尔薩斯主义者更进一步的要求。他們要求一切劳动者象能够适应社会供給食物的能力而产生多少小孩那样来决定最低工資。……社会主义实行最后的結論的时候，私有财产废止了，最愚鈍的人忽然发問道：‘我的邻人任意給社会生了一打的新成员，我为什么独要做更长更苦的工呢？’”在写出这种講社会主义的愚話之前，該学一点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識才好。

絕對人口過剩是毫無根據的捏造

資本同資本、勞動同勞動、土地同土地之間的鬥爭，使生產陷於熱病狀態，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顛倒過來。要是資本不拚命展開自己的活動，它就抵擋不住其他資本的競爭。要是土地的生產率不經常提高，耕種土地就會無利可獲。要是工人不竭力工作，他就對付不了自己的競爭者。總之，卷入競爭鬥爭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棄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經不住這種鬥爭。一方面這樣過度緊張，結果他方面必然會削弱。在競爭的波動不大，需求和供給、消費和生產幾乎彼此相等的時候，在生產發展過程中就必然會出現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生產力大大過剩，結果，廣大人民群眾反而無以為生，人們恰恰因過剩而餓死。長時期來英國就處於這種瘋狂的狀態中，處於這種荒謬絕倫的情況下。如果生產搖擺得更加厲害（這是上述情況的必然結果），那末就會出現繁榮和危機、生產過剩和停滯的反复交替。經濟學家從來就不能夠理解這種怪誕現象；他為了解釋這種現象，就編造了一套人口論，這種理論和貧富並存的矛盾同樣荒謬，甚至比它更荒謬。經濟學家不敢正視真理，不敢承認這種矛盾是競爭的自然結果，因為不這樣他的學說就會全部垮台。

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很容易闡明。人類所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穫量無限地提高。按照最穩健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計算（參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1卷，第1、2章），“人口過剩”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就能夠使糧食生產達到足以供應六倍於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資本在日益增加，勞動力在隨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服從於人類。這種無窮無盡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

地用來為大眾造福，人類所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讓競爭自由發展下去，生產能力雖然也會起同樣的作用，然而是在對立的情況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實行精耕細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三千萬英畝好地——却荒蕪着。一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而另一部分卻無事可干，無工可做，活活餓死。這種對立情況也可能不同時出現：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處是一片忙碌景象，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着，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干得筋疲力盡；而明天停滯到來了，農業得不償失，大片土地荒蕪了，資本在運動得最緊張的時候突然停頓下來，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都因財富過多、人口過剩而各嘗痛苦。

經濟學家不能承認情況這樣發展是合理的，否則他就得象上面所說的那樣放棄自己的全部競爭學說，就得承認自己把生產和消費對立起來、把人口過剩和財富過剩對立起來是完全荒謬的。但是事實本身是无法否認的，所以為了使這種事實符合理論起見，就發明了人口論。

這種學說的創始人馬爾薩斯斷言，人口總是威脅着生活資料，隨着生產的增加，人口也同樣地增加，人口生來就有一種超過它所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傾向，這種傾向就是一切貧窮和罪惡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應當用某種方法把他們消滅掉：或者用暴力將他們殺死，或者讓他們餓死。這樣做了以後，就會出現一個空隙，這個空隙等余下的人口一增長馬上又會被填滿，於是以前的貧窮狀況又重新到來。據說在任何條件下——不僅在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状态下——都是如此；新荷蘭^①平均每平方英里

① 澳大利亞的旧称。——原編者

只有一个野蛮人，但是那里也和英国一样，深感人口过剩的痛苦。簡言之，要是我們願意徹底一些，那我們就得承認：当地球上还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經人口过剩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正因为穷人过多，所以，除了尽量減輕他們在餓死过程中的痛苦并使他們相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他們整个階級的唯一出路就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應該為他們做任何事情；要是这样做没有什么結果，那末至少应当象“馬尔薩斯”所建議的那样（按照他的建議，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这个限額的孩子就应当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以使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賑济穷人被認為是罪过，因为这样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长；但是，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惩治所（如英国“自由派的”新济贫法所做的那样）却算是极其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論很不符合聖經上关于上帝及其創造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把聖經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駁，那才是最拙劣的反駁！”

我是否还需要更詳尽的闡述这种卑鄙下流的学說，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誣蔑，并追究其进一步的結論呢？在这里我們終于看到了，經濟學家的不道德已經登峰造极。一切战争和壟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同这种理論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論构成了自由派的貿易自由学說的柱石，这个柱石一倒，整个大厦就会垮台，因为竞争在这里既然已經証明是贫困、穷苦、罪恶的原因，那末誰还胆敢为竞争辯护呢？

艾利生在上述著作中动摇了馬尔薩斯的理論，因为他訴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馬尔薩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比他本人消費所需的更多的产品。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殖，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則成长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因而他最后也

得出了同馬爾薩斯一樣的結論。固然他證明了馬爾薩斯的原理是不正確的，但是他未能駁倒馬爾薩斯據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實。

要是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他就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着的。只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開始寫《人口論》時起，一切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証實了這一點。事實就是如此，馬爾薩斯正應當把這些事實，全部加以研究，而研究這些事實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只抓住了一個事實，而不理睬其他事實，因而他得出了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个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業手段混為一談。人口總是威脅着就業手段，有多少人能夠就業，就有多少人生出來，簡言之，勞動力的產生迄今仍然由競爭的規律來調節，因而也同樣要受周期性的危機和波動的影響，這是事實，確定這一事實是馬爾薩斯的功績。然而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的擴大僅僅是機器力量增加和資本擴大的最終結果；而生活資料却只要生產力稍許提高，就會立刻增加。這裡又暴露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矛盾。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他所理解的消費只是人為的消費。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有能夠為自己取得的東西提供等價物的人，才是真正的需求者，真正的消費者。但是，如果事實是每一個成年人生產出來的東西比他自己所能消費的要多，事實是小孩象樹木一樣能夠綽綽有餘地償還花在他身上的費用（難道這不是事實？），那就應該承認，每一個工人必然能夠生產出遠比他自己的需要還要多的東西，因此，社會一定會樂意供給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時也應該承認，大家庭應當是極受社會歡迎的禮物。但是由於經濟學家粗魯地看問題，所以除了用可以捉摸的現金來支付的東西以外，他就不知道還有任何別的等價物。他已深深地陷入對立之中，連最觸目的事實也象最科學的原

理一样不能使他有所感触。

我們只是在用取消矛盾的方法来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状态的各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的对立就会消失，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饿死的这种不可思議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議的事实就不会存在，那种認為土地不能养活人們的荒謬見解也就会不攻自破。这种見解是基督教政治經濟学的英明卓絕的表现，而我們的政治經濟学本質上是基督教政治經濟学这一看法，我可以在每一个原理和每一个范畴中加以証明，这个工作到时候我会做的；馬尔薩斯的理論只不过是認為精神和自然之間存在着矛盾并因此使二者墮落的宗教教条在經濟学上的表现而已。我想，这个早在宗教領域內同宗教一起被揭露了的矛盾之空无根据，我也在經濟領域中指出了；同时，除非馬尔薩斯理論的辯護士用这种理論的原则向我闡明，人民怎么能够恰恰因过剩而餓死，除非經濟学家使这种解釋符合理性与事实，那我就不会認為这种辯護士是够格的。

可是，馬尔薩斯的理論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們前进的、絕對必要的轉折点。由于他的理論，总的說来是由于政治經濟学，我們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們战胜了这种絕望的經濟制度，我們就能保證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們从馬尔薩斯的理論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經濟論据，因为即使馬尔薩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馬尔薩斯本人也認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由于这个理論，我們才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墮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墮落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論向我們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終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

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現象。

为了証明对人口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讓我們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問題上来。马尔薩斯的整个論說是建筑在下面这种計算上的：人口是按几何級数 $1+2+4+8+\dots+16+32\dots$ 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則是按算术級数 $1+2+3+\dots+4+5+6$ 增加。差額是触目惊心的，但是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証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級数增加的呢？我們可以假定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费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們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來說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門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維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紀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則同前一代人遺留下的知識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級数发展的。而对科学來說，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士尖必河流域向有足够的荒地可供欧洲的全部人口移居”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現在已經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談論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5—622頁）

……馬爾薩斯的全部榮譽所在，就是當李嘉圖等人在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以勞動日的大小不變作為他們的研究的基礎時，馬爾薩斯卻極看重勞動日的延長。這個事實，他在他著作中別的地方，也曾經直接說到。不過，他所侍奉的保守的利害關係，卻使他看不出，勞動日的無限制的延長，及機器的可驚的發展，⁴與妇女儿童勞動的剝削，必致使工人階級一大部分成為過剩的。而在戰爭需要和英國的世界市場獨占權已經消滅時，特別是如此。這種“過剩人口”，由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性的自然法則去說明，自不如由自然的永久法則去說明，遠較為便利，並與各個統治階級——馬爾薩斯是以牧師的熱忱，把他們當作偶像來崇拜——的利害關係相一致。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49頁，注15）

橫在所謂“自然人口法則”下面並且當作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簡單地說，就是：資本積累與工資率的关系，不外就是轉化為資本的無給勞動，與推動追加資本所必要的追加勞動的关系。所以，這並非兩種相互獨立的量（一方為資本的量，他方為勞動者人口（的數）的关系；在結局上，那不外是同一勞動人口的無給勞動與有給勞動的关系。如果由勞動者階級供給，由資本家階級積累的無給勞動的量增加得充分迅速，以致要轉化為資本只有由於有給勞動的異常大的增加，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形不變的限度內，無給勞動也會依比例減少。但這種減少只要觸到這一點，以致滋養資本的剩餘勞動的常量不能被供給出來，反動馬上就會發生。資本化的所得部分將會減少，積累將會弛緩下來，工資騰貴的運動將會受到阻止。所以，勞動價格的提高，將被限制在這個限度內，在這個限度內，它不單不會觸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並且會保障資本主義的規模擴大着的再生產。神秘化為一種自然法則的資本

主義積累法則，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性質，会把勞動剝削程度的那樣的減低，或勞動價格的那樣的提高排除出去，只要資本關係的不絕的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着的再生產，會因此嚴重感到威脅。在對象的富不是為勞動者的發展要需而存在，反而是勞動者為既存價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內，也不能再是別樣。象人在宗教上是受他自己的頭的產物支配一樣，在資本主義生產內，他是受他自己的手的產物支配。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1863—1867 年，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80—781 頁）

……新近方才開發的，還不過略為接觸到耕作的豐度較低的土地，只要氣候條件不十分壞，就會在長期內有收穫，而無需使用肥料，並且只要有極其表面的耕作，因為至少在土地的上層部分，積累有這樣多量的易于溶解的植物營養素。並且在西部大草原地帶，又要加進這一點：那里幾乎不須支出任何開發費用；自然已經使它成為可以耕作的^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77 頁）

所以，從一方面說，根據人口原理，勞動階級會比例于被決定歸于他們的生活資料，不斷成為多餘的，由生產不足而引起人口過剩。其次，有資本階級。由人口原理之故，他們可以不斷依照這樣的价格，把勞動者自己的生產物，再賣回給勞動者，以至勞動者在

① [近來又正好是這種大草原(Prärie 或 Steppe)地帶急速發展的耕作，使臭名遠揚的馬爾薩斯的“人口壓迫着生活資料”的命題，成為兒童的笑料。剛好相反，它引起了地主們的怨言。依照他們的主張，如果不用強力阻止那種壓迫着人口的生活資料的增加，農業並且隨意退步都會歸于破滅。但此等大草原的耕作還不過剛剛開始；它將來對於歐洲農業的革命影響，比之過去，還會更加厲害地令人感覺到。——恩格斯]

他們自己的生产物中，只能得回这样多，来維持他的身体和灵魂。然后，在社会中，有一个龐大的部分，是由寄生者，由放蕩的雄蜂（一方面是主人，一方面是奴婢）构成，他們一部分在地租的名义下，一部分在政治的名义下，无代价的，从資本家階級手里，占去財富的一个重大部分，从資本家手里課取貨幣，然后用这种貨幣，在价值以上，向資本家購買商品。資本家階級为生产的蓄积冲动所驅使，这种不生产者却在經濟上代表單純的消費冲动，代表浪費。这正好是避免过剩生产的唯一的手段。这种过剩生产，同那种与生产比例而言的过剩人口，是同时存在的。立在生产外的諸階級的过剩消費，就当作这二者的最好的救治方法，而被〔推荐了〕。劳动人口和生产間的不平衡，要由生产物一部分由不生产者无所事事者消費这一个方法，来抵消。資本家过剩生产的不平衡，要由放蕩的富有者的过剩消費，〔来解决〕。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51—52頁）

沒有疑問，巴登有一个极大的貢獻。亞當·斯密相信，对劳动的需要，会直接比例于資本的蓄积而增大。馬爾薩斯因見資本的蓄积，不能和人口的增加一样迅速，并且不能一样依递增的規模来再生产，便說会有过剩人口。巴登才強調下述一点：即，資本的不同諸有机成分，不会跟着蓄积和生产力的发展，同样增加起来；在增加的过程中，分解为工資的資本部分，和那被他叫做固定資本的部分相比較，会比例的减少下来；那被称做固定資本的部分，和它的量比較起来，只能微微变更劳动的需要。因此，他才提出这个重要的命題：“所使用的劳动者数”，不“与国家的財富成比例”，那就是，在一个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比之在一个产业发展的国家，所用的劳动者数会比较更大。李嘉图在他的《原理》第3版第31章

《論机械》內，——在以前几版內，他在这点上面，还是完全跟着斯密的足迹走——采用了巴登的修正，但也和巴登一样，陷在片面的理解中，他的唯一的进步点——但这是重要的——是：他不仅和巴登一样，提出这个命题：即，对劳动的需要，不与机械的发展，为比例的增加。他还主張，机械会使“人口成为过剩的”，从而，引起过剩的人口。不过，他錯誤地把这个結果限制在純生产物牺牲总生产物而趋于增加的場合。这个場合，虽然只有农业会发生，但在他看来，工业也会。事实上，全部不合理的“人口学說”是由此被推翻了；尤其是，劳动者必须把他們人数的增加压到资本蓄积程度以下这样一种庸俗經济学者的謠言，是由此被推翻了。反之，由巴登和李嘉图的見解将会推出如下的結果：劳动人口增加的限制，会由劳动供給的减少，从而，由劳动价格的提高，只会加速机械的应用，加速由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轉化，从而，人为的引起一种过剩人口。这种过剩，通例不是由生活資料的不足，而是由使用劳动者的手段的不足，由劳动需要的不足引起的。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702—703頁）

如果講坛社会主义者坚决要求我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回答这一問題：我們打算怎样消除人口过剩的威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社会制度崩潰的危險，那么，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應該讓他們如願以償。要給这些先生們消除那些由于他們的糊塗透頂而产生的各种疑慮，或者那怕是駁斥一下舍夫列在自己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所編造的各种荒誕无稽的胡說八道，我都認為簡直是浪費時間。只要把这些先生們从《資本論》中加上括号所作的錯誤引証改正过来，大概就可以編成整整一本著作。讓这些先生們首先学会閱讀和抄录，然后才要求人家回答他們的問題吧。

此外，我決不認為這個問題是當前迫切的問題，因為已經出現的美國的大規模生產和真正的大農業有着把我們真正地窒息在它們所生產的生活資料的重担之下的危險，因為我們正處在這樣一種變革的前夜，這種變革除了會引起其他的後果以外，還會使地球上住滿着人（您在第169—170頁上所寫的，只是過於膚淺地觸及了這一問題），這種變革即使在歐洲也一定會要求人口的急劇增長。

艾列爾的計算是和下述的這種計算同樣沒有價值的，下述的這種計算就是：如果公元第一年將一個克列采存入銀行以獲得復利，那麼，每隔三十年就會增加一倍，因而現在就大約等於 $\frac{1 \times 2^{144}}{60}$ 盾，即等於一塊體積大於地球的銀子。如果您在第169頁上說的是美洲社會關係和歐洲社會關係之間的差別並不太大，那麼這是正確的，因為你所考察的僅僅是沿海的一些大城市或者僅僅是這種關係的外表的法律形式。毫無疑問，美洲廣大居民群眾是生活在對人口增長極其有利的條件下。大量移民的遷入就是一個證明。但是，要使（人口）增加一倍，畢竟還得經過三十多年。這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當然，人類在數量上的這種增長的抽象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並且會引起限制這種增長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共產主義社會將來有個時候不得不調節人口的生產，就象它在這以前調節物質的生產一樣，那麼，只有這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實現這一點。要在這樣的社會里有計劃地達到這種結果，就象現在法國和奧地利南部自發地無計劃地發展起來的情形一樣，我認為，這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不管怎樣，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們自己會決定；為此應該不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什麼時候採取，怎樣採取，究竟採取什麼措施。我不認為自己負有使命一定要向他們提出什麼建議或者在這方面給予他們什麼忠告。這些人無論如何是不會比您我之輩愚蠢的。

不過，關於這一問題，我在1844年已經寫過（《Deutsch-Fra-

nzösische Jahrbücher》第 109 頁):“即使馬爾薩斯完全正確,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社會主義的)改造,因為只有進行這種改造,只有通過這種改造來教育群眾,才能使人們從道義上節制繁殖的本能,這種節制,馬爾薩斯本人也認為是防止人口過剩的最輕易最有效的手段。”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1881 年,載《學習譯叢》1957 年第 3 期)

我已經收到你 12 月 1 日的信。我不了解,司徒盧威先生斷言馬克思完成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而不是鄙棄它時,他的用意何在。我認為,第一卷評論馬爾薩斯的第二十三章第一節腳注 75,在任何人看來都是十分淺近的。再者,我不了解,當倫敦每夸脫谷物價格為二十先令,或只等於 1848 年到 1870 年的平均價格的一半的時候,以及當一般承認,人口還沒有大到足夠消費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對人口正在施以壓力的時候,任何人在今天怎能夠說到完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對生活資料施行壓力的理論呢?還有,如果俄國農民被迫出賣他真正要消費的谷物,那末,他並不是為人口壓力所迫,而是被收稅官、地主、富農等等的壓力所迫。就我所知,在整個歐洲,包括俄國在內,阿根廷小麥的低廉價格,對於農業災難來說是比任何事情更為可詛咒的。

(《恩格斯致丹尼爾遜的信》,1895 年 1 月 9 日,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114 頁)

“在土地屬於大小占有者的農業國家里,只要自願節育的風氣在人民習俗中還沒有鞏固,希望靠該一地域的產品過活的人手和消費者的經常過剩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問題》,第 157—158

頁) 朗格簡單地搬出這種純粹的馬爾薩斯原理, 而沒有提出任何論據。他一再重複這個原理說: “不管怎樣, 這樣的國家的人口即使絕對稀少, 也總要呈現出相對過剩的徵象”, “市場上占優勢的往往是勞動的供應, 而需求總是很低的”(第 158 頁)。這一切都是毫無根據的。從哪里可以看出“工人過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 從哪里可以看出這種過剩同人民習俗中缺乏自願節育風氣有聯繫呢? 在談論“人民習俗”之前, 不應當先看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生產關係嗎?……無論自願節育的風氣在人民習俗中如何鞏固, 人口“過剩”的形成總是不可避免的。朗格這種忽視社會經濟關係的論斷, 只是清楚地證明他的方法毫不中用。除了這樣的論斷外, 朗格再沒有提供什麼別的。他說, 廠主很願意把生產移到偏僻的鄉村, 因為那里“時時刻刻為任何工作準備着必要數量的童工”(第 161 頁), 但他不去探討是什麼樣的历史條件、什麼樣的社會生產方式促使父母“準備”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人奴役。……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 1894—1895 年,《列寧全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第 432—433 頁)

1762—1846 年期間的統計材料表明, 人口的增殖總的說來是並不快的: 每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一點零七至百分之一點五。此時人口增殖較快的, 照阿爾先也夫的說法, 是“種谷物的”省份。司徒盧威先生得出結論說, 這個“事實”“對於人民經濟的原始形式來說, 是非常典型的, 因為在這種經濟條件下, 增殖是同天然肥沃程度成正比的, 而且這個比例甚至用手都可以摸得出來”。這是“人口增殖和生活資料相適應的規律”的作用(《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述》, 第 185 頁)。“土地面積愈大, 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愈高, 人

口的自然增長率就愈大。”(第186頁)結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因為這裡僅僅根據一件事實，即歐俄中靜各省在1790—1846年內人口增長最慢的是弗拉基米爾省和卡盧加省，就得出了一個完整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資料相適應的規律。難道可以根據“土地面積”來判斷人口的生活資料嗎？(即使承認依據這樣少量的材料可以做出一般性的結論)要知道，這些“人口”並沒有把他們所謀得的“天然肥沃”的產品直接歸自己，他們是跟地主、國家分享這些產品。這種或那種地主經濟制度——代役租或徭役租，兩種租的數額及其征收方式等等——對於人們獲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的影響要比不歸生產者絕對占有和自由占有的土地面積的影響大得無法比擬，這難道還不清楚嗎？不僅如此。儘管有表現為農奴制度的社會關係，人們當時就已被交換聯繫在一起了，作者說得很對，“加工工業從農業中分出的現象，即社會的全國的分工，在改革前的時代就已存在。”(第189頁)試問，既然這樣，為什麼我們要認為生活在沼澤地帶的弗拉基米爾省的手工業者或商販的“生活資料”不如握有“天然肥沃的土地”的唐波夫省的粗野的農夫那樣充裕呢？

接着，司徒盧威先生列舉了解放前農奴人口減少的材料。他所提到的那些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歸之於“福利的下降”(第189頁)。作者得出結論說：

“我們所以談到解放前農奴人口減少的事實，是因為在我們看來，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俄國當時的經濟情況。我國大部分地區的人口，在當時的技術經濟條件和社會法律條件下曾……處於飽和狀態，這些條件對將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的稍微迅速的增殖，都是直接不利的。”(第189頁)既然農奴制的社會制度把這些生活資料直接送到一小撮大土地占有者的手裡，而不給人民群眾(要研究的卻正是他們的增殖)，那末這與人口增殖和生活資料相適應的馬爾薩斯“規律”有什麼關係呢？作者認為人口增加最少的或者是

土地不肥沃、工業不發達的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純粹農業的省份，能不能承認這種見解有什麼價值呢？司徒盧威先生想把这个事實看做即使沒有商品經濟也定會產生的、“適合自然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的表現。而根據同樣的理由（如果不是根據更多的理由）可以說，這種人口過剩是適合農奴制經濟的，人口的緩慢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對農民勞動的剝削的加重，而剝削的加重又是由於商品生產在地主經濟中增長起來，因為地主開始使用徭役勞動來生產出賣的糧食，而不只是滿足自己的需要。作者舉出的例子是反對他自己的，這些例子說明，決不能忽視歷史上特定的社會關係體系及其發展階段而按照人口增殖和生活資料相適應的公式來建立抽象的人口規律。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1894—1895年，《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4—436頁）

附錄：

我們是在被“人口過剩”威脅着。有些人以為這個問題已經非常迫切，所以將“人口問題”看作最為緊急的問題。在國民的食物及人口的分布漸漸成為國際問題的今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非從國際的見解來觀察不可。關於人口增加的法則，馬爾薩斯以來已經有了許多爭論。馬爾薩斯的名著《人口論》曾被馬克思判定為“對於德福、斯杜亞、湯生德、富蘭克林、瓦拉斯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學生樣淺薄的、以說教口吻所說出的剝削”，“連一行獨創的章句也沒有”。他說人口以幾何級數的比例（象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那樣）增加，而食糧以等差級數的比例（象一、二、三、四、五、……那樣）增加，所以，人口總數和食糧供給將要不能保持平

衡，将来非全体貧困到最后餓死不可，因此，各人都應該限制产儿云云。馬尔薩斯主張“自然的食桌”已經沒有供給子孙的席位，所以沒有力量扶养家族的人們，万万不可結婚。

人口过剩的恐怖，古代已經有过，和本書第一編所述一样，希腊人羅馬人之間及后来中世紀末叶，都已經有过这种現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羅馬人、中世紀的小市民，都曾受过这种恐怖的支配。福耳特耳也曾被这种恐怖所襲，在十八世紀初叶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論文。其他的著作家都仿效他，直至馬尔薩斯才最精确地将这种恐怖表現出来。

在既存社会状态陷于崩溃的时代，往往有人口过剩的恐怖。在这种时代发生的一般不滿，往往不想到食粮的生产及分配方法，而只想到人口过多和食粮不足。

人剝割人的制度是建筑在阶级的統治之上的。阶级統治的最初最有力的手段是土地的占有，从土地共有次第变为私有，多数的人是无产的，于是要想取得食物，非向有产者效力不可。在这种状态之下，負担因家族（即新的竞争者）增加而加重。于是，才有人口过剩的“鬼魂”出現。因为土地逐漸被独占，所以生产力减退（不能充分地耕作，将耕地改为牧場或供地主娱乐的猎場之类），于是人口过剩的恐怖也愈加蔓延。羅馬及意大利最为食粮缺乏所苦的，是土地为三千大地主所独占的时代。这时候，发生了“大地主灭亡羅馬”的恐怖的呼声。意大利的土地被所有者的貴族們改为无数的公园及猎場，这时候，因为从西西里及非洲輸入的谷物，反而比用奴隶耕种的便宜，所以有些田地都讓它荒廢。在这种情况下，谷物的高利貸流行，富裕的羅馬貴族們也去参加。这实在是土地耕作閑廢的主要原因。貴族們在国内耕种，不如放高利貸容易賺錢。

因为当时状态如此，所以羅馬市民及貧穷貴族，都避忌結婚及生育。統治阶级想用奖励法来防止人口减少，結果完全无效。

中世紀末，因為幾百年來貴族及僧侶們用策略和暴力手段掠奪了很多農民的財產，霸占了共有地，所以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當時的農民因為不堪壓迫，曾起來反抗，但不久即被鎮壓下去了。貴族的掠奪田產依舊大規模的進行，皈依新教的王侯們也同樣地掠奪寺院財產。當時乞丐、盜賊、流氓無限的增加，而尤以宗教改革之後，增加得更為厲害。土地財產被掠奪的鄉村人們，象潮水般流進都市，而都市的狀態，也和以前所述的諸原因同樣，生活關係也非常惡化。於是“人口過剩”到處流行。

馬爾薩斯的出現，正在因為哈格利甫、阿克米及瓦特的新發明的結果，英國的產業有了劇烈變化的時代。這種變化對於紡織及亞麻工業的影響最大，因此，數十萬從事家庭手工業的工人變成失業。土地財產的集中及大工業的發達，那時在英國流行很厲害。一方的財富急劇增加，他方多數的群眾陷於窮困。在這種時代，將現在世界看作最好的世界的統治階級，對於財富的增加和產業的繁榮與大眾窮困的矛盾現象，當然非有一種卸除自身責任的說明不可。於是，不難因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及土地為大地主所兼并使人口過剩，却非難工人繁殖太快，真是最好的辯解。在這種環境之下出版的馬爾薩斯的“小學生樣淺薄的、以說教口吻所說出的剽竊”，表現出統治階級心里要說的和願望，而且主張認這種思想和希望為正當的馬爾薩斯學說一方博得非常的成功，他方受了劇烈的反對，原因在此一點。在英國資產階級看來，馬爾薩斯所說真是適合時宜，所以他的著作則“連一行獨創的章句也沒有”，他却成為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簡直可以作為人口論的代表。^①

（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三聯書店
1955年版，第480—482頁）

① 達爾文及其他學者，也採用了馬爾薩斯學說，這一點，可以證明沒有經濟學知識容易使科學家陷於偏見。

馬爾薩斯“人口論”和达尔文主义

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的著作《物种原始論》(第2版,倫敦1860年)序言中,曾說道:

“在下一篇,我們將論到全世界有机体間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的,会由高度的几何級数的增殖能力引起。这是馬尔薩斯的学說在全动植物界的应用”。

达尔文在他的优秀的著作內,沒有看到,他在动植物界发现“几何”級数时,他是把馬尔薩斯的理論駁倒了。馬尔薩斯的理論,正好是以下述一点为基础:即,他是用沃拉斯的人类几何級数,和幻想的动植物界的“算术”級数相对立。除根本的原則不說,达尔文的著作(比方說,在論述物种消灭的地方)还曾在細目上,从自然史方面,否認馬尔薩斯的理論。而在馬尔薩斯的理論以安特生的地租学說为根据的限度內,他的理論又为安特生自己所否定了。比方說,李嘉图,由他的理論,断定工资提高到最低限度以上的事情,不会把商品的价值提高时,他說的,就正好是这一层。馬尔薩斯却要工资常在低微中,想由此給资产階級以利益。

(馬克恩:《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301頁)

我又在看达尔文,使我高兴的是他說,他把“馬尔薩斯的”学說也运用到植物和动物上面,好象馬尔薩斯君的滑稽处不在这种学說,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以几何級数,仅仅应用于人,与植物和动物相反。达尔文在野兽和植物之中再認識他的英国社会,这社会有它的劳动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場、“发明”和馬尔薩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士的一切对一切作战,而且这令人想起黑

格爾的《現象論》，其中把市民社會描寫為“精神的動物世界”，而達爾文則把動物世界描寫為市民社會。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2年6月18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88頁）

朗格先生（《關於工人問題等》，第2版）大大地稱贊了我，可是那目的是在於使自己顯得重要。朗格先生，你知道，得著了一個偉大的發現呢。整個歷史都只須包括在一條簡單的大自然規律之下。這一自然規律，就是這句話（達爾文的表述在這一應用上成了一句空話）“生存鬥爭”，而這句話的內容却是馬爾薩斯的人口律，或者毋寧說人口過剩律。所以，以其去分析歷史上各種不同的特定社會形態所表現的“生存鬥爭”，人們所要作的，只須將每一個具體鬥爭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而把這句話又變成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狂想”。人們必須承認，這對於矜夸的、假冒科學的、大言無知和理智的懶惰，倒是一種十分透徹的方法呢。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1870年6月27日，致庫格曼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頁）

親愛的拉甫洛夫先生：

我從訪問德國歸來，現在終於收到你的論文（指《社會主義和生存鬥爭》——編者），剛才我曾以很大興趣把它讀過了。這裡用德文寫出我對它的觀察，因為這使我能夠寫得較簡明些。

（1）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接受進化學說，但只把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鬥爭，自然選擇）作為新發現的事實的最初的、暫時的和不完全的表現。在達爾文以前，正是那些現在到處只看

見生存斗争的人物(福格特、毕希納、摩萊蕭特等等)強調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界如何把氧氣和食料供給動物界，而動物界則反過來把碳酸和肥料供給植物界，如利比希特別強調的。這兩個概念在一定範圍內有其一定的正確性，但每個概念都是和別個概念同樣地片面和狹隘。自然機體——不論是動物的或非動物的——的相互作用既包括和諧，也包括衝突，既包括斗争，也包括合作。因此，如果一個所謂自然科學家，容許自己把歷史發展的整個多方面的財富都歸結到片面而貧乏的術語“生存斗争”之下，歸結到即使在自然界中也只能極有條件地加以接受的術語之下，那末這種方法本身就是可責備的。

(2) 在你所引証的三個“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中，似乎只有海爾華爾德(Hellwald)值得提出。賽德利茨(Seidlitz)最多不過是一個較出名的小人物，而羅伯特·拜爾(Robert Byr)卻是一個小說家，他的小說《三次》現在才在《陸地與海洋》雜誌發表，那里對於表現他的全部虛夸也正得其所。

(3) 我把你的攻擊方法稱之為心理學的，且不爭論你的方法的優點，但我自己卻要選擇另一種方法。我們兩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主要在其中往來的知識界的影響。對於你比我更了解其公眾情況的俄國來說，和對於一個訴諸“聯繫着的感情”及道德感的宣傳性雜誌來說，你的方法或許是較好的。但對於虛偽的情操已起了並仍然起着如此巨大危害的德國來說，這種方法將會是不適當的，並且會被帶感情地誤解和歪曲。我們所需要的——無論如何，在開始的時候——是恨而不是愛，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把德國的唯心主義最後殘余鏟除淨盡，並把物質的事實放在它們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因此，我要用以下的方式攻擊這些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也許我會及時地這樣做）。

關於生存斗争的全部達爾文學說，是把霍布士的人與人相互

敌对的学說，和資產階級关于竞争的經济学說，再加上馬尔薩斯的人口学說，簡單地从社会搬到动物界。这种戏法一經完成——如在第一点下已經指出的，我反对它的无条件的正确，特别是关系到馬尔薩斯的学說的地方——再把同样学說从有机界搬回到历史上，而它們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規律的效力就被宣称已經証明了。这种方法之幼稚是显而易見的，不值得多說的。但是，如果我要进一步深入問題，我要依下述方式来做，我首先要揭发他們是拙劣的經济学家，然后才揭发他們是拙劣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4) 人类和动物社会間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最多不过是搜集者，而人类則是生产者。单是这个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区别，就使得把动物界的規律簡單地搬到人类社会成为不可能。由于这个区别，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就有可能：“人类不仅为了生存，而且为了享乐和增进他的享乐而进行斗争……他准备为了較高的享乐而放弃較低的。”且不爭辯你由此引伸出来的进一步的推論，我从我的前提中应得出如下的进一步的結論：因此，在一定阶段上，人类生产达到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也生产奢侈品的水平，即使在当时他們还只为少数人而生产。因此，生存斗争——如果在这里我們暂时承認这个范疇是有效的話——本身轉化为为享乐斗争，这种斗争不再是仅仅为了生存资料、而且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料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动物界的范疇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如果象現在发生的那样，資本主义方式的生产，因为資本主义社会人为地使最大多数真正生产者得不到生存和发展資料，从而生产出远远超过資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費的异常丰富的生存和发展資料；如果这个社会被它本身生存的規律所强制，繼續增加对它早已成为太多的生产，因此每十年周期性地达到它本身不仅毁坏大量生产物而且也毁坏大量生产力这一点，那末，关于“生存斗争”的議論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生存斗争只能在于生

產階級把生產與分配的控制權，從至今仍受委託但現在已不稱職的階級手中奪取過來；而這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應該附帶指出，“單是把過去的历史看作一系列階級鬥爭這種認識，已能把同一個历史看作“生存鬥爭”的略為變樣的翻版這種觀念的肤淺性質揭露無遺。因此，我永遠不會向這些偽詐的自然科學家讓步。

(5) 根據同樣理由，我應該對你的命題作出不同的表述，你的命題在本質上是十分正確的，“為了減輕鬥爭的團結的思想，能够……，最終擴大到包括全部人類，並把它作為一個兄弟的團結的社會，而與礦物、植物及動物的其餘世界對立起來。”

(6) 在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你之認為“人與人互相敵對”是人類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我的意見是，在從猿到人的發展中，社會本能是最基本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一定是成群地居住的。如果我們能遠遠回溯到過去，我們會發現情況正是如此。

11月17日：我再次被迫中斷這封信，為了寄給你，我今天繼續來寫。你會明白，我的評論與其說是對你的攻擊的實質的，不如說是對它的方式和方法的。我希望你覺得所寫的是够清楚的，我匆忙寫成，重讀時想變動許多字，但我擔心這會使得信稿太潦草難讀了。

致以

熱烈的敬禮。

弗·恩格斯

（《恩格斯致拉甫洛夫的信》，1875年11月12日，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79—183頁）

“從壓力與衝擊的力學到感覺與思維的聯繫，延伸着中間層級的單一的和統一的階梯。”用了這樣的斷言，杜林先生就使自己不

用費心去進一步探討生命的起源，雖然對於那位推測了宇宙發展直至其不變狀態，並且在其他天體上感覺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樣的思想家，似乎是可以希望他確切知道這點的。此外，假使沒有補充上述的黑格爾的計量關係的交錯綫，那麼，杜林先生上述的斷言也只有半是對的。不管所有這些中間的層級，從一種運動形式進到另一種運動形式的轉變永遠是一種飛躍，一種決定的改變。從各個天體的力學轉變到各別天體上微小物體的力學是如此；從物體的力學轉變到分子的力學——包括作為物理學（就其本意來說）研究對象的那些運動：熱、光、電、磁——也是如此。同樣地，從分子物理到原子物理——到化學——的轉變，也是由於決定性的飛躍而完成的；從普通化學作用到蛋白質的化學作用——即我們所謂生命——的轉變更加是如此的。在生命的範圍內，飛躍往後就逐漸變得愈益稀少和不顯著了。這樣又是黑格爾來糾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的概念為杜林先生效了勞，使其在觀念上轉變到了有機界。這又是從黑格爾那里抄來的，黑格爾在其《邏輯》一書中——在“概念論”中——因目的論之助，作了從化學作用到生命的轉變。在杜林先生的書上我們無論往哪里看，總是遇到某種黑格爾的“糊塗觀念”，而杜林先生毫不知恥地把它拿來作為自己的“窮究底蘊的科學”。如果在这里我們來研究把關於目的與手段的觀念運用到有機界去究竟正確與適當到何種程度，那我們或許說得太遠了。無論如何，就是應用黑格爾的“內在的目的”——就是說，並非被那個有意識地行動著的第三者（如先知）所納入於自然界中的目的，而是存在於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就是這一應用，也經常使得那些沒有基本哲學素養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覺的或有意識的行動，歸之於自然。杜林先生在別人稍許帶着“唯靈主義”傾向的時候，表現最大的義憤，可是他自己却深信地斷言“本能主要是為

着与游戏相伴而来的那种享乐而产生的”。他告訴我們可怜的自然“不得不經常地一再地維持对象的世界中的秩序”，而且除此之外，自然还要解决許多問題，这“要求自然具有比常人所想的更大的纖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为什么它創造这个或那个东西，自然界不仅要作家庭僕妇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纖巧性——即此已是主觀自覺思維中的非常良好的成就了——而且它还有意志。至于本能的补充作用——它們附帶地执行現實的自然机能：营养、生殖等等——那么，“我們应当把它們看作不是直接所願意有的东西，而是間接所願意有的东西。”这样，我們就达到了一种自覺思維的、自覺行动的自然界，因此，我們就站立在一种“桥梁”之上。真的，这桥梁不是从靜跨越到动，而是从泛神論跨越到自然神論。也許杜林先生自己想稍为鑽研一下“自然哲学的半成詩”？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现实哲学家关于有机界所能告訴我們的，只是限于这样一些攻击，去反对自然哲学的半成詩，反对“带着輕佻的表面性以及带着伪科学的神秘性的吹牛主义”，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詩化的特征”。

首先責备达尔文，說他把馬尔薩斯的人口論从政治經濟学搬到自然科学里，說他沒有超越牲畜飼養者的觀念的範圍，說他在其生存竞争論中从事于非科学的半成詩，总之全部达尔文主义除其从拉馬克所引用的东西之外，都是一片反对人性的兽性。

达尔文从其科学的旅行中，得出这样的意見說，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变化的。为着在其家乡往前貫徹这一思想，除动物、植物的人工培养外，他再沒有更好的观察的場地了。在这方面英国正是古典的国度，其他国度，例如德国的成績，在規模上是远远的不能和英国所已获得的成就相比拟的。此外，这一領域上所获得的成就，大部分是得之于最近的一个世紀，所以确立事实是沒有多大困难的。达尔文发现这种培养对于同一种类的动

物、植物由人工所造成的區別比較那些大家認為是異種的動物及植物的區別還要大些。這樣一方面，在一定程度內證明了物種的可變性，他方面證明了具有不同的物種特征的有機體可能有共同的祖先。達爾文往後更研究了在自然界本身中能否找出這樣的原因，它們沒有培養者的自覺的意圖，就能在相當時間內，在活的有機體中造成和人工培養所造成的同樣的變化。他發現這些原因是在於所產生的胚種的極大數量和實際獲得成熟的有機體的極小數量之間的極不相稱。由於每一胚種都力求成長，所以就必然產生生存競爭，這種競爭不僅表現於直接肉體鬥爭或吞噬，而且甚至表現於植物爭取空間及日光的鬥爭。顯然在這一鬥爭中，那些擁有某種利於生存競爭的個別特質（即使是微小的）的個體具有達到成熟和繁殖的最大的機會。這些個別的特質還有着遺傳的趨勢，而如果這些特質在同一物種許多個體中遇到，那麼，通過累積着的遺傳，它們還有按着已經採取的方向而加強起來的趨勢；相反地，不具有這種特質的個體容易在生存競爭中死亡，因而逐漸消失。這樣通過自然選擇，通過適者生存，於是物種發生變化。

杜林先生反對達爾文的這一學說道：如達爾文自己所承認的，生存競爭的觀念的起源，是在於把經濟學者、人口理論家馬爾薩斯的觀點一般化。這樣，按照杜林先生意見，上述達爾文的學說具有人口過剩問題上馬爾薩斯的神甫式觀點所固有的那一切缺陷。可是達爾文卻從沒有想到說生存競爭的觀念的起源應當求之於馬爾薩斯。他僅僅說，他的生存競爭學說是應用於全部動物植物界的馬爾薩斯學說。如此幼稚地不加批判而接受馬爾薩斯學說的達爾文，無論犯了何等大的錯誤，但任何人一眼就可發現，並不須要有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在自然界中看到生存競爭，看到自然界所如此浪費地產生着的胚種之不可勝計的巨大數量和其中一般能夠達到成熟地步的微小數量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真的大部分是

由生存競爭而且是極端殘酷的生存競爭來解決的。好象李嘉圖用馬爾薩斯的論據來證明工資規律，而當這一論據早被遺忘之後，工資規律還依舊保持自己的意義，同樣的生存競爭盡可以不管馬爾薩斯式的解釋，而依舊進行于自然界之中。其實，自然界里的有機體，同樣有它自己的規律。這種規律還差不多完全沒有被研究過。這些規律的陳述無疑地對於物種發展的學說將有決定的意義。可是誰在這一方向上給了決定的推動呢？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究問題的積極的方面。生存競爭的學說再次再次地被非難着。按照他的意見，在沒有意識的植物和馴順的草食動物之間是顯然說不上什麼生存競爭的：“按照文字的確切意義說來，在獸類中，只當奪取食物、弱肉強食之時，才有生存競爭。”在他把生存競爭的概念限於這樣狹隘的範圍之後，他於是就可以對這一概念（他自己把這一概念限於獸類）的兽性大大表現其義憤。可是這種義憤之矢只能射在杜林先生之的上。他正是這種被限制的生存競爭說的唯一原著者，所以對此只能由他單獨負責。因此，不是達爾文“在獸類王國中尋找自然界一切活動的規律和知識”——事實上，達爾文是把全部有機界包括於生存競爭的範圍之中——而是杜林先生自己所製造的幻想的妖怪在尋找着這些。生存競爭的名稱，我們盡可以讓它作為杜林先生高超的義憤的犧牲品，可是這種鬥爭的本身事實甚至存在於植物界中——這一點，每塊草地、每畝谷田、每片樹林，都是可以向杜林先生證明的。事情不是在於名稱上，不是在於應當說“生存競爭”或者說“生存條件的缺乏和機械的作用”，而是在於這一事實如何影響於物種的保存和改變。關於這個問題，杜林先生總是處在固執的自身不變的靜默之中。因此，關於自然選擇，一切還是照舊。

但是達爾文主義“從烏有之中產生自身的變化與差異”。真的，當達爾文說到自然選擇時，他並沒有考慮那些引起個別生物變

化的原因，而首先只是說明這種個別的變異怎麼樣逐漸地成為一定品種、變種或種的特徵。對於達爾文，事情首先與其說是在於找出這些原因——它們直到現在一部分是完全不知道，一部分也只能指明其最一般的特徵——還不如說是在於找出一種合理的形式，在此形式中，它們的作用可以固定起來，可以獲得久遠的意義。真的，達爾文給予自己的發現以太過廣大的活動範圍，他把自己的發現看作是物種變化的唯一動因，並且由於集中注意於這些變異變成普遍時所採取的形式；而忽視重複產生的個別變異的原因；這是一個缺點，但這缺點是達爾文以及大多數真正推動科學前進的人們所共有的。此外，如果達爾文從鳥有之中得出其個別的变化，並且在此僅僅是應用“牲畜飼養者的智慧”，那麼任何飼養者及選種家也同樣從鳥有之中得出動物和植物形態的变化，而且這種变化是現實的，不是僅僅想象的。可是這些变化和差異實際上是從何產生的，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給予推動的不是別人，還依舊是達爾文。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72頁）

新馬爾薩斯主義是沒落階級的思想武器

在皮羅哥夫醫生代表大會上，關於墮胎，也就是關於人工流產這個問題，引起了很大的興趣和熱烈的討論。報告人利奇庫斯引用了在現代所謂文明國家里極為流行的墮胎現象的材料。

在紐約，一年以內人工流產達八萬次，在法國，一個月就有三萬六千次。在彼得堡，人工流產的百分比在五年內增加了一倍多。

皮羅哥夫醫生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認為母親因人工流產而受到處罰這是不應當的，至於醫生也只是在“為了謀利”而做這種事情的時候才應當加以追究。

在討論中，大多數人發言擁護墮胎不受處罰的主張，自然這也就涉及到所謂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問題（人工避孕法），並且觸及了事情的社会的一面。例如，根據《俄羅斯語言報》報道，維格多爾契克先生認為“避孕措施應該受到歡迎”，而阿斯特拉漢先生的叫喊，博得了熱烈的掌聲，他說：

“我們應當使母親相信，生孩子就是為了使他們在學校里受摧殘，為了給他們舉行抽籤，為了使他們被迫自殺！”

如果這個報道屬實，阿斯特拉漢先生的這種論調果真博得了熱烈的掌聲，那麼這個事實並不使我驚奇。因為在座的都是一些帶有市儈心理的中小資產者，從他們那里，除了最庸俗的自由主義以外，又能期待什麼呢？

但是，從工人階級的观点來看，阿斯特拉漢先生這番話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出了“社會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全部反動性和全部貧乏性。

……“生孩子就是為了使他們受摧殘”……僅僅是為了這個嗎？為什麼不是為了使他們比我們更好地、更同心協力地、更自覺地、更堅決地去同摧殘和毀滅我們這一代的現代生活條件作鬥爭呢？

這也就是農民、手工業者、知識分子以及一切小資產者的心理同無產階級的心理的根本區別之所在。小資產者看到和感覺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更加難過了，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更加殘酷無情了，他們和他們家庭的處境更加沒有出路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小資產者也反對這種事實。

但是怎樣反對呢？

他們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絕望的、受压抑的和畏怯的階級的代表来进行反对的。于是也就只好少生几个孩子，免得他們也象我們那样受苦受难，也象我們那样貧困屈辱了，——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

觉悟的工人同这种观点是有无限远的距离的。不管这种叫喊是多么誠懇动人，但他們是不会因这种叫喊而使自己的意識模糊的。是的，我們工人們，以及小业主群众，我們都过着难堪的受压迫受苦受难的生活。我們这一代比我們父輩更艰难。但是有一点我們要比我們的父輩幸运得多。我們学会了并且正在迅速学习着斗争，而且我們不象我們父輩中的优秀人物那样单独地斗争，也不是为了實質上与我們背道而馳的资产階級狡辯家的口号而斗争，我們是为了自己的口号，为了自己階級的口号而斗争。我們比我們的父輩奋斗得好。我們的子女將比我們奋斗得更好，他們一定会胜利。

工人階級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鍛炼。对于农奴制度、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們是悲觀的，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們是非常乐观的。我們已經为新的大厦奠定了基础，我們的子女將要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們是新馬尔薩斯主义的死敌；新馬尔薩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男女市儈的思潮，这些人恐惧地咕囔說：我們自身，上帝保佑，还能勉强維持下去，至于孩子最好別再生了。

当然，这絲毫也不妨碍我們要求无条件廢弃一切惩罚堕胎的法律，也不妨碍我們拥护傳播有关避孕方法的医学著作等等。这些法律不过是統治階級的一种假道学。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膿疮，反而会使这种膿疮更加恶化，使被压迫群众受到更大苦痛。医学宣傳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碼民主权利是一回

事。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社會學說是另一回事。覺悟的工人永遠要進行最无情的斗争，來反對把這一反動的怯弱的學說加到現代社會最先进的、最強大的、最有決心去進行偉大改造的階級的身上的企圖。

（列寧：《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主義》，
1913年，《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227—229頁）

2. 駁斥“土壤肥力遞減規律”

……照李嘉圖的理論說來，地租並非別的東西，不過是生產費與土地生產物價格間的差額罷了，或如他的另一種說法：只是那最劣的土地為補償它的費用（佃農的利潤和利息總是包括在此等費用裏面的）必須出賣的價格和最優的土地能夠出賣的價格間的差額。

依照他對於自己理論的解釋，地租的增加證明：

一、較劣質的土地總是被開墾，或者同量資本連續使用於同一土地上，不能獲得同樣的生產物。一句話：土質是和人口對它要求的加多，必定是在同一比例中變劣的。土地變成相對地愈加貧瘠了。馬爾薩斯就在這裡找著了他的人口論的真實基礎，而他的學生們現在也在这里尋求自己最後的避難所。

二、當谷物的價格增加時，地租才能增加（至少經濟上是合法的）；當谷價下降時，地租必定下降。

三、全國的地租總額如果增加，那只能由此來解釋相對較劣的土地被開墾出來了。

現在這三個命題處處是和歷史矛盾的。

一、隨着文明的進步，較劣質的土地總是加以開墾，這沒有疑問。但科學和工業進步的結果，這種較劣質的土地和從前的優良的土地對比，是相對地較好的，這也同樣沒有疑問。

二、自 1815 年以來，谷物的價格從九十先令降至五十先令，在廢除谷物條例之前，並且降至此數以下，這樣的下降雖不規則，却是繼續的。地租則不斷地增加。英國是這樣。大陸到處有相應的變化。

三、我們在一切國家所發現的，如配第曾經指出的，是：當谷物的價格下降時，國家的全部地租的總額增加了。

這一切中的主要問題仍是使地租的法則和一般農業豐產的進步相符合；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歷史的事實，在另一方面，也只有這樣才能鏟除馬爾薩斯的減退論，他所謂減退，不僅是勞動力，而且也是土質。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1 年 1 月 7 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1 卷，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145—146 頁）

……利比居的不朽的功績之一是：他從自然科學的立場，把近代農業的消極方面展開了。再者，他對於農業發展之歷史的敘述雖不免有嚴重錯誤，但總算在這方面，包含着卓越的見解。但他會發出象下面那樣的無意義的議論來，那是值得遺憾的。他說：“把土壤耕得更深，犁得更頻繁的結果，是於松土內部的空氣流通有益的。受空氣作用的土壤面積，是擴大了，更新了。但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增加，不能與土地上面所用的勞動成比例，他是依較小得多的比例來增加。”接着又說：“這個法則，最初是約翰·穆勒依如下的方法，在其所著《經濟學原理》（第 1 卷，第 17 頁）中敘述的。他說：‘在其他事情相等的限度內，與所使用的勞動者的增加相對

而言，土地生产物是以漸減的比率增加的。这是一个农业上的普遍法則。”（在这个引語中，穆勒先生是用錯誤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法則；因为，“所使用的劳动者的减少”，在英格兰是不断和农业的进步，相伴而起的。这个在英格兰发现并且为英格兰发现的法則，至少在英格兰是不能应用的。）“这是一个极堪注目的事实，因他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法則的根据。”（利比居前書第1卷，第143頁和注。）且不說利比居对于“劳动”一詞的解釋是錯誤的，和經濟學上的理解不同。还有一件“极堪注目的事实”，是他把約翰·穆勒認為是这个學說的首倡者。實則，这个學說最先是由亞當·斯密時代的安特生發表的；它曾在十九世紀初葉，在若干種著作上，反復被重述。剽竊能手馬爾薩斯（他的人口理論，是一種最無恥的剽竊），在1815年，把這個學說占有了；瓦斯特曾與安特生同時，但與安特生無關地，展開過這個學說；1817年，李嘉圖才使它和一般的價值學說聯繫起來，此後才在李嘉圖的大名下，為世界所周知。1820年，詹姆士·穆勒（約翰·穆勒的父親），把這個學說庸俗化了。最後，這個學說，才當作一個老生常談的學派教義，由約翰·穆勒等人反復敘述。這是不容否認的，約翰·穆勒的“极堪注目的”權威，幾乎只是由於這一類的顛倒錯亂。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19—620頁，
注325）

……臭名遠揚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顯而易見”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如果連續投入土地的勞動和資本所帶來的產品不是遞次減少而是數量相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擴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積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全世界的農業就可以容納在一俄畝土地上了”——這就是常見的（也是唯一的）

為“普遍”規律辯護的論據。任何人只要稍微考慮一下，就會明白，這個論據是一個毫無內容的抽象概念，它拋開了技術水平和生產力狀況這些最重要的東西。事實上，“追加的（或連續投入的）勞動和資本”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以生產方式的改變和技術的革新為前提的。要大規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資本量，就必須發明新的機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飼養方法和產品運輸方法等等。當然，投入比較少量的“追加勞動和追加資本”，可以在原有的、沒有改變的技術水平的基礎上實現（而且也正在這樣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在某種程度上是適用的，這只是說，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追加勞動和追加資本的範圍是比較狹小的。可見，我們得出的並不是普遍的規律，而是極其相對的“規律”，相對得說不上是一種“規律”，甚至說不上是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徵。……“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完全不適用於技術正在進步和生產方式正在變革的情況，而只是極其相對地、有條件地適用於技術不變的情況。所以，馬克思也好，馬克思主義者也好，都不談這個“規律”，只有象布倫坦諾之流的資產階級科學家才會叫喊這個“規律”，因為他們怎樣也擺脫不了舊政治經濟學的偏見及其抽象的、永恆的、自然的規律。

（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901年，《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87—88頁）

……一般說來，人的勞動是無法代替自然力量的，正如俄尺不能代替普特一樣。無論在工業或農業中，人只能認識和利用自然力量的作用，借助機器和工具等等減少利用的困難。說原始人獲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無償的賜物，這是笨拙的童話，連剛進大學的學生听了也會對布爾加柯夫先生喝倒采。這種黃金時代在過去從

来沒有过,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更多的机器、工具和货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沒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順利地进行生产。說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賜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列宁:《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901年,《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89頁)

技术进步是“暫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規律,即在技术不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逆次降低(并非永远如此)的規律,却“具有普遍意义”¹。这就如同說,火車停在車站上是蒸汽运输业的普遍規律,而火車在两站之間行駛却是使靜止的普遍規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

(列宁:《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901年,《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89—90頁)

……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現象,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农业国,还是进口粮食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十九世紀的全部历史,用不同国家的大量資料确凿地証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規律完全不发生作用;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业人口为日益增加的居民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

(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901年,《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90—91頁)

……在农业人口减少或者增加很少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完全粉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妄想复活馬尔薩斯主义的荒謬企图。在俄国的“前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司徒卢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在他的《述評》中作了这样的企图,但终究不过是一些羞答答的、吞吞吐吐的、模棱两可的意見,沒有考虑成熟,沒有成为一套系統的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更勇敢更彻底,他毫不犹豫地“把‘肥力递减規律’变为‘文明历史上最重要的規律之一’”(sio₁ 第18頁)。“十九世紀的全部历史……连同它的貧富問題,离开这一規律是无法理解的。”“我絲毫也不怀疑,社会問題,按現在的提法,是同这个規律密切联系的……”(我們这位严峻的学者在他的《研究著作》第18頁上就宣布了这一点)他在該書的結尾說:“无疑地,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某一部分的貧困应看作是絕對貧困,是生产的貧困,而不是分配的貧困。”(第2卷,第221頁)“在我看来,农业生产的条件所造成的特殊提法的人口問題,已經成为农业經濟中比較广泛地实现集体主义或协作化原則的主要困难(至少在目前是如此)。”(第2卷,第265頁)“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比社会問題更可怕、更困难的粮食問題,是生产問題,而不是分配問題”(第2卷,第455頁),如此等等。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規律上面已經分析过了,因此同这一規律有密切联系的“理論”的科学价值,就不用不着多談了。向馬尔薩斯主义献媚的批判,按其必然的邏輯的发展,一定成为最庸俗的资产階級辯护术,这一点在我們所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結論中,已經确凿无疑地被証明了。

(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901年,《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92—93頁)

……有些作家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把“粮食問題”說得比社会問題更加可怕更加重要,以此吓唬无产階級,他們贊揚人工节制生育,說什么“調节人口增殖”将是农民富裕的“根本的(原文如此)經濟条件”,說什么这种調节值得“重視”,說什么“农村人口的增长在悲天憫人的(1?)道德論者中間引起了許多伪善的憤懣”(仅仅是伪善的憤懣,而不是对現代社会制度正当的憤懣嗎?),“似乎无节制的淫乐(原文如此)倒是——一种美德”。这班作家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会竭力掩盖資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阻碍,把一切都归罪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規律”,硬說消灭城乡对立是“不折不扣的空想”。……

(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901年,《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134頁)

……必須指出,大农戶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所以最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們經常地(也許几乎是独一无二地)采用泥灰石施肥,較多地使用人造肥料(三类农戶每摩尔根的肥料支出是零点八一——零点三八——零点四三馬克)和Kraftfuttermittel(在大农戶中,每摩尔根是二馬克,其余的农戶根本不用)。誤把中农戶也当作大农戶的克拉夫基說:“我們的农戶根本不花錢买精飼料。它們对进步十分迟鈍,尤其舍不得花掉現金。”(《論农业小生产的竞争能力》,第461頁)大农戶的耕作制度也比較先进:我們看到,四个大农戶全部都采用改良輪作制,中农戶采用的有三戶(有一戶还是陈旧的三圃制),小农戶采用的只有一戶(其余三戶都是三圃制)。最后,大农戶的机器也多得多。誠然,克拉夫基本人認為机

器没有什么特別重大的意义。但是我們不拘泥于他的“見解”，而要看看有关的資料再說。蒸汽脫谷机、馬拉脫谷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条播机、撒粪机、馬拉草耙、鎮压器等八种机器在上述三类农户中的分配情况如下：四个大农户共有二十九架机器（其中有一架蒸汽脫谷机），四个中农户共有十一架（蒸汽脫谷机一架也沒有），四个小农户只有一架（馬拉脫谷机）。当然，农民經濟的任何崇拜者的任何“見解”，也不能使我們相信，谷物清选机、条播机、鎮压器等等竟不会影响单位面积的产量。……

（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1901年，《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1頁）

資產階級經濟學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來解釋“爭奪新土地的競爭”，那是因為資產者有意無意地要把問題的社會歷史方面忽略過去。社會主義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認為海外競爭的原因是歐洲各古老國家的資本主義使地租飛漲，使糧食始終保持非常昂貴的价格，而海外那些不付地租的土地却在破壞着這種非常昂貴的糧食价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懂得（或者在自欺欺人地隱瞞）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昂貴的地租是農業進步的障礙，而把這一切歸咎于土地肥力遞減這一“事實”所造成的“天然”障礙。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年，《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4頁）

3. 勞動基金學說批判

威斯頓君所持的論據，實際上是基於兩個前提：

第一，國民生產總額是一種不變的東西，是一個不變量，或

是——象數學家所要說的那樣——一個不變數；

第二，實際工資總量，即依可能用以購得的那些商品數量來測定的工資總量，是一個一成不變的量，是一個不變數。

可是，他的前一論斷，顯然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看到，生產品的價值和總額總是逐年增加，國民勞動生產力總是逐年擴大，而用以流通這種日益增加的生產品所必需的貨幣數量則不斷地發生變化。凡是就全年總共計算或就各年相互比較說來正確的估計，對一年以內每天平均說來也是正確的。國民生產品總額或數量總是不斷地發生變化。這不是一個不變數，而是一個可變數，並且它——即令把人口數方面的變更除開不說，——單只由於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力方面的不斷變更，也必然是一個可變數。如果一旦發生了一般工資水平的提高，那末，這種提高本身，無論其後果如何，決不會直接引起生產品總額的變化，這點是完全對的。這種提高最初會是根据當時的現實情況出發。但是，如果說在工資提高之前，國民生產品是一個可變數而不是一個不變數，那末在工資提高之後，它仍是一個可變數而不是一個不變數。

但是，就假定國民生產品總額不是一個可變數，而是一個不變數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朋友威斯頓認作邏輯結論的東西，仍然是一種武斷。如果我們有一個假定為八的定數，那末這個數的絕對限界並不妨礙它的各部分改變其相對限界。如果利潤為六，工資為二，則工資可以增加至六，利潤可以減少至二，而總數仍然是八。因此，生產品總額不變的事實，無論如何也不能證明工資總額也是不變的。那末，我們的朋友威斯頓究竟怎樣證明工資總額是一成不變的呢？他只不过簡單斷定說是如此罷了。

但是，假令說他這個論斷是個正確的論斷，那末這個論斷就應當在兩方面都能適用，然而威斯頓君却只是使這個論斷適用於一方面。如果工資總額是一個不變數，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

能減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暫時增加工資是作得不合理，那末資本家爭取暫時降低工資也是作得不合理了。我們的朋友威爾頓並不否認，工人在一定的情況下能夠迫使資本家提高工資；但是，由於他覺得工資總額是一個天然規定的量，所以在他看來，工資增加之後，接着就必然要來一個反動。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資本家能夠勉強實行降低工資，並且資本家確實是經常企圖做到這點。依照工資總額不變的原則，在這種場合，亦如在前一場合那樣，也是接着就必然要來一個反動。因此，工人對降低工資的企圖或對事實上已把工資降低的現象進行反抗，是作得正確的。所以，他們力求提高工資，也是作得正確的，因為任何一種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動都是一種爭取提高工資的行動。因此，依照威爾頓君自己提出的工資不變的原理，工人在某種情形下也是應當聯合起來，為提高工資而鬥爭。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
1954年中文版，第376—377頁）

在這個研究的進行中，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量，它是社會財富中一個可以伸縮的，隨剩餘價值分為所得與追加資本的比例，而不斷變動的部分。我們還知道，在機能資本的量一定不變時，合併在那個資本量中的勞動力，科學，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不經人類協力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等等，也會成為它的可伸縮的能力，而在某種限度內，成為一個與它自身的量相獨立的作用範圍。在這種研究上，我們把流通過程上一切會使同量資本發生極不同作用程度的情形，都存而不論了。因為我們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限界為前提，所以我們是以社會生產過程一個純粹自然發生的姿態作為前提，把一切用現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直接而有計劃地實行的合理結合，都置而不論。古典派經濟

學慣把社會的資本，視為一個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來把握。這種偏見，到俗物的老祖宗邊沁，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常識之乏味的，街博的，逞辯的神使預言家手里，才確立成為一個教條。他在哲學者中間，是如同馬丁·塔帕爾(Martin Tupper)在詩人中間一樣。兩者都只能在英國製造出來。依他的教條，生產過程上最普遍的現象，例如生產過程之突然的伸縮，是全然不能理解的，積累本身也是全然不能理解的。邊沁自己，是和馬爾薩斯，詹姆士·穆勒，麥克洛克等人一樣利用這個教條，來為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要把資本的一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化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表示為一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它所代表的為勞動者的生活資料的量，所謂勞動基金(Arbeitsfond)，被杜撰為社會財富中一個已由自然法則固定的，變動不得的特殊部分。為要推動社會財富中那個當作不變資本的部分，或從其物質方面說，當作生產資料來發生機能的部分，一定量的活勞動是必要的。這是從工藝學方面規定了的。但推動這個勞動量所需的勞動者數，是沒有一定的；那要隨個別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一同變化。勞動力的價格，也是沒有一定的。我們至多不過為它定下一個極有伸縮性的最低限界。在這個教條下面橫着的事實，一方面：對於社會財富在非勞動者的享受資料與生產資料間的分割，勞動者無置喙余地；另一方面：勞動者要在幸運的例外的場合，方才能犧牲富者的“所得”，來把所謂“勞動基金”擴大。

為了要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的限制，描寫作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限制，人們曾經作怎樣可笑的反復，特別可以用福塞特教授(Prof. Fawcett)來做說明。他說：“一國的流動資本，就是它的勞動基金。所以要計算出每個勞動者所得的平均貨幣工資，我們不過要用勞動人口的人數，去除這個資本。”這就是，先把現實支付的個別工資加算起來，然後主張加算所得的總額，是神與自然所恩

准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只要以劳动者人数，除这个价值总额，就可以发现平均有多少归于各个劳动者。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詭詐方法。但福塞特先生还不妨以同一語調說：“英国逐年积累的财富总额，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被用来維持本国产业，其他一部分就輸往外国。……用在本国产业上的，在这个国家逐年积累的财富中，不是显著的部分。”这就是說，不給与等价就由英国劳动者那里盜取得的剩余生产物，有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本国，而是在外国資本化的。可是，伴随这种被輸出的追加資本被輸出的，还有神与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64—768頁）

就全般而論，工資的一般變動，是只由产业后备軍的伸縮來調節。产业后备軍的伸縮，則与产业循环的周期變動相適合。所以，工資的變動，不是取決于劳动者人口的絕對數的變動，而是取決于劳动者階級分为現役軍与后备軍的變動不居的比例，取決于过剩人口相對量的增加或減少，即取決于那种过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被游離的程度。不說劳动的需要与供給，是由資本的伸縮，是依照資本当时的增殖价值需要來規定，从而，是資本的伸展使劳动市場显得相對不足，資本的收縮使劳动市場显得过剩，却反过来，認為資本的變動，是依存于人口數的絕對的變動，那对于近代产业和它十年一度的循环以及它的周期諸阶段（随着积累的进展，此等阶段，会由不規則的愈益迅速地相互繼起的各种變動，而变得錯綜复杂），事实上好象是一个美好的法則。但这正好是經濟学的教条。照这个教条，工資会因資本积累而騰貴起来。騰貴的工資，会刺激劳动人口的更迅速的增殖：这种增殖会繼續下去，以至劳动市場过

剩，使資本對於勞動的供給成為相對的不足。工資又跌落，並由此顯出徽章的反面。勞動者人口，會因工資跌落而次第減少，以致資本比之勞動者人口，再成為過剩的，或如其他的人所說，工資下落及由此發生的勞動剝削的增進，會再加速積累，同時，低廉的工資，又阻止勞動者階級的增加。到這時，勞動的供給，比之它的需要，再顯得不足。工資於是趨貴，並如是不斷反復下去。這對於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多么美好的運動方法啊！但在工資騰貴，因而實際有勞動能力的人口能夠積極增加之前，已經再三經過了一個時期，在其內，必致有產業戰進行着，廝殺着，並且要打出勝負來。

在 1849 年與 1859 年之間，在英格蘭的農業區域，工資有了名義上的，從實際方面考察沒有多大重要性的增加，雖然穀物價格同時又下落了。例如，在菲爾特州，週工資由七先令增加到八先令；在多塞州，由七先令或八先令增加到九先令等等。這是農業上的過剩人口，曾經由戰爭需要，由鐵道建造，工廠，礦山等方面的驚人擴張，引起異常流出的結果。工資越是低，僅小的工資增加，就越是表現為高的百分比。例如，週工資如果是二十先令，增加到二十二先令，是增加百分之十；但若週工資是七先令，增加到九先令，就是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又七分之四。這就聳人聽聞了。到處農業家都咆哮起來；倫敦《經濟學家》雜誌關於這個飢餓工資，喋喋不休地，十分認真地，說已有“一般的實質的增加”。農業家怎麼辦呢？他們會象教條經濟學的頭腦那樣去處理問題，等待優良報酬，激起農業勞動者的增加，由是讓工資再跌落么？不是的。他們是採用了更多的機器；一瞬間，勞動者就依照農業家也覺得滿意的比例，再顯得過多了。現在，農業上比以前投下了“更多的資本”，並採取更生產的形態了。對於勞動的需要，不但相對地下落了，並且絕對地下落了。

这种經濟学的虛构，是把規定工資一般运动的法則，即規定劳动者階級(总劳动力)与社会总資本的比例的法則，和劳动人口在各特殊生产部門間分配的法則，混而为一了。比如，如果因市場景况好，某生产部門的积累特別活潑，利潤比平均利潤大；追加資本流到这个生产部門去，那自然会增大劳动的需要，提高工資。由是，市况好的部門，就要因工資較高，吸去劳动人口的較大部分，直到劳动力在那里达到飽和点，然后工資再下降到从前的平均水准，或竟因劳动者流入过多，而降落到这水准以下。然后，劳动者向这个产业部門的流入，就不但要停止，甚至要发生流出現象。在这里，經濟学者就自信已經見到“在何处并且依何法”，劳动者会在工資增大时絕對增加，工資会在劳动者絕對增加时减少了。他所見到的，事实上，不过是一个特殊生产部門的劳动市場的局部变动。不过是这种現象：劳动人口在不同投資部門間的分配，随資本的变动着的要求，一同变动。

在营业停滞与半位繁荣的时期，产业后备軍加压力于現役劳动軍；在生产过剩与充进的时期，产业后备軍阻碍現役劳动軍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律依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法則作用的范围，束縛在絕對适合于資本剝削热与支配欲的限界之内。这里，我們要回来述及經濟辯护論上一个大事业。我們記得，由于新机器的采用或旧机器的擴張，一部分可变資本轉化成了不变資本。这种活动，原是“拘束”資本，“游离”劳动，但在經濟的辯护論者看来，却恰好相反，好象它是为劳动者，把資本游离出来。我們現在已能充分理解这些辯护論者的厚顏无耻了。其实被游离了的，不仅是机器所直接驅逐了的劳动者，并且是他們的替身，和那些在营业依照旧基础实行普通的扩充时照例会被吸收的追加的后备队。他們現在被游离了，每一个寻求用途的新資本，都能够去摆布他們。不管这种資本是吸引这些劳动者还是其他的劳

動者，只要這種資本由市場吸去的勞動者人數，恰好與被機器驅逐到市場來的勞動者人數相等，一般勞動需要所受的影響，就是等於零。如果他只使用較少的人數，過剩者數就會增加；如果是使用較大的人數，一般勞動需要，也不過比例於被雇者數超過於“被游離者”數的名額，來增加。因此，尋求用途的追加資本在其他情形下對於一般勞動需要將會給予的刺激，無論在以上那種場合，都要比例於機器所驅逐的勞動者，而歸於中和。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機構是這樣安排的，要使資本的絕對增加，沒有一般勞動需要的相應的增進，陪伴着起來。辯護論者却稱這種吸收，對於被驅逐的勞動者在他們關鎖在產業後備軍中的過渡時期所受到的匱乏，痛苦，與可能的死滅，是一種報償；勞動的需要，並不與資本的增加相一致；勞動的供給，也不與勞動者階級的增大相一致。所以，這裡不是兩個互相獨立的因素互相影響。骰子是有假的啊！資本同時在雙方作用着。一方面，它的積累，增大了勞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由勞動者的“游離”，增大了他們的供給；同時，失業者的壓力，又使就業者不得不發動較多的勞動，以致在某限度內，使勞動的供給與勞動者的供給相獨立。在這個基礎上，勞動供求律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勞動者工作愈是多，為他人生產的富愈是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愈是增加，他們當作資本價值增殖手段所盡的機能，就愈是增加他們的不安程度。只要勞動者把自己何由至此的秘密看破，只要他們發覺他們自己相互間競爭的強度，全然系於相對的過剩人口的壓迫程度，只要他們由工會及其他方法，企圖在就業者與失业者間組織有計劃的協同動作，來打破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那種自然法則對於他們這一個階級所生的破壞結果，資本和它的阿諛者，政治經濟學者，就立即嚷叫起來，說這是侵害了“永遠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法則。就業者與失业者間的結合，會扰乱這種法則的“純粹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的場合，一旦

有相反的情形妨碍着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同时并妨碍着工人阶级对于资本家阶级的绝对隶属性，资本和它的平凡的桑和·彭薩(Sanohe Pansa)，就馬上会背叛那“神圣的”供求法则，要用强制的手段来支持它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2—806頁)

……我党的人讓拉薩尔的“工資的鉄的法則”强加到了自己身上，而这个法则的基础就是下述完全陈腐了的經济学观点：仿佛工人平均只得到工資的最低限額，这就是因为——根据馬尔薩斯人口論的說法——工人总是过剩的(拉薩尔的論据就是如此)。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詳細証明过：調节工資的各种法則是很复杂的，跟着情况的不同，有时这个法則占优势，有时另一个法則占优势；因此这些法則绝对不是鉄的，反而是很有彈性的；一般說来，这个问题不可能象拉薩尔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語来解决。拉薩尔从馬尔薩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儿抄襲来的这一法則的馬尔薩斯式的論据，例如从拉薩尔另一本小册子里拿到《工人謬本》第五頁上用过的論据，已被馬克思在“資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批駁得淋漓尽致。接受拉薩尔的“鉄的法則”，那也就是承認荒謬的原理及其荒謬的論据。

(恩格斯：《致奧·倍倍爾的信》，1875年3月18—28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38—39頁)

巴登在这里提出了不同的各种命題：

第一：直接使人口增加的，不是工資的上漲；但工資的下落，極容易並且極迅速能夠使人口增加。證明：十八世紀前半期工資漸漸上漲，人口只緩緩變動；反之，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我們看見真實工資的大大下落，勞動人口的迅速增加。原因：妨礙結婚的，不是工資的水準不足，而是尋找職業的困難。

第二：尋找職業的容易，與工資率成反比例。因為資本是轉化為固定資本還是轉化為流動資本，是轉化為使用勞動的東西，還是轉化為不使用勞動的東西，是與工資的高或低，成反比例的。如果工資低，對勞動的需要就會大，因為在這場合，使用多數勞動，對於企業家，是有利益的，並且，用同樣的流動資本，他會能夠使用更多的勞動。如果工資高，工廠主就會尽可能使用少數的勞動者，並想要用機械去做一切事情了。

第三：資本的蓄積自體，只能緩緩增進勞動的需要，因為這種需要的增加，在勞動稀少時，會迅速提高勞動的價格，並在勞動騰貴時，依十倍更高的程度，使利潤下落。蓄積只能在如下的場合，迅速在勞動需要上發生作用：即在蓄積之前，勞動人口已經先有太大的增加，從而工資本來是停止在極低率，以至提高以後，还是很低微，因為需要會吸收過多的失業者，來和完全就業者競爭。

這一切，加以適當的修正，對於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都是正確的。但這一切並沒有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本身。

因此，巴登的歷史證據，是恰好和他所要證明的事情相矛盾。

在十八世紀前半期，工資漸漸上漲，人口緩緩增加，沒有機械，並且比之後半期，也更少他種固定資本被使用。反之，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我們卻發覺工資在不斷下落，人口是驚人增加，——機械也是驚人增加。但正是機械，一方面使現存的人口成為過剩的，並由此把工資壓下，在別方面，則因有世界市場迅速發展之故，又把這種過剩的人口吸收，再使它成為過剩的，再把它吸收。並且，它

还异常促进资本的蓄积，并把可变资本的总量增大，虽然和生产物的总价值比例言，和它所使用的劳动人数比例言，可变资本是减少了。反之，在十八世紀前半期，大工业家还没有成立，已经成立的，不过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制造家。资本的主要成分，⁴¹ 仍旧是支用在工资上面的可变资本。和同世紀的後半期比較，劳动的生产力也不过緩緩发展。劳动的需要，从而工资，几乎和资本的蓄积，比例的增长起来。英格兰还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并且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由农业人口經營的家內紡織工业繼續存在，繼續发展。⁴² 新兴的无产阶级还不能成立，工业的大富翁也还少見。在十八世紀前半期，比較的说，是可变资本占优势，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是固定资本占优势。但就后者言，大量的人間材料还是必要的。其大量使用，是以人口大大增加这件事为前提。全部事态的进行，是和巴登的說明相矛盾的——即，在这里，一般說来，生产方法是有了变化。与大工业相符合的法則，和那些与制造业相符合的法則，并不是相同的。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发展阶段。

·(馬克思：《剩餘价值学說史》第2卷，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707—709頁)

……誠然，經濟學家說，归根到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減低生产費用，因而能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場，这样，机器最終还能使失业工人得到工作。这完全正确，但是劳动力的生产是受竞争調节的，劳动力經常威胁着就业手段，因而在这些利益出現以前就已經有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的竞争者在等待着，于是有利的情况变成了泡影，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剝夺生活資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却决不是虚构出来的，这一点为什么經濟學家就忘記了呢？发明是永远不会停滯不前的，因

而这种不利的情況將永遠繼續下去，這一點為什麼經濟學家就忘記了呢？由於我們的文明，分工無止境地發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機器上從事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根本不可能從一種職業轉到另一種新的職業，這一點為什麼經濟學家又忘記了呢？

（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4—625頁）

4. 批判機器所排斥的工人會有賠償的學說

詹姆士·穆勒，麥克洛克，托倫斯，西尼耳，約翰·穆勒這全序列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都認為驅逐工人的機器，會同時地必然地不斷把一個相當的資本游離出來雇用同數的工人。

假設一個資本家，在壁紙製造業上雇用一百工人，每人每年工資三十鎊。他每年支出的可變資本等於三千鎊。現在他裁去五十個工人，以一個費他一千五百鎊的機器，使用其餘五十人。為使問題簡明起見，我們把建築物煤炭等等都丟開了。再假設每年消費的原料，現在是和從前一樣費三千鎊。這種形態變化，會游離出任何一個資本來么？在舊的經營方法內，六千鎊的支出總額，一半是不變資本，一半是可變資本。現在，六千鎊中，是四千五百鎊為不變資本（三千鎊為原料，一千五百鎊為機器），一千五百鎊為可變資本。可變資本部分，即轉化為活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原為總資本二分之一的，現已減為總資本的四分之一。在這裡，不但沒有資本游離出來，而且有一部分資本被拘束在不再與劳动力相交換的形態上，那就是，由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了。在其他事情不變的條件下，

六千鎊的資本所雇用的勞動者，從來不會多過五十個。機器每改良一次，所使用的工人就會減少一次。當然，如果新採用的機器，比機器所驅逐的勞動力和工具的總額還是所費較小，比方說，機器不是費一千五百鎊，而是費一千鎊，由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的數額，就只是一千鎊，因而有五百鎊的資本被游離出來。假設工資不變，這樣游離出來的五百鎊將成為一種基金，而在有五十人被解雇的時候，形成大約十六個人的雇用基金。但也一定遠不及十六個人，因這五百鎊轉化為資本時，其中須有一部分再轉化為不變資本，所以僅能有一部分轉化為勞動者。

又假設新機器的建造，會使用較多數的機器建造工人。這能說是被解雇的壁紙製造工人的賠償嗎？在最好的情形下，建造新機器所使用的人數，也須比使用機器所驅逐的人數少。一千五百鎊的總額，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工資，現在是在機器形態上，代表（1）建造機器所需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2）建造機器所使用的機器工人的工資；（3）他們的“主人”的剩餘價值。再者：機器一經完成，不到死滅的時候，是不必要更新的。所以，如果要不斷使用這個追加數的機器建造工人，那就須有別一個壁紙製造業者，隨在這個後面，用機器來把工人驅逐。

事實上，那些辯護論者所指的，也不是這樣的資本游離。他們所指的，是被游離出來的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就上例言，不能否認，機器不僅游離出了五十個勞動者，由此使他們成為“可以利用”的。同時，它還把他們和價值一千五百鎊的生活資料的關聯廢止，使這種生活資料游離出來。這個單純的決非新奇的事實——機器把勞動者從生活資料那里游離出來——用這些經濟學者的話來說，便是：機器游離了勞動者的生活資料，或是把這種資料，轉化為使用勞動者的資本。你看，表現方法就是一切。惡的事，可以用名目來掩飾了。

依照这个学說，价值一千五百鎊的生活資料，將形成一個資本，要依靠被解雇的五十個壁紙工人的劳动，來增殖它的价值。所以，这个資本，在五十個人被迫休假時，將不被使用，但會不絕尋求，想要找到新的“用途”，在那里，這五十個人就可以再被生產地消費。所以，資本与劳动迟早會再會在一起，然後有了賠償。所以，機器所驅逐的工人的痛苦，和这个世界的富一樣是暫時的。

但這值一千五百鎊的生活資料，從來也不是當作資本，來和被解雇的工人相對立。當作資本和他們相對立的，是現在轉化為機器的一千五百鎊。更精密地考察一下，這一千五百鎊原來也不過代表被解雇的五十個工人每年生產出來的壁紙的一部分。他們是在貨幣形態上，不是在實物形態上，把這一個部分，當作工資，由雇主手裡得到它們。他們一向就是用這種轉換成一千五百鎊的壁紙，來購買等價值額的生活資料。所以，在他們看，這種生活資料，不是資本，只是商品，而与此種商品相對而言，他們也不是當作工資勞動者，只是當作購買者。機器把他們從購買手段那裡游離出來的事實，使他們由購買者變為非購買者了。因此，對於這種商品的需要就減少了。但就不過如此。如果減少的需要，不由別方面需要的增大得到賠償，那些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會跌落。假令這種情形居然持久下去，擴大開來，接着，那些商品生產上被使用的勞動者，也不免有一部分會被驅逐。以前用來生產必要生活資料的資本一部分，將會在別種形態上再生產出來。在市場價格跌落，資本被驅逐時，必要生活資料生產上使用的勞動者，也會由他們的工資一部分被“游離”出來。所以，辯護先生們，與其用他們的至高至上的供求律來證明，機器把勞動者從生活資料游離出來時，會使此等生活資料轉化為再使用他們的資本，實毋寧用這個法則來證明，機器不僅會在機器被採用的生產部門，並且會在機器不被採用的生產部門，把勞動者驅逐。

現實的為經濟樂觀主義所曲解了的事實是：從工場被機器驅逐出來的勞動者，會被擲到勞動市場上來，在那里，把資本可以自由榨取的勞動力的數目增加。第七篇將會說明，機器的這種作用，在这里，被視為工人階級的賠償的，其實是當作最可怕的刑罰，出現在工人階級面前。在此，我只要說：從一產業部門被逐出來的勞動者，的確可以到某別的產業部門去求職業。如果他們求得了，他們和被游離的生活資料間的結合，就會再締結起來，但這只是因為，有一個新的尋找用途的追加的資本作媒介，決不是因為以前發生機能現在已經轉化為機器的資本在當中作媒介。並且，就使如此，他們的前途也是何等黯淡啊！他們已由分工之故，變成了不健全的；他們在他們的舊勞動範圍之外，幾乎是沒有用處的，所以，他們能夠加入的職業，只有少數低級的報酬甚差而求職者又非常拥挤的勞動部門。再者，每一個產業部門每年都會吸引一種新的人口之流，作為補充隊，來經常補充缺額並準備擴充。機器把以前在某產業部門內使用的工人一部分游離出來時，補充人員也會重新分配，由其他的勞動部門吸收。但原來的犧牲者，大部分會在過渡期間餓死，消滅。

一個無疑的事實：勞動者從生活資料的游離，是機器自身一點責任也不負的。機器會在它被採用的生產部門使生產物便宜，並使其量增加，但在當初，不會使其他產業部門所生產的生活資料量發生變化。所以，在機器被採用之後，社會所有的可用來养活被解雇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即使不比以前更多，也必和以前一樣多；年生產物中由不勞動者浪費的異常大的部分，還全然沒有計算在內。這就是經濟學上辯護論者的根據點了！與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種矛盾和對抗，不是生於機器本身，只是生於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因為機器就其自身考察是縮短勞動時間的，但它的資本主義的使用，却是延長勞動日；

因为机器本身是使劳动变为輕易的，但它的資本主义的使用，却会加强劳动；因为机器本身是人类对于自然力的胜利，但它的資本主义的使用，却使人类服从于自然力；因为机器本身可以增加生产者的富，但它的資本主义的使用，却使生产者化为待救济的貧民，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学者就简单地認為，关于机器的观察，明白証明了，这一切可以明白看到的矛盾，只是普通的现实之單純的外觀，在實質上，在理論上，都是不存在的。他們不要絞一下脑筋，便說反对派不攻击机器的資本主义的使用，而攻击机器本身，是再愚蠢不过的。

不錯，資產階級經濟学者也不否認机器的資本主义的使用，会引起一时的不便。但哪一个徽章沒有它的反面？在他看来，机器只可能有資本主义的使用。所以，在他看来，劳动者由机器使用，和机器由劳动者使用，是沒有两样的。所以，要是有人要暴露机器的資本主义的使用实际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就是反对使用机器的，是社会进步之敌^①，和有名的杀人犯比尔·塞克的論法，完全是一样的。“审判官先生們，这个旅行商人的头是割掉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这是刀的罪。我們能因有这种一时的不便，就不用刀么？先生們自己想想看。沒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沒有刀，外科医生怎么办呢？沒有刀，解剖学者怎么办呢？各办筵席；不要用刀么？把刀廢止，我們就再回到野蛮状态中了。”

机器虽必然会在采用机器的劳动部門驅逐劳动者，但它不是不能在别的劳动部門引起雇佣的增加。但是，这个結果，与所謂赔偿說，沒有任何同点。

① 譬如麦克洛克便是一个这样自大的白痴病的能手。他象一个八岁的小孩，天真无邪地說：“如果愈益发展工人的熟练，使其能以同量劳动或較少量劳动，生产愈益多量的商品，是有利益的，那么，利用那种可以最有效地帮助他来达到这个結果的机器的助力，也必定是有利益的。”（《經濟學原理》，倫敦 1891 年，第 182 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第532—538頁)

第一:关于那采用机械的资本家,說他能和以前把同量資本投在工資上面,当然是錯誤的,不合理的。在他借入資本的場合,这样的說法,虽然对于他不是錯誤的,但对于社会还是一样錯誤的。他会把他的資本一部分,轉化为机械和别种固定資本;另一个部分轉化为他以前不需用的補助材料;在我們假設他将用更少數的劳动者生产更多的商品,从而需用更多的原料时,他还会用一个更大的部分,轉化为原料。可变資本(即用在工資上面的資本)对不变資本的比例,将会在他的职业部門內,减少下来。就令他的营业会在新生产規模上这样扩大,以至全数被解雇出来的劳动者能再由他雇用,甚至能被雇用的人数比以前更大,这个比例也依然会减小;甚至因劳动生产力(因有蓄积)趋于发展,以至与不变資本相对而言,可变資本的减少程度,更为加强。在他的职业內,劳动的需要,会和他的資本的蓄积,一同增加,但与資本的蓄积相比較,程度是更小得多的;他的資本,也不会为劳动的需要,再形成和以前一样大的源泉。直接的結果是劳动者一部分被擲在街头。

但人們会說,对劳动者的需要会間接的保持不变。因为,对建造机械的劳动者的需要,将会增加,但李嘉图自己已經講过,机械所費的劳动,决不能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等。这是可能的,机械工厂內的劳动時間,在一个时期以內,可以延长,以至在当初,沒有一个更多的劳动者能在那里被雇用。原料——比方說棉花——能由美国和中国运进来;对黑奴或苦力的需要是否增加的問題,和那些失业的英国人,是全然沒有关系的。但就假設原料是在國內供給的,以至有更多的妇女儿童和馬等等会在农业上被使用,从而,也

許有更多的這種生產物，更少的別種生產物被生產出來罷。但這對於被解雇的勞動者，仍不會有什麼需要發生；在農業上，同一過程將進行造出一個經常的相對的過剩人口。

所以，說機械的採用，會在製造家方面，使資本在最初投下之際游離出來，根本是不確的。機械的採用，只會給他的資本一種不同的使用方法，依照前提，其直接結果，是把勞動者解雇出來，并把可變資本一部分轉化成不變資本。

第二：就社會公眾方面說，因那些用機械生產的商品已經更便宜之故，最初會有所得游離出來；在生產品當作生產要素加入不變資本的限度內，才直接有資本游離出來。

如果這種商品會加在勞動者的平均消費內，則依照李嘉圖自己的看法，真實工資（即勞動力價值）的下落，就在別一些產業部門，也會表示出來。

被游離出來的所得的一部分，會被消費在原商品上。在這場合，或是因為商品更便宜了，以至有新的消費者階級可以接近它們（在這場合，被游離出來的所得，不會用在原商品上），或是舊消費者多使用一些這種已經更便宜的商品，例如不使用一雙襪，而使用四雙。被游離出來的所得的別一個部分，可用來擴大那採用機械的生產部門，或形成一個會生產別一種商品的新生產部門，或擴大一個已經成立的生產部門。但無論用途如何，這樣被游離出來并再轉化為資本的所得，當初，總不夠把每年新注入各個生產部門現在已不能行入舊生產部門的人口增加部分吸收掉。並且，如下的情形也是可能的：被游離出來的所得，可能會與外國生產物相交換，或由不生產勞動者消費。在被游離出來的所得和從所得游離出來的勞動者間，決沒有必然的聯系存在。

採用機械的工廠主的資本，沒有游離出來。它不過取得了別樣的用途，並且正好取得這樣一個用途，它在這個用途上，不象原

先一樣，可以為那些被解雇出來的勞動者，轉化為工資。其中一部分，會由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就令其中一部分被游離出來了，它也會由那些部門吸收掉；在那些部門，被解雇的勞動者是不能勞動的，那至多不過為他們的補充隊形成一個避難所。

但被游離出來的所得——就令它的游離，不由更便宜的商品的較大消費抵消掉，也不與外国的生活資料相交換——由舊生產部門的擴大或新生產部門的開放，也只會為年年流出的人口增加額的一個部分，把必要的水口開放（如果它會把它開放）。這個部分的人口，已經發覺採用機械的舊生產部門，是把門戶關閉了。

第三：埋在李嘉圖思想根柢上的，有這樣一個荒謬的根本觀念：

以前由那些被解雇勞動者消費的生活資料，還是存在在那裡，並且和以前一樣存在市場上。在另一方面，他們的隊伍也還存在市場上。在一方面，有為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從而支付手段），有可變資本，在別一方面，有無職業的勞動者。推動他們的基金是在那裡的。所以，結局他們會找到職業。

象李嘉圖這樣的一個經濟學者，也可能會在這樣一個可怕的胡說上面喋喋不休嗎？

照這樣說來，在資產階級社會內，就決不會有一個有勞動能力並且願意勞動的人，當市場上社會上尚有生活資料足以在某種職業上支付給他的時候，餓餓了。

但這種生活資料，並不是當作資本，和那種勞動者相對待的。

假設因有機械之故，有十萬勞動者突然被擲在街頭了。那是毫無疑問的，在市場上存在着平均說足夠在一年間供這些勞動者消費的農業生產物，會依然存在市場上。對於這種生產物，現在沒有需要了，——假設它同時不被輸出——結果將會怎樣呢？因為

与需要相对而言，供給已經增加了，它在价格上将会下落，并且，因为价格下落之故，它的消費額将会增大（虽然这十万劳动者将因頓在飢餓中）。但价格不一定会下落。生活資料的輸入也許會减少，它的輸出也許會增加。

李嘉图提出了这个空想：在有十个人（比方这样說），被解雇时，全资产阶级社会机构将会这样发生变化，以至这十个人的生活資料——現在已經游离出来的——絕對必須依照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由原来十个人去消費，如果不是这样，便不能由人受用，好象在社会的地盘上，既沒有半失业者也沒有全失业者大众呻吟着一般。并且，好象在生活資料形态上存在着的資本，是一个定量一般。

假設谷物的市場价格因需要减少而下落了，那在谷物形态上存在的資本（貨幣資本）将会减少，从而，在它不輸出的場合，它将只能和社会的貨幣所得一个更小的部分相交換。現在說到制造业：在手織工人漸次餓死的那許多年中，英国棉織物的生产和輸出，是惊人增加了。同时（1838—1841），食料品的价格增高了。这些織布工人沒有可以披体的破旧衣服，也沒有可以維持肉体 and 靈魂的充分食物。只能在热病似的繁荣时期被吸收的过剩人口之不断的人为的生出，正是近代工业的必要生产条件之一。而同时，貨幣資本仍不妨有一部分在荒廢而不被人使用的状态中，以至生活資料的价格因相对的过剩生产而下落，同时因机械而被游离出来的劳动者，則在飢餓中。

当然，在結局上，那些被游离出来的劳动，和那个被游离出来的所得部分或資本部分，将会在一个新的生产部門或在旧生产部門的扩大中，寻到出口（但这个話，对于被解雇者們的补充兵，比对于他們自己，是更适用的）。多少是不生产的新的劳动部門，会不断形成出来，在其內，所得是可以直接支出的。此外，还会有固定

資本的形成，有鐵道建設等等，有由此開放的經營指導（superintendence）勞動，有奢侈品製造，最後，有使所得于以支出的對象益益分化的外國貿易。

李嘉圖由他的不合理的觀點出發，假設機械的採用只在如下的場合于勞動者有害：即，在機械的採用會減少總生產物，從而減少總所得的場合。這個情形，在大農業上，當人們用馬代替勞動者來消費谷物，或使谷物栽培轉化為牧羊業等等時，是可能的。但〔若我們〕在真正的工業上〔也這樣假定〕，就是極不合理的；因為真正工業的總生產物的市場，決不是以國內市場為限。並且，勞動者一部分正在飢餓中時，其中別一部分會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不生產勞動者，勞動者和資本家間的中間階層，就是這樣。

說加在所得內的商品量，本來就是為勞動者的食料品，或形成那種為他們的資本，根本是錯誤的。這種商品的一部分，將由不生產的勞動者或不勞動者消費；別一部分，能夠由它的當作工資用的形態——它的粗糙形態——經過國外貿易，轉化為這樣一種形態，得以加在富有者的所得內，或當作不變資本的生產要素。最後，還有一部分，會由那些在貧民院或監獄中的無業勞動者，當作施舍物或盜賊消費掉，或當作婦女賣淫的價錢。

.....

在李嘉圖的場合，是和巴登的場合一樣，有如下一層作根基。他原來是由這個前提出發：資本的每一次蓄積，都指示可變資本的增加，從而，勞動的需要，會和資本的蓄積，以相同的比例直接增加起來。但這是錯誤的，因為在資本蓄積時，資本的有機構成會發生變化，那就是，資本的不變部分，比之資本的可變部分，會依更速的進度，增加起來。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679—685頁）

統一書號: 4017·25

定 价: 0.70元